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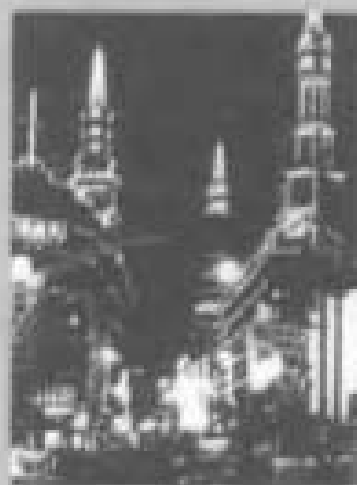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  
著

宋庆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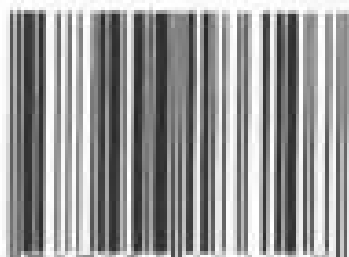
与二十世纪

Soong chingling  
Du Ershishiji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 7-80618-610-7



9 787806 186107 >

ISBN7-80618-606-9/G·197

定价: 22.00 元

# 宋庆龄 与二十世纪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著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玉琴

封面设计 闵 敏

## 宋庆龄与二十世纪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300000 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80618-606-9/G·197

定价:22.00元

## 《宋庆龄与二十世纪》

主 编：张世福

副主编：(以下按姓氏笔划)

华 平 季鸿生 黄亚平 傅绍昌

编 委：王 蔚 王志鲜 华 平 庄有为 辛永康

张世福 陆柳莺 季鸿生 黄亚平 傅绍昌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毕生追求真理	(5)
一、对 20 世纪世情的认识	(5)
二、对 20 世纪国情的认识	(14)
三、跟随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	(30)
第二章 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	(40)
一、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	(40)
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49)
三、继承孙中山遗志,捍卫孙中山革命原则	(60)
第三章 民主和抗日的旗帜	(77)
一、谴责不抵抗主义,支援一二八抗战	(77)
二、进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	(83)
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90)
四、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	(94)
五、争取民主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99)
第四章 统一战线事业的推动者和杰出模范	(110)
一、促成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和发展	(110)
二、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奋斗	(142)
第五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166)
一、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和个人独裁的斗争	(167)
二、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战争	(178)
三、共商建国大计	(186)
第六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195)

---

一、参与制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	(195)
二、擘划中国现代化 .....	(207)
三、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	(219)
四、向世界介绍中国 .....	(231)
<b>第七章 献身妇女儿童福利事业</b> .....	<b>(243)</b>
一、开创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 .....	(243)
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	(252)
三、心系儿童,缔造未来 .....	(266)
<b>第八章 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前驱和伟大战士</b> .....	<b>(275)</b>
一、反法西斯的雄狮 .....	(275)
二、正确的战争观与和平观 .....	(279)
三、倡议和平共处 .....	(289)
四、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	(294)
<b>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的战友和伟大战士</b> .....	<b>(305)</b>
一、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	(305)
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正式一员 .....	(315)
三、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原因 .....	(331)
<b>第十章 国之瑰宝风范长存</b> .....	<b>(340)</b>
一、学习、继承和弘扬宋庆龄的革命精神 .....	(340)
二、学习、继承和弘扬宋庆龄的崇高品质 .....	(355)
<b>后    记</b> .....	<b>(370)</b>

## 前 言

风云激荡的 20 世纪即将过去,人们正以满腔热情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在世纪之交,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 20 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世界和平及人类进步事业所作出的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

宋庆龄被世人称颂为 20 世纪的伟大女性,是当之无愧的。20 世纪,世界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出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其中不乏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她们或在自己的国家中,或在某些领域,或在某个时期曾经不同程度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她们的事迹被载入史册,受到人们的纪念和尊敬。然而,象宋庆龄那样,在整个 20 世纪的大半个世纪中,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跨越国界,对全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如此长远、广泛地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促进历史向前发展,因而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普遍尊敬和称颂的女性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与她政治信仰不同,立场观点相左,甚至某些在政治上反对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宋庆龄是一位品德高尚、极具人格魅力的伟大爱国者。

关于宋庆龄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生,人们有过许多记述和评论。大家都知道,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家庭成员都是中国近百年来左右中国政局的显赫人物,没有其他家庭能够象她的家庭那样,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巨大和深刻的影响。宋庆龄又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能得到这样至高无上荣誉称号的人,在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也仅她一人而已。荣华富贵、名誉地位、安逸的



生活,这些对宋庆龄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然而宋庆龄却选择了与此截然相反的道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她抛弃了舒适的物质生活,断绝了与不同政见的家人的关系,毅然走上充满危险、艰难、有时是十分痛苦的革命道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往无前,愈挫愈奋。

宋庆龄不是孤军奋战,她充分灵活地利用了她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巧妙地运用她所拥有的各种特殊社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完成革命任务,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作出特殊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只有把他(她)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中来进行观察,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看他(她)在时代前进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才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20世纪是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的时代,又是剧烈动荡、风云变幻的时代。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看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对待时代潮流采取什么态度、发挥什么作用,衡量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政党是否革命、是否进步,并不是看其标榜什么旗号,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唯一的标准,只能是看他(她)对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时代潮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拥护、支持、促进,还是反对、阻挠、促退。经过此一试金石的衡量,是革命还是反动,是进步还是倒退便一目了然,泾渭分明。有些人在革命处于高潮时,或者在革命的某一个阶段,有可能被卷入革命的浪潮,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俨然是一个“革命者”,而当革命转入低潮时,或者进一步深化,触犯了他本人或者所在的小集团的利益时,就会动摇、退缩,甚至走到对立面去。近百年来,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宋庆龄的可贵之处,就是不论革命的环境如何险恶,条件如何艰苦;不论是胜利,还是挫折、失败,她都能自始至终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方向,站在历史浪潮的前列,义无反顾,奋勇向前,于千锤

百炼中变得更加纯洁、坚强。

宋庆龄出生于 19 世纪末叶,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遭帝国主义势力大举入侵,疯狂掠夺,清朝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社会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年幼的宋庆龄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之中,目睹和亲历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自幼就萌生了爱国的思想,立志报效祖国。她留学美国以后,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拥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她热情讴歌和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称之为“20 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和进步。宋庆龄深知中国之所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由于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又加深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建设统一、独立、自由的现代化国家,她决心与孙中山先生一道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因此她在大学毕业以后,即自觉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去,自愿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辅助孙中山工作,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亲密战友和革命的伴侣。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创立了三民主义,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一些规划,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不可能提出更彻底的革命主张,因此在具体实践时屡遭败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孙中山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他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使中国的革命又有了新的高涨。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过程中,宋庆龄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发挥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一系列罪恶活动,宋庆龄又旗帜鲜明地继承、捍卫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革命原则,与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宋庆龄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团结抗战奔走呼号。宋庆龄认为,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打败残暴成性、武装到牙齿的德日意法西斯强盗,世界各国人民应当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共同战斗,她为之殚精竭虑,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战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实行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内战。宋庆龄积极投身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参与制订了一系列建国大计,多次从事重要的国务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关心妇女儿童,缔造祖国的未来,发展中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保卫世界和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宋庆龄的光辉一生是同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的。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人类的和平、新中国的解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一生。她的英名与日月同辉。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宋庆龄通过毕生的奋斗,从一个怀有朴素感情的爱国者发展成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是中国人民的旗帜,她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宋庆龄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她的思想、她的品德、她的智慧、她的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当今时代虽然与宋庆龄所处的时代相比,情况、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宋庆龄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仍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鼓舞我们不断前进,求索进取的巨大力量。

## 第一章 毕生追求真理

宋庆龄是一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掌握科学社会主义以后,能正确地认识20世纪的世情和国情。她作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紧跟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宋庆龄在致埃德加·斯诺的信中指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历史是恒久的,而历史肯定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沿着人民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sup>①</sup>这是宋庆龄长期为之奋斗而坚持的信念。



### 一、对20世纪世情的认识

在本世纪30年代,宋庆龄认为,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和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它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但人民在战争中也经受了锻炼,壮大了革命势力,形成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已取得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从事斗争;要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统

<sup>①</sup>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479~4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农民为生活所迫,纷纷拍卖田产,仅1932年就拍卖土地14万多公顷,同年农民借债达130亿马克。由于经济危机,使德国国内动荡不安,罢工和示威游行不断发生,还出现了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威望迅速增长,党员人数增加到36万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狂叫,1918年的11月革命的“幽灵”又在德国的上空徘徊了。他们主张只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走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对外实行扩张,用战争手段打垮英、法在欧洲的霸权,才能摆脱危机,使德国再次称霸世界。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法西斯在德国夺取了政权”<sup>①</sup>。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希特勒被德国大资产阶级捧上了台,当上了德国总统。希特勒上台后第28天,即1933年的2月7日,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德国共产党。6个星期内,逮捕了德共领导人和积极分子1万8千余人,取缔了德共在议会中的议席,随后,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政党(即便是资产阶级政党)也先后被迫解散。还禁止在德国成立新的政党。

与此同时,德国走上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作了种种限制。但是《和约》不能限制住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如和约规定不准在德国国内生产重武器,它便在国外继续研制,在荷兰制造舰艇,在瑞典制造飞机。就是在德国国内,表面履行和约规定,但在暗地里仍然研制重炮和坦克,甚至继续生产化学毒剂。还利用发展民间体育组织等办法,保存并有计划地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希特勒上台不久,就以要求“军备平等”为由,宣布退出裁军会议。随后,希特勒秘密下令把军队限额从10万人扩充到30万人。接着,正式宣布建立德国空军,德国飞机的产量迅速增加<sup>②</sup>。

意大利早在1922年10月,就发生了法西斯政变,墨索里尼出任首相后,先后颁布了一些反动法令,以铲除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7页。

<sup>②</sup> 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1~13页。

制度。1926年4月,他下令对工会进行监督。同年10月,发生企图暗杀墨索里尼的事件,11月5日,墨索里尼颁布解散一切政党的法令,实现法西斯一党专政。墨索里尼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极力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通过武力进行扩张,掠夺市场和原料产地,进一步同英法对抗<sup>①</sup>。

在远东,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抬头”,“正一心一意地在它夺自中国的领土上扩张军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早在20年代,日本就出现法西斯组织,如“国本社”、“一夕会”等,到1929年,日本的法西斯团体有120多个。日本军部是日本法西斯团体的大本营,许多高级将领都是法西斯的重要成员。东条英机、冈村宁次都是“一夕会”的主要成员。1930年成立的“樱会”(法西斯组织)的骨干,来自日军参谋部、陆军省、宪兵队、步兵学校的一批军官。“一夕会”、“樱会”等这些法西斯组织活动猖獗,竭力鼓吹“国家主义”来“维新”日本,实行“彻底的大日本主义”。在日本人民尤其是军队中大肆灌输法西斯主义。1927年,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泡制了《田中奏折》。这是民族沙文主义的强烈表现。赤裸裸地暴露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争霸世界的狂妄野心。“樱会”于1930年9月,制订了政变纲领,鼓吹军备第一,要求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同年11月,法西斯分子在东京车站行刺,首相滨口受重伤。“樱会”的一批法西斯分子在前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的支持下于1931年3月,发动政变未遂。部分以海军下级军官为核心的少壮派军人,于1932年5月15日,闯入首相住宅,枪杀了首相犬养毅,同时还袭击了警视厅等机关。事件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公然要求成立“举国一致的军人内阁”。

与此同时,日本在经济上加速了军事化的步伐,把国民经济纳

<sup>①</sup> 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4~15页。

入战时经济轨道,从1931年起,日本军事预算逐年上升。1936年达到10.78亿日元,占财政支出的47.2%。日本政府颁布和修改了许多法令,加强了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构成日本军事工业基础的化学和钢铁工业,从1932年至1936年,日本财阀控制的企业接受军事订货达55亿日元。经济军事化促进了财阀和军部的勾结,为扩军备战创造了条件。1930年日军人数为23万人,到1936年增加38万人,海军总吨位超过150万吨<sup>①</sup>。

面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宋庆龄大声疾呼:“要制止它,就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sup>②</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她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随后她又为扩大反法西斯阵线作出不懈的努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二) 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时代

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宋庆龄最初是从孙中山那里知道并学习得来的。她回忆说:孙中山“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九年,他访问了有中国人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一切欧洲中心城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柏林。……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sup>③</sup> “听过他演讲的人们记得,他常常预言,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他当时预言,在他本人在中国取得成功以前,列宁所作的努力

<sup>①</sup> 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第7~9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8页。

<sup>③</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87页。

就会成功”<sup>①</sup>。她与孙中山结合之后,常为孙中山“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sup>②</sup>。后来,她赞同列宁的说法:“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主观社会主义’”<sup>③</sup>。1931年12月,宋庆龄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即《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重要文献里,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向。她说:“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sup>④</sup>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与孙中山理解的社会主义,在思想体系和阶级实质上已开始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已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了。

1933年,宋庆龄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词中,更加明确的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sup>⑤</sup>这里,她指出了时代发生的标志和发展方向。进而,她作了扼要而深刻的阐述:“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因为如果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sup>⑥</sup>她还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经普遍开展起来,因为“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引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于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

① 《宋庆龄选集》F卷,第390页。

② 《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94年第5期。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5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6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1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第131页。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sup>①</sup>

宋庆龄在分析资本主义全部特征后，指出：“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sup>②</sup>。（着重点是宋庆龄自己加的）。是的，帝国主义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但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壮大了革命势力，形成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历史很明显地指示我们：战争的破坏性必然一次比一次厉害，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必然一次比一次惨重，战争中间相隔的时间必然一次比一次缩短。但同时战争并不能解决而只能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sup>③</sup>

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如此，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产生了巴黎公社；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大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而且使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sup>④</sup>

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宋庆龄是积极的宣传鼓动者和坚决捍卫者。1927年9月，她到苏联后看到苏联青年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风貌，发表了题为《青年与革命》一文，极为高兴地指出：“我在苏联的短短期间，苏联的青年，比我看到的别的一切都更使我感到兴奋和鼓舞。从他们的热情与诚挚、他们对国家进步的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2页。

大转变时期的急风暴雨,而且尽其所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

### (一)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宋庆龄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她早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因。早在1927年1月,她发表的《为创办湖北妇女党务训练班敬告全国女界同胞书》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使我们工业一天一天的衰败下来。他们压迫我们最利害的就是不平等条约。我国和外国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最先的就是因为鸦片战争,南京条约(1842年)五口通商开其端,至今八十余年,先后开放许多的商埠,至中英通商条约缔结(1842年)又将税则权断送了,外货尽量输入,无法限制他。后来马关条约又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内有工业制造权。此后中英条约(光绪二十八年订),中日通商条约(光绪二十九年订),每次均丧失了种种权利,治外法权又极力的扩张,租界又极力的拓大,我国人民的生存问题更危险了。”<sup>①</sup> 是的,从1840年后的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中,世界各资本主义强国先后对中国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套上了一副又一副沉重的枷锁。它们不仅在中国开辟商埠,割占土地,抢夺财富,盗窃资源,还取得了协定关税、沿海贸易、内河航行、勒索土地设立租界等一系列特权。从此,中国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独立主权遭受严重侵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被搞得支离破碎,民穷财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宋庆龄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投降卖国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的重要原因。她在1939年11月发表的《真正实现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6页。

中国的独立》一文中指出：“颛顼的清廷，屈服于列强的权威之下。不特将国家的主权，拱手让人，并且为着偿还巨额的赔款，实变为帝国主义者的收税机关。”<sup>①</sup> 是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就充满了“战与抚”的斗争，所谓“抚”就是投降的代名词，由于没有一条明确的作战方针，道光皇帝三战三和，自行瓦解斗志，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成为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

从1900年到1901年，清王朝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下“自责之诏”，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把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列强。清朝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彻底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宋庆龄指出：“清廷的官僚政治，为中国民族政治上和经济上求自由的莫大障碍物”。“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和清廷的双重压迫之下，为求自由平等，惟有推翻满清的暴虐统治。”<sup>②</sup> 宋庆龄还认为，封建军阀统治是中国统一和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要打倒帝国主义必先要打倒军阀。她多次指出：“国家被军阀们分割成几部分，他们各自直接或间接地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在他们割据的地区垄断军械弹药的进口，……四分五裂的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肆意争夺的猎物。”<sup>③</sup> “军阀武人吸了人民的脂膏，不能保护人民，反为帝国主义做走狗，甘心做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我们民族要在世界上生存，非一致联合打倒帝国主义不可，如要打倒帝国主义，又非先把帝国主义的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80页。

工具——军阀打倒不可。”<sup>①</sup>

后来,宋庆龄论述了辛亥革命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指出:“孙中山所领导的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王朝的任务,但是却没有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任何根本的改变,原因是没有唤起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也没有明确地确定国家真正的敌人作为集中攻击的目标。

“帝国主义仍旧操纵着我们的国家,恣意掠夺我国的土地和资源,几乎把中国瓜分得不复存在。帝国主义利用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外壳作为进行控制的手段,进一步剥削我国人民。这种情况大大加重了我们农民的负担,使农民不得不在灭亡和斗争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遵循历史的传统,选择了反击的道路。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能象在西方国家那样得到广泛的发展。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帝国主义国家在别处忙得无暇他顾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私人企业才有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sup>②</sup>

接着,宋庆龄论述了中国社会力量 and 阶级结构发生的变化,以及在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中国各阶级、阶层人民的思考和选择。指出:

“于是在这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以可察觉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他们一道,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作为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因素兴起了。

“在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者跑回到中国来了。中国的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立即被扼杀,其他一些企业也只好缩小规模、苟延残喘。中国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害,象往常一样,劳动人民首当其冲。这时也要求作出选择:要末屈服,要末进行反击。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5~386页。

“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具有典型的动摇态度,但是别无出路,于是他们有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但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工人在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唤醒以后,大踏步地走到斗争的最前列。

“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面临了类似的抉择,他们看到国家毫无希望,自己面临着失业和不安全,因此他们的思想起了革命的变化,他们开始要求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sup>①</sup>

宋庆龄所述的以上情况,即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到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一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一是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性。威武雄壮、但富有悲剧色彩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由充满胜利光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让位于新兴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工人阶级合乎逻辑地登上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

1. 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主犯。孙中山在宋庆龄的辅佐下,对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革命活动,所进行的民族革命斗争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其目的是推翻封建统治和使更多的人拥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为资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是以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根据的。接着,她指出:“世界的形势已经使这些观念过时了,特别是在出现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垄断资本主义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情况又导致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导致对人民和土地的大规模掠夺。”<sup>②</sup> 孙中山“看到了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之间矛盾和国内反动派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看到这两种矛盾是怎样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6~387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7页。

互相联系、互相依靠的。但是,尤其重要的是,他洞察了问题的核心,把帝国主义称作主犯。”<sup>①</sup> 孙中山认识到,“他原来的关于中国反击压迫者的思想必须修改,他不断寻求使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解放的蓝图。”<sup>②</sup> 并将他领导的组织加以整顿。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但同孙中山的主观愿望相距很大,他“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使它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内部不真心想在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当帝国主义已成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并且已经有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作榜样的时期,怎样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这是孙中山想得越来越多的问题。”“正当他在寻求新的出路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最早的代表接近了他。”<sup>③</sup>

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很快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重要性,而当时其他人不是害怕它的主张,就是由于它早期党员不多而低估了它。一九二三年当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sup>④</sup> 随即,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进行了革命斗争,宋庆龄以非常自豪和充满喜悦的心情写道:“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sup>⑤</sup>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这一“决定”作了高度的评价:

“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从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的观点来看,它立即取得了实际的成

---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9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7~38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8~38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5页。

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的开始而已。”<sup>①</sup> 它无疑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地位。

对内,蒋介石政权实行封建法西斯军事专政,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反动王朝。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了一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反动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对人民进行野蛮的屠杀和迫害。宋庆龄愤怒地揭露:“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sup>②</sup>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凡属共产党的理论、机关、运动,均“积极铲除”。3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进一步加强了对革命人民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至1932年的5年中,被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达100多万人。对苏区,实行5次大规模“围剿”。在农村,蒋介石政权采取两项严密的措施,即建立地主武装保安团和保甲制度,总之,中国人民处于旷古未有的暴政之下。

对于南京政府的暴虐统治,宋庆龄曾多次加以揭露。她在《向美国朋友的呼吁》一文中,悲愤地指出:“南京的部队受命把枪口指向英勇地试图击退侵略者的同胞兄弟,而不是去反击帝国主义侵略者匪帮。南京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厚颜无耻,秘密或公开地和这些敌人进行谈判,而对内则企图逮捕、监禁和处死所有抗击外国征服的中国人。南京政府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粉碎了国内所有公开的自由、民主或人道主义运动。它破坏所有工会,压制每一次工人为生存权而进行的罢工,指使歹徒恶棍(这些家伙同时又是法西斯‘蓝衣社’分子),破坏国内每一次文化、劳工或国民运动。在外国武器、弹药、外国参谋人员、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3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6~137页。

外国飞机和飞行员的帮助下,南京政府摧毁了无数的村庄和城镇,炸死儿童、妇女和男子,使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哀苦无告。监狱里塞满了属于各个阶层的政治犯,而且以最野蛮的酷刑和杀戮来对付他们。外国新闻社和记者都无耻地歌颂犯下这些暴行的罪犯。”<sup>①</sup>

宋庆龄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断定,国民党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南京政府是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宋庆龄的结论既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实际状况,又与毛泽东的以下论述相一致:“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sup>②</sup>

### 3.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尤其华北事变的发生导致了中国国情的重大变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并处于从属地位,由此使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据此,宋庆龄指出:“在目前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宋庆龄根据日本侵略者要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变化,国民党“五中全会”对内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日本的扩大侵略,严重威胁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等国际国内因素,向政府提出了“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明确提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41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尤其要联合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联合日本、朝鲜……爱好和平的大众,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sup>①</sup> 宋庆龄发起组织和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国民党、共产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社党等各党各派,还有一大批无党派的爱国的士。

宋庆龄根据毛泽东 1936 年 9 月希望“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的来信,参加了 1937 年 2 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 14 人联名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发表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会议之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宋庆龄紧握和高举中华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解放的大旗。在营救“七君子”过程中,她始终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我们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为救国会七领导人被捕事件宣言》中指出:“暴日在中国人民各方面的坚强抵抗之前,就加紧运用他们的阴谋,破坏我民族的反抗力量。他们一面用着大炮和飞机,轰击和屠杀我们在绥远前线的战士,调动陆战队来弹压和捕杀我们在上海和青岛的工人同胞;在另一方面,他们就用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在我们人民与政府之间挑拨离间,瓦解我们的团结,拆散我们的统一,以遂其‘以华制华’、‘各个击破’的毒计。”<sup>②</sup> “日本军阀的阴谋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它所引起的倒是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和狂怒,这种义愤和狂怒恰恰对准着我们唯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54 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59 页。

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sup>①</sup>她在《对上海新闻界发表的书面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最近半年以来,时局已大有进步,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之后,和平统一已成,抗日准备已在进行。救国会方面已屡次表示,愿意完全受政府领导。而七位先生对于这点,在他们供词和答辩状中,也非常肯定的指出。在这时候当局应该仰体孙中山先生和平宽大的精神,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意志,一面把七位先生释放,一面允许救国自由,然后上下团结一致,共谋民族复兴,这样中华民国一定有光明的前途。要是在这时候七位先生还是身在狱中,甚至还要判罪,这不免为亲者所痛,而为仇者所快,那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啊。”<sup>②</sup>宋庆龄认准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把握了斗争的大方向,为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4. 建立“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严肃地指出:“中国政府对一大堆政治和军事问题,都不能恰当地处理它们。”<sup>③</sup>首先碰到的政治问题,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根本不懂得中国人民的愿望,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宋庆龄指出:“战争以法西斯失败告终,并且带来了和平。似乎人民现在能安定下来,享受劳动成果了。可是,中国就不能这样。”<sup>④</sup>是的,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伤亡了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一千亿美元。人们在长期战乱中饱尝了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之苦,因此,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有一个民主和平的新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重整山河。但是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顾民意,顽固地拒绝走和平民主的道路,一心要消灭在抗日战争中尽了重大努力,付出很大牺牲同时也得到很大发展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共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84~1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7页。

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其他民主势力。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的国外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sup>①</sup>日本刚作了投降表示,蒋介石政府的最高统帅部便在8月11日,对国民党军队、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和沦陷区伪军下了三道不同的命令,对解放区部署重兵,准备以武力消灭中共及人民军队。

经济问题就是国民党政府继发“国难财”之后,又竞相大发“胜利财”。它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既是对敌伪存下物资的大掠夺,又是对人民财产的大搜括,接收竟成了“劫搜”。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劫搜”和军政官员的胡作非为,很快就在收复区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失去民心,断送了它在收复区及国统区的威信,再一次使人民大所失望。当时在平、津、沪、宁一带流传的“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充分地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失望情绪。对此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Wedemeyer Albert Cobay)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sup>②</sup>

由此可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回到抗战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它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打内战。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及其政府为了乞求和换取美国的援助,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条约和协定,如1946年11月与美国签订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帝国主义企图使中国成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因而,以美国政府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

<sup>①</sup>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5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sup>②</sup>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9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主要矛盾。宋庆龄要求国民党实行联合政府和人民民主，“否则就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并对国民党发出了严重警告，指出：“国民党是不能在这种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只要美国政府“不再供给军火和军事援助，那末，中国的内战就决不会扩大。”<sup>①</sup> 宋庆龄深知，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由于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特别是“农民将拥护共产党，因为它分土地给他们，并且减了税。”<sup>②</sup> 共产党发展了自己的力量。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 120 万党员的大党，成为仅次于中国国民党的第二大党；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民军队发展到 120 余万人，民兵发展到 220 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有很大的增强，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中国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特定的中国国情和特定的社会环境，排除了国内外阻力，以异乎寻常的魄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毅然接受了蒋介石集团的挑战。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斗争是人民解放“总的斗争的一部分，斗争目的就是要保证我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果实和荣誉不被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法西斯分子所篡夺。”<sup>③</sup> 经过 4 年解放战争，消灭国民党 800 万军队，结束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建立了“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sup>④</sup>

## （二）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

### 1.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地解决人民的需要。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18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18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555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19 页。

当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时,宋庆龄深知,我国的国情,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突出的表现是:我国近80%的人口在农村,基本上是手工工具解决吃饭问题;一部分现代化同大部分落后于现代化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相当比重的状况同时存在。宋庆龄和许多先进的人们一样认识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的。宋庆龄在《第一个五年》一文中,指出:“五年以前,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在我们中间永远坚决根除民族耻辱、贫穷、恐惧和愚昧无知的情况。我们开始转变过去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苦难,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结构,以便为我国人民、世界人民最大的利益而服务。”<sup>①</sup>不久,宋庆龄又在《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一文中指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跟着工业化的进展而相应地发展。……应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分清轻重缓急,根据可能的条件,来适当地解决人民的需要。”<sup>②</sup>如何提高生产力,以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要求,这就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主要矛盾。对此,宋庆龄认为“改造了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人民才从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中解放出来。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稳步地把社会推向前进,从而不断地满足自己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组织形式,他们最终能长期地、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70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23页。

多样化地、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sup>①</sup>

## 2. 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推进整个国家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怎样大力发展生产力,宋庆龄认为,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当时,她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重工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工业上和农业上进一步发展的手段。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并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工业上的强大力量,以捍卫我们的新生活,这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必需的。因此,工业化对中国来说,其重要性犹如心脏对人一样。”<sup>②</sup> 宋庆龄虽然没有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但实际上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关系作了论述。在中国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矛盾的,如何解决,宋庆龄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能够认识和利用这个规律,因此社会是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是顺利的和永远上升的,从而不断地推进整个国家的物质和文化生活。”<sup>③</sup>

## 3.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历史赋予的崇高使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宋庆龄的心情特别激动,她在《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中,指出:“我们终于取得了有利于迅速开展和平建设的国内外环境。有了这样良好的条件,我们才能从今年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才能信心百倍地奔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sup>④</sup> 并强调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7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87—588页。

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sup>①</sup> 宋庆龄在其病重之际,还念念不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认为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她在1981的5月2日所写的《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一文中指出:“历史赋予人类以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一代一代地把希望的火炬传下去,以不息的奋斗去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我们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美好。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她认为建设以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要完成这个事业,不仅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丰富经验和奋斗精神,而且需要下一代人的才智和力量。”<sup>②</sup> 因此,她特别强调:“不断地关心培育年轻一代成长,是不容忽视的。”<sup>③</sup>

宋庆龄在其革命生涯中,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up>④</sup> 注意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或赞同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并团结和争取更多的群众共同奋斗,推动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三、跟随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

邓小平在称颂宋庆龄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后指出:“尤其难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8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9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sup>①</sup> 宋庆龄遵循孙中山的“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教导,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而奋斗。

### (一) 坚定不移地走革命的道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宋庆龄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历史发展是无情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行事的。”<sup>②</sup>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队伍中有人背叛了革命,不少意志消沉的人退出了革命,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宋庆龄却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它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看来,这个失败似乎是很大的。但地理是会骗人的。”“反动派盘踞武汉、南京和上海,并且也算控制了江南的全部土地和江北一片相当大的地区。他们的权力虽然是这样地扩张了,但却并不深入。……今天,所谓‘国民政府’的话,对于国内人民既不生效,对世界各国也同样没有作用。这是目前情况的一个基本事实。反动派在中国是没有力量的。”<sup>③</sup>

宋庆龄的正确认识,来自对于中国人民力量充分估计,她说:“凡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中国的人民都已经觉醒了。他们不仅明白反动派不能得到最后胜利的弱点所在,并且知道他们自己很强,可以冲破表面的混乱现象而战胜敌人。今天他们正挺起胸膛以坚决的斗志面对未来。”<sup>④</sup> 当宋庆龄获悉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的消息后,她热情讴歌,写道:“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

① 《宋庆龄纪念集》第2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98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0-61页。



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不论阻碍多大,压迫多么残酷。这就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sup>①</sup>

当宋庆龄成为共产主义者时,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了,信仰更坚定了。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酷统治的上海,畅谈社会主义,“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sup>②</sup>

宋庆龄认为:“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的。”<sup>③</sup> 作为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当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时,宋庆龄热情的呼唤社会主义的到来,她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走革命的道路,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sup>④</sup>

当我们继续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和完成城市民主改革时,宋庆龄即看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曙光。她说:“在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及中共领导之下,我们已进入新民主主义时代,在地平线上已是露出社会主义的曙光和一幅崭新而美丽的新中国的远景。”<sup>⑤</sup> 1951年5月,宋庆龄和林伯渠等到东北去视察。返京后写了数万言的视察报告。对已出现的社会主义新因素,大力加以颂扬。她写道:“东北的农民再也不会回到过去受压迫、封建、贫匮的日子。他们已走上了集体努力的道路,走上了导入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城市的工人阶级,他们正在迅速地重建着工业,为了它在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未来发展打一个基础……新民主主义时代是走向完全组织起来的、高度效率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的准备时

---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6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34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43页。

期。”“…我们灵敏而富有创造性的人民正被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的公民,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人。”<sup>①</sup>

在中共中央公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宋庆龄积极响应。她著文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中国,并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sup>②</sup>

宋庆龄一贯关心全国青少年儿童成长,并对他们寄予厚望。她向他们发出号召:“因为你们正生长在祖国开始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因为你们很快地将要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在我们的古老的土地上亲手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sup>③</sup> 要求青少年儿童记住毛主席嘱咐的话,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更好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宋庆龄针对统购统销后出现的不利于工农联盟的思潮,利用视察江苏松江农村的机会,强调“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sup>④</sup> 她引用了联民社陈永康的话:“通过总路线宣传,大家明白了工业要发展,农业也重要;如果大家到工厂去,农业不发展,工人吃啥呢?工业发展了,抽水机来了,肥田粉也便宜了,将来还有拖拉机,所以农业一定要支援工业,工农结成巩固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宋庆龄强调:“我们应当加强这种宣传教育,因为目前国内外正有一些不愿意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在挑拨我们的工农关系,企图破坏我们的工农联盟。”<sup>⑤</sup>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应邀列席了建国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在会上高兴地致词:“我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3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2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22~123页。

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到那时,无疑地,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制度就更要普遍,人类也就要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sup>①</sup>

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国内少数右派分子趁此机会,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捍卫社会主义。她先后发表了《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团结就是力量》等政治论文,严肃地指出:“我国今天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绝大多数人民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道路。但是,要达到我们的目标,需每一个中国人作出英勇的努力。”<sup>②</sup>

宋庆龄以亲身的体验,教育和开导人们:“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上从未见过一个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领导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情况,只有共产党在行动上最勇敢、最坚决。它把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在坚持实践中运用到中国革命中。正如事实所一再证明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打败国内外敌人所必不可少的阶级决心。”<sup>③</sup> 并多次强调指出:“至于应该由谁来领导我们全国力量的伟大团结和运用,历史已经使得共产党具备了领导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sup>④</sup>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族人民领导的核心力量,只有她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苏共20大以后,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共反苏的逆流,否定社会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7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8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83页。

主义,鼓吹马列主义过时的谬论。宋庆龄在莫斯科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表了题为《全人类将选择社会主义》的讲话。她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指出:“三十年前,当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在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最后指出:“我们的事业是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和正义。这个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我深信,在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将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剥削和民族压迫将会永远消灭。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将会出现普遍的和睦。”<sup>①</sup>

宋庆龄十分注意对少年儿童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同时认为关键在儿童的家长尤其是母亲。1958年6月1日,她发表了《在儿童节向母亲说几句话》的文章,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我们祖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并强调指出:“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个人或者集体,无论在家庭里或者社会里,我们都应该用严肃和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一任务。”<sup>②</sup> 宋庆龄着眼于当代,更着眼于未来。她经常提醒和教育人们:“社会主义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sup>③</sup>

## (二) 坚持不懈地保卫世界和平和争取民族独立

宋庆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战士,在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其在国际上的影响,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宋庆龄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是世界形势发展的主流。她在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各殖民地国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93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06~307页。

<sup>③</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65页。

家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新形势后,指出:“亚非各国人民……开始有力地表达他们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决心。这种发展是在各个国家中以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程度上实现的,但在亚洲和非洲到处都表现出来,首先表现于一大批赢得独立的亚洲国家以及空前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sup>①</sup>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60年代,出现了本世纪的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由于二次大战是人类历史一场空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使各国人民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民族和民主觉悟空前提高,对独立的要求大大高涨;而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国家或是战败或者削弱,自顾不暇,已无力维持对殖民地的高压统治。美国“迫于大势所趋,特别是迫于各国人民要求和平正义的不折不挠的意志,不得不在口头上称道和解精神,并且承认——尽管是为了敷衍——亚非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sup>②</sup> 即使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强国也“不能倒转正在亚洲和非洲展现的历史潮流。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是按照一定规律行事的。”<sup>③</sup>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世界殖民体系终于土崩瓦解,涌现出朝鲜、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伊拉克、埃及、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

宋庆龄认为,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的。1949年12月,她在《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这两个概念是分不开的”。“每一个亚洲民族获得它最高的胜利,也就是世界和平前途又增加了另一个环节。”“它们只能够一起得到,而且必须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争取。”<sup>④</sup> 不久,她更加明确指出:“和平必须建筑在一切民族平等和各国建立

---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9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2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9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5页。

受,宋庆龄利用国际讲坛和出国访问等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她在《和平的潜力》一文中指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决不牵涉放弃自己的主张和信仰,也不牵涉把一方的主张和信仰强加于另一方。我们承认思想上存在着分歧,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承认在绝大多数人中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我们要强调与别人有共同之处;都希望不要威胁和反责他人,紧张局势能得到缓和,能创造条件,使各国之间都能进行合作,而不论他们有怎样有不同的制度。”<sup>①</sup>

针对帝国主义报纸和电台的受过训练的工具散布中国不愿意和平共处的谎言,宋庆龄发表文章,严正指出:“中国愿意同任何人和平共处,甚至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事实上,我们必须同它共处。帝国主义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也是客观的现实。现在它们并存在世界上。然而我们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我们愿意对帝国主义卑躬屈节。”进而指出:“问题在于有没有和平共处并不单单取决于我们。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是他们自己决定的”。<sup>②</sup> 宋庆龄是和平共处的创导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宣传者,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庆龄毕生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而呕心沥血,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她认为和平事业是正义事业,争取和平保卫和平必须进行斗争,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同时,她深知人类历史的发展业已证明,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曲折的,甚至会暂时倒退,会遇到艰难险阻,但只要绕过暗礁浅滩,又会奔腾向前。由于她深谙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绝不动摇,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18~119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57~358页。

## 第二章 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

宋庆龄从1914年9月起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1915年10月,与孙中山结婚后,不仅成了孙中山的革命伴



侣,而且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宋庆龄跟随孙中山经历了讨伐袁世凯、护法运动等斗争,得到了锻炼;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宋庆龄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她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坚持革命原则,坚决捍卫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

策,同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一、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

#### (一) 真正的革命伴侣和得力助手

宋庆龄早年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4年9月,由于孙中山的秘书宋霭龄回上海结婚,经孙中山同意宋庆龄接替她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宋庆龄投身革命之时,正是孙中山革命途中面临种种困难和挫折之后。“二次革命”失败了,革

命党人“精神溃散,相继败走”,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谮”<sup>①</sup>。孙中山面对这些情况痛苦异常,为使革命火焰不至熄灭,他决定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然而,由于革命队伍的分裂,孙中山组织新党的工作并没有取得成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时正处于低潮阶段,不仅外部敌人强大,更糟的是内部也四分五裂。

在孙中山危难的日子里,得到了宋庆龄的巨大支持和鼓舞。宋庆龄才思敏慧,文笔流畅,工作热情。她积极帮助孙中山工作,每天有条不紊地整理所有文件、处理机要函电、提供资料,把对外联络、经管革命经费等繁重的工作都担负起来。她以其对祖国的挚爱,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担任的工作之中,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宋庆龄在孙中山身旁的工作中,逐渐深化着对他和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理解,她深知中国必须要一次彻底革命才能得到改变,而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宋庆龄逐步成了孙中山革命事业上离不开的助手。年轻的宋庆龄是热情的,充满着理想主义,回国后她就献身于中山先生的主义,以秘书身份替中山先生服务。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在伟大理想的互相吸引下,通过思想交流,宋庆龄和孙中山在革命工作相处中默默地相爱了。她意识到,自己正在献身于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目标。宋庆龄把自己的幸福与“委身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宋庆龄之所以与孙中山结婚,最主要的是因为她“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中山则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sup>②</sup>。1915年10月,宋庆龄力排家庭的阻拦和亲友的非议,决定和孙中山结为终身伴侣。

在以后的工作中,宋庆龄忠心耿耿,踏实苦干,悉心辅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表现了超群的智慧,过人的胆识,孙中山的贴身卫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sup>②</sup> 《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0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孙中山患有严重的胃病,影响到他的健康。据曾担任过他秘书的田桓回忆,由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体贴与照料,使他的胃病大有好转,因而有较好的体力和精力。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孙中山完成了重要著作《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在这一工作中,宋庆龄是他永不倦怠的助手,孙中山撰写的著作,无不包含宋庆龄的汗水,凝聚宋庆龄的心血。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亲密伴侣,而且成了孙中山最忠实的支持者。孙中山每次公开露面,宋庆龄总是不离左右。

谦虚谨慎的宋庆龄所以这样做,完全是服从革命的需要。她在寄往美国的一封信中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害怕抛头露面!但是自从结婚以后,我不得不参与许多事务,否则我不会参加的。中国人与欧洲人不同,他们并不是把美名和荣誉给予当之无愧的人,而是强加于弱者的身上。我每天都要会见许多人,实际上是环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与人交谈……”<sup>①</sup>。

孙中山喜欢读书,他常说:“我一生的嗜好,除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sup>②</sup> 宋庆龄深知孙中山的嗜好,随时为他收集报刊杂志,陪同他去书店购买书籍,不管新书旧书,只要有参考价值就买。买回的书,宋庆龄细心地分门别类,把书井井有条地放入书橱,以便孙中山查阅。

孙中山试图从理论上总结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阐述他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观点,继续寻求救国道路,进而写出自己所设想的建设国家的宏伟蓝图,提出一整套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方针和策略,表现出孙中山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实践精神和实现中国民主化、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他豪迈地断言:“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

<sup>①</sup> (美)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第119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sup>②</sup> 尚明轩:《孙中山传》,第45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sup>①</sup>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去世了。宋庆龄虽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仍振作精神,为帮助孙中山更多地了解时局,向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还坚持每天忙于帮他抄写书稿、打字、处理大量的来信来电等工作。当时国内外对宋庆龄的卓越才能和贡献曾有这样的评论:“非夫人之才能不足以佐先生之事业”。“她的辉煌的头脑充实了她丈夫的头脑,完成了他伟大的人格”<sup>②</sup>。这些评论是中肯的。

## (二) 热情支持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初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唤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意识的觉醒。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撤消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并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次爱国运动达到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要求。

“五四”运动让孙中山和宋庆龄看到了新的力量,新的希望。从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坚定地站在广大群众一边,满腔热情地支持爱国学生。宋庆龄则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声援电报,孙中山、宋庆龄替学联聘请律师,准备随时出庭为被抓的爱国学生辩护,并接见学生代表。许德珩回忆道:“1918年暑假,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为了阐述反帝爱国的宗旨,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这是我们认识她的开始。……1919年8月,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再一次拜会了中山先生。这次访问,我们与中山先生就国家大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宋庆龄同志依然坐在那里打字。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议论,都认为

<sup>①</sup> 《孙中山选集》,第38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sup>②</sup> 《羊城晚报》,1981年6月6日。

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广州城几十万军民参加庆祝大会。下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群众队伍秩序井然，在大雨中昂首奋进，显示出广大群众衷心拥护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推行新政，出师北伐的坚强意志。看到这个场面，孙中山、宋庆龄十分感动，频频向冒雨前进的群众队伍挥手致意。

同年10月，孙中山出巡广西，准备北伐，宋庆龄随行，抵梧州。孙中山定桂林为大本营，督师北伐。宋庆龄为了支援孙中山北伐，返回广州，与何香凝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由宋庆龄担任会长，何香凝担任总干事。在这期间，宋庆龄动员各界人士，募集到巨额经费，组织慰问队到前线慰问出征的将士。12月，当她得悉孙中山抵达桂林、成立大本营后，立即率领红十字会员在马湘和张发奎的护送下，从广州赴桂林，“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sup>①</sup>。孙中山亲自到阳朔迎接宋庆龄。

宋庆龄在桂林期间，组织妇女成立了“桂林市妇女会”，桂林妇女国民党员也由原来仅有一人迅速发展二百多人<sup>②</sup>。不仅开展妇女工作，还陪同孙中山视察地形；常常邀请妇女界人士如邓家彦夫人、谢馥如、勒永芳以及何若真等磋商配合北伐事宜。

在桂林期间，宋庆龄热情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罢工是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的起点，是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桂林，正当孙中山忙于军事部署的时候，身兼数职的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与直系军阀相勾结，反对北伐，停止供给军需，密谋反叛。这时孙中山感到后方不稳，遂决定将大本营迁至韶关。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督师北伐。许多红十字会医疗人员随宋庆龄同赴韶关配合北伐。在此期间，宋庆龄

<sup>①</sup>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2日。

<sup>②</sup>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2日。

追随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韶关、桂林、梧州等地，劳苦奔波，历经艰险，南征北战，督师北伐，巡视前线，从事反对军阀的革命斗争。

#### (四) 临危不惧 羊城脱险

孙中山在韶关获悉陈炯明有异，6月6日偕同宋庆龄回广州。16日凌晨2时许，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以4000人猛攻总统府，妄图置孙中山夫妇于死地。孙中山侍卫马湘和黄惠龙不断催促孙中山夫妇离开总统府。宋庆龄考虑到孙中山带着她惹人注目，反使他难以脱险，于是坚持自己留下，掩护孙中山撤离，她说道：“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sup>①</sup>孙中山被宋庆龄的一颗忠于他的事业，忠于革命的赤诚之心所打动，终于同意她的请求，化装成一位出诊的医生，急速离开了粤秀楼。宋庆龄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为救护革命领袖，也为挽救中国革命立下了一大功劳，她是一位浩气冲天的女英雄。

孙中山离开后，宋庆龄实际担负起了保卫总统府、掩护孙中山脱险的重任。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让侍卫打开所有电灯，迷惑敌人，造成孙中山仍在粤秀楼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火力，同时她急忙烧毁机密文件，并要卫队沉着应战，等敌人走近再猛烈开火。

1922年6月，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记述了蒙难的经过：“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用野炮瞄准向宅中射来……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到了八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卫队停止回击，只留几盒子弹，候着最后的决斗……队长劝我下山，为惟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

“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中山先生的侍卫）。我们四人，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由我

① 《宋庆龄纪念集》，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鬓边经过……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这总统府四周也是炮火……”。

宋庆龄在一片混乱中冲出大门，“幸而我头戴姚副官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又逃了一大段路，“我再也走不动了……我昏倒下去……”。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姬，而剩余的一个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那夜通宵听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到战舰开火的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宋庆龄最后写道：“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姬，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

“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别重逢。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来沪。”<sup>①</sup>

对宋庆龄当时与孙中山会合的情景，永丰舰二副至今记忆犹新。他记得“当时宋庆龄镇静从容，含笑会见孙中山，畅谈了几个钟头后才乘船赴香港，转往上海”<sup>②</sup>。

在冲出敌人重重包围过程中，宋庆龄还表现了她难得的冷静和坚定精神。在向外冲杀中，卫兵们都表现得很勇敢，但在危急时刻也有少数人动摇。宋庆龄稳住军心，继续战斗曾下令：“无论何人投降，都予以枪决。”<sup>③</sup>从而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在广州遇险时，宋庆龄正怀孕。由于紧张、恐怖与劳累，她在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19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广州日报》，1981年5月29日。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580页。

脱险途中流产了。何香凝回忆道：事变发生后，我几次找宋庆龄，“最后才打听到孙夫人在她同学的家里暂住，我在岭南大学一所房子里找到她，孙夫人在途中小产了”<sup>①</sup>。廖梦醒也写道：“由于紧张和劳累，到岭南大学钟荣光家她就流产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sup>②</sup> 由于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在结婚7年以后难得的一次怀孕遭到了流产，这对她和孙中山在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她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她热爱孩子，而据医生以后的检查结果是她不可能再妊娠了。

广州脱险，对她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她在这次惊心动魄的事变中，历尽了艰险，虽然身体受到摧残，但她经过这场枪林弹雨的洗礼，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在以后，她身处逆境的时候，从不气馁，总是临危不惧，不屈不挠地向前奋进。

6月下旬，宋庆龄由孙中山的顾问那文（美国人）护送，从香港回到上海家中休息治疗，孙中山则在永丰舰上苦战了50多天。由于陈炯明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在军事力量上占优势，北伐军回师讨陈失利，孤军无援，二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只得离粤返沪，8月18日抵达上海，在莫利哀路寓所与宋庆龄团聚。

## 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 （一）国民党改组前的状况

在孙中山进行革命进程中，国民党日益暴露出了其成员庞杂、组织涣散，依靠议会和军阀，脱离民众等致命的弱点。一批官僚政客混进了国民党，许多投机分子想凭借国民党这块招牌来谋取个人的权势和私利，一些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党员也颓废消沉，失去了原来的革命精神。对此孙中山深感忧虑，感到不改组国民党就无法实现他救国建国的大计，他曾感叹：“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

<sup>①</sup>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第29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sup>②</sup> 《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4日。

斗者历有年所，……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sup>①</sup>。为了加强国民党的自身建设，孙中山曾多次进行整顿和改组。1914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就下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因为国民党已成为面目全非、良莠不齐的团体。只好重新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孙中山又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重新明确“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想以此来建设和维护国民党的形象，但是1922年“干戈起于肺腑”的陈炯明叛乱给了孙中山严重的打击，使他深深地陷于彷徨与苦闷之中。宋庆龄回忆当时孙中山的心情时说：他“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我曾多次听他说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怎样使它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中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怎样领导革命斗争，这是他想得越来越多的问题”<sup>②</sup>。宋庆龄深切地理解孙中山的这种心情，她一方面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孙中山，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热诚地与孙中山一起探讨总结经验和教训，探寻革命新的出路。

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改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前进方向的重大事件，使孙中山看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促使他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并“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sup>③</sup>。后来宋庆龄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当他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都缺乏坚实基础时，他并不畏缩。通过对这一问题的严格的

① 《孙中山选集》，第53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自我检查和许多新朋友的帮助,他开始看到了光明。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sup>①</sup> 她还指出“孙中山十分珍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sup>②</sup>。

## (二) 协助孙中山与苏俄、中共建立联系

1. 协助孙中山加强同苏俄联系,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确立“以俄为师”的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孙中山开始把向西方学习的眼光转到俄国,为了帮助孙中山进一步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从中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按照孙中山指示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收集有关“十月革命”的各种资料,购买《俄国的新生》、《追踪布尔什维克》、《战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等有关介绍俄国及社会主义的书籍。宋庆龄经常同孙中山一起阅读、研究这些资料,以便从中找出可以借鉴的经验。孙中山多次对宋庆龄讲:“一个民族要获得解放,必须效法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人民的榜样”<sup>③</sup>。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曾发表许多文章,赞扬和高度评价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他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赞扬孙中山在比利时社会党报纸《人民报》发表的《中国革命底社会意义》一文中所概述的纲领,他评价道:“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个纲领)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9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5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91页。



越飞。1923年1月越飞亲抵上海莫利哀路29号与孙中山商谈中国革命问题。孙中山、宋庆龄热诚接待列宁派来的代表,孙中山与越飞连续谈了六天,宋庆龄作为秘书参加会谈,并为安排会谈做了许多工作。在会谈中,双方就改组国民党、建立军队、苏俄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达成一些原则意见。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标志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确定。

## 2. 支持孙中山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国民革命。

孙中山看到帝国主义已成了主要敌人并又有苏俄十月革命的榜样后,他更多的是想怎样领导革命斗争的问题,正当他在寻求新的出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农群众运动,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很快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性”,确信中共是一个新的伟大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sup>①</sup>。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宋庆龄在促进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中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与宋庆龄回到上海,中国共产党及时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断绝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这使处于危难之中的孙中山更为感动。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同自己倡导的国民革命,基本任务是一致的,是时代和全国“人民群众的需要”;而这种“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sup>②</sup>。他决心把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同他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因此孙中山在与苏俄代表联系的同时,积极与共产党人进行广泛接触。

1922年8月,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赴杭州参加西湖会议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8、393页。

<sup>②</sup> 《孙中山选集》,第593页。

前后,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同孙中山多次会见。孙中山和宋庆龄热烈地欢迎李大钊的到来,孙中山与李大钊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进行讨论,宋庆龄参加了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畅谈不倦,几乎忘食”<sup>①</sup>。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赞赏,愿意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说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孙中山说:“这不大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几天后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由张继介绍正式加入国民党。宋庆龄后来回忆:“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孙中山特别敬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sup>②</sup>。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对改组国民党的信心更足,孙中山对李大钊说: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为了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后来宋庆龄还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李大钊寄了一本。宋庆龄经常在晚上为孙中山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与孙中山探讨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及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89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93页。

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麼用处呢?”<sup>①</sup>正是在这些讨论中宋庆龄进一步了解了国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的真谛。宋庆龄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促进孙中山确立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 (三) 支持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心联合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并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实质性工作。

1922年9月至12月,孙中山在上海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改组国民党会议,正式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了吸收新的血液改变国民党组织上、思想上的涣散状况,孙中山非常重视和信任已经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请他们积极协助筹划国民党改组工作。9月6日,他指定陈独秀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九委员之一,负责起草改进计划。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会上孙中山发表了演说,他说:现在本党修改新章程就要觅一班人才来担任党务进行。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是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必可。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1月下旬,孙中山宣布了有共产党人任职的国民党本部干部名单。

1923年2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并继续进行改组国民党工作。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孙中山认为“鲍君办党极有经验”便立即委任他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宋庆龄协助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家属中做了大量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二卷,第178页。

工作,鲍罗廷夫人后来回忆说:“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对我以及所有的苏联同志很热情友好,她一直积极参与她丈夫的政治活动,我们与她来往同样也可以不用翻译,因为她英文相当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很多关于中国妇女的饶有趣味的事情,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很多代表,我后来不止一次与她见面”。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打电报给国民党上海事务所,着其密电已被委任为改组委员的李大钊到上海商讨改组国民党事宜,稍后李大钊从北京直接来到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问题作了具体说明。11月25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在宣言中孙中山总结了自兴中会成立以来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指出:“窃以为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的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政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的目的”<sup>①</sup>。在此前后,孙中山又委任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中共党员)、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着手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指导大会代表选举等,国民党改组工作至此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然而国民党内部对于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分歧很大,斗争异常激烈,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改组。一部分人同意联俄但反对联共。1923年11月当《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改组国民党。11月18日上海国民党本部接孙中山指示,两次开会讨论联共改组国

<sup>①</sup> 《孙中山选集》,第537页。

民党的问题,会上主持人谢持以“党中不可有党”为由带头反对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孙中山为了说服他们,命廖仲恺等前往上海,向上海国民党本部同仁长谈了3天,阐述改组国民党理由和联共的旨意。经廖仲恺解释后,多数人在会上不再发表异议,但在国民党右派中不少人仍然企图阻挠孙中山联共和改组国民党。在“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时时被这些“元老们”包围,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还经常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极危险的后果来劝说孙中山放弃联共政策,还通过他们的朋友从海外给孙中山打来电报,表示担心(改组后)国民党会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当时孙中山承受着巨大压力,宋庆龄与廖仲恺等左派一起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协助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当时有一些人找到宋庆龄,企图通过孙中山夫人帮助他们说服孙中山放弃联共及改组国民党的政策,但宋庆龄拒绝了。宋庆龄还对孙中山的秘书田桓讲了关于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鼓励他要为国家民族命运着想,要继续努力为革命工作。在宋庆龄、廖仲恺等左派支持下,孙中山决心力排众议把自己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决策付诸实施。孙中山对邓译如等人说:“你们不赞成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加入共产党”<sup>①</sup>。

1924年1月20日在经过各项准备工作后,以改组为中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词中把这次盛会称为国民党历史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在会上他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讲了恢复革命精神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三件大事:(1)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次组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2)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3)加强全党团结,“大家团

<sup>①</sup>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第28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象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sup>①</sup>。他号召全党同志“群策群力,努力而行”改组好国民党。

担任孙中山秘书工作的年轻的国民党员宋庆龄,虽然没有以代表身份参加大会,但她始终是大会的积极支持者。

经过激烈争论,大会最后通过《宣言》和《章程》。《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并正式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从此,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民党经过改组后获得了新生,发展壮大起来,各省普遍建立起党部,国民党内出现了生气勃勃气象。国共合作的形成,揭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新篇章,迎来了孙中山宋庆龄盼望已久的国民革命的新的新高潮。

#### (四) 创建黄埔军校

孙中山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懂得:要革命就要改组国民党;要革命就要筹建革命军。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亲自主持通过建立军事学校的建议。孙中山亲手创办并亲自命名该校为“陆军军官学校”,其宗旨为: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组成该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以革命的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很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这所学校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办起来的。周恩来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招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sup>②</sup> 1924年6月16日,是孙中山广州蒙难两周年纪念日,选定这个日子作为军校开学的日子,实在有毋忘前耻,发奋图强的意思。孙中山和宋庆龄出席开学典礼,由教授部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8页。

<sup>②</sup>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11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主任王伯龄带领各教官晋见,又由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带领各队长及特别官佐晋见。孙中山和宋庆龄又巡视学校的讲堂和寝室。随后,孙中山到礼堂发表演讲。他说:“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sup>①</sup> 演讲结束后,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和廖仲恺一同登上主席台,检阅部队。

是年8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又到黄埔军校观看学生战术实施。宋庆龄通过多次参加军校的活动,知道不少军事知识,这对她后来进一步重视和关心革命军队的行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三、继承孙中山的遗志 捍卫孙中山的革命原则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给解决全国统一问题带来了新的转机与希望。

孙中山于11月13日上午离开广州北上,19日在上海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北上宣言》,随即取道日本赴京,并在日本作短暂停留。12月4日,乘“北岭丸”到达天津,宋庆龄和孙中山一同登岸,受到了两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与宋庆龄由天津乘专车入京,受到北京各界10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下榻北京饭店,宋庆龄体贴入微,细心侍病。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经专家诊断,确诊为肝癌,已无法医治。2月18日,孙中山出院迁居铁狮子胡同行馆。宋庆龄日夜照料,坐守床侧。孙中山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留下了三份遗嘱:《国事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

孙中山,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卓越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的自由和民生的幸福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奉献了毕生精力。3月12日溘然长逝,享年59岁。

<sup>①</sup> 《孙中山选集》,第917页。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遗志,积极地投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

### (一) 旗帜鲜明地支持民众的革命运动

孙中山的逝世,举国悲哀。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战友、学生和伴侣,更是悲痛欲绝。但她没在悲痛中倒下,而是战胜了悲痛,战胜了眼泪,坚强地挺立起来。她要在大革命的风暴中经受考验;她要在黑暗的旧中国、在反革命势力的重重包围中,高举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激励她的力量。宋庆龄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她以自己的言行告示世人: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忠诚继承人和坚定捍卫者。

宋庆龄的心是和广大民众相通的。她始终与民众站在一起,全力支持、帮助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孙中山去世后仅10周,在沿海最大的城市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随即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宋庆龄被反帝爱国的民众运动所鼓舞,对上海《民国日报》的记者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谈话。这是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自己独立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表示她在今后革命斗争岁月里,对一切重大事件都将毫不犹豫地按照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原则去处理。

宋庆龄在这篇谈话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并深刻地指出,“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她谆谆教导民众“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对内当一方面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她号召民众,“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民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吾人今日万不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页。



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吾人不可因畏难而遂不努力也。”<sup>①</sup> 宋庆龄在民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开始了继承和捍卫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大批工人失业,宋庆龄与沈仪彬、于右任、李佩书、徐谦等为解决失业工人衣食问题,发起成立了“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向社会各界发起募捐。6月9日发表募捐书,称“五卅事件,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之奇耻大辱。全国民众业已起来为民族独立、人权保障而奋斗。学生罢课,商罢市,工罢业,无不抱绝大之决心,为充分之牺牲。”“因罢工而失业之工人,方逐日加增而未已。吾人处兹风雨同舟之日,应有解衣推食之心。救济之事刻不容缓。”“救国为国人共有之天职,互助更人类生存之要素。海内明达,爱国济世,岂后同人,知投袂而起,解囊以助者,必踵相接也。”同日,宋庆龄在与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谈话中提出,要“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sup>②</sup>。宋庆龄在发动募捐的同时,在上海主办了一份《民族日报》,由杨杏佛负责编辑,作为民众运动的喉舌,作为抨击英、日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宋庆龄还亲自参加五卅反帝的宣传工作。她为了让学生透彻理解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深入教育青年学生坚持反帝斗争。6月10日,她应大同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前往该校作了题为《近代之外交史》的长篇演讲,使广大学生了解世界大势、各国对华政策,以及一切关于五卅惨案之社会、经济、外交等问题。宋庆龄在宣传工作中经常用孙中山言行激励国人。在6月的暑天,她挥汗伏案写作《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用孙中山在广州力争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的事迹鼓舞国人的反帝斗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5~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页。

③ 参见《宋庆龄在上海》,第35页,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志<sup>③</sup>。

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举行了一次政治大罢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省港罢工坚持了一年4个月,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宋庆龄为支持省港大罢工,做了大量工作。

她在上海为罢工工人进行募款。她向北方同胞、海外侨胞积极呼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她的呼吁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处的华人社会。光是海外华侨的捐款经宋庆龄手汇往广州的就达10万美元以上。1926年1月7日,宋庆龄到达广州。她于25日在鲍罗廷夫人陪同下接见苏兆征等8名罢工人代表,详细询问罢工工人的斗争和生活情况,提出解决省港罢工的意见,并表示以后还要直接与罢工工人见面。当苏兆征率省港罢工委员会代表团前来感谢宋庆龄为支援大罢工募集捐款时,她回答说,这次罢工是爱国行动,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加以支援。宋庆龄不仅在财政上给罢工以支持,而且作为孙中山的夫人支持这次省港大罢工,也极大地提高了这次罢工的政治声誉。

1925年6月30日,宋庆龄不顾自己生病,应邀赶赴北京参加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由于身体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宋庆龄坚定地与民从站在一起,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敬与热烈欢迎。

## (二) 全力投身于北伐战争

国共合作实现后,促进了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统一和巩固。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有效地在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为进行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工作掩盖不了广东革命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危机。为此,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高

多项革命工作。时常参加民众大会,发表演说,同鲍罗廷一起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工作。宋庆龄通过发表文章、谈话,接待来访,向全世界阐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意义,北伐战争的目的和任务,从而使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进步人士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有正确的认识,获得广泛的理解和同情,其中尤其引起一部分进步记者的注意。他们纷纷来到武汉,访问宋庆龄,并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向世界作报道,从而使武汉成为世界舆论瞩目之地。

宋庆龄在武汉期间,爱国热情高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力主收复汉口与九江英租界。

1927年1月初,为回击英国侵略者杀害中国人的暴行,汉口、九江的工人和市民冲入并占领了汉口、九江两地的英租界,并要求收回租界。事件发生后,在武汉国民政府内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鲍罗廷认为,待北伐取得全面胜利,打垮北洋政府后,再来处理收回租界问题。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则主张立即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宋庆龄赞成陈友仁的意见,并就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她说:北伐军节节胜利,在世界上已引起了强烈反应。在这样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是不敢贸然与北伐军为敌的,何况他们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态度还没有趋于一致。只要我们善于采取分别对待的策略,先妥善地解决汉口和九江两地的英租界,而对其他国家在汉口的租界(如日租界、法租界等),不妨在北伐军进占北京,打垮北洋军阀政府后再来处理,目前仍让它保持现状,则估计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是不会遇到很大困难的。这样做,比等到打垮北京政府后再来解决整个租界问题要容易些,而成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些。现在就收回汉口和九江两地的英租界,不但使英帝国主义措手不及,没有时间来联络其他在中国有租界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也不会影响北伐军的继续北上。宋庆龄的这些话,表明她不惧怕帝国主义,有中华民族的骨气,但又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她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接

受,终于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使之成为特别行政区<sup>①</sup>。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创举,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宋庆龄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职务。她热心培养妇女革命干部,致力于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革命。

宋庆龄经过紧张的筹备后,于1927年2月12日在汉口开办了“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又称中国国民党妇女政治训练班)。开班前,她发表了《敬告全国女界同胞书》,指出:“我们本党党纲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对于一切法律皆极端平等。现在广州已正式颁布了女子在公法上、私法上、民事上、刑事上皆已得着平等地位”,但是妇女要获得自己的权利,“是要靠自己奋斗来做代价的,指望别人恩赐是靠不住的”<sup>②</sup>。为此,她号召妇女赶快投身到国民革命中来,积极参加妇女党务训练班。在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上,宋庆龄发表了《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讲话。她在讲话中指出:“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她鼓励女子不仅要在小家庭中做一个“贤母良妻”,同时要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sup>③</sup>。宋庆龄担任了训练班的班主任兼会计处理员。训练班招考103名学员(正取94名,备取9名),她们都是中学毕业生和具有相等程度的中青年妇女。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孙中山历史、不平等条约的由来、妇女运动、社会主义等。此外,还讲授军事知识,如战时的救护、通讯等方面的技

① 参见《宋庆龄辞典》,第28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页。

能。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宋庆龄邀请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张太雷和富有妇女工作经验的刘清扬等担任教员。同年3月,宋庆龄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进一步阐述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的目的,以及国民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关系,称她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是“训练政治领袖”,使“姐妹均有世界眼光”<sup>①</sup>。妇女党务训练班为全国、特别为两湖地区的妇女运动培养了一批干部。

宋庆龄在实际活动中为妇女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当时,凡有婢女和童养媳到妇女协会或妇女部要求保护或解除主奴关系的,宋庆龄都给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她不但收容、安置了许多要求解放的婢女和童养媳,而且还给他们受教育、学习技艺的机会,帮助他们走上独立自由的幸福道路。她们中有的还参加了革命,投身于国民革命的战斗。

宋庆龄在武汉与何香凝、邓颖超等人一起领导妇女运动,培养妇女革命干部,组织妇女革命军的活动,在妇女最受压迫、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全国各地许多不愿受压迫的妇女,纷纷挣脱枷锁,奔赴革命中心武汉。她们穿上戎装,有的参加革命军的救护队、宣传队;有的参加汉口女子工人纠察队;有的考入武汉中央军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妇女大解放的时代,也是妇女们为中国革命作出极大贡献的时期。宋庆龄为此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她以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的行动,证明自己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证明自己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名坚强战士。

为了有效地救护在战争中受伤的伤员,推进革命事业,宋庆龄急革命之所急,不辞劳苦,四处奔走,与何香凝共同发起成立“北伐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2页。

红十字会”，积极为红十字会筹款，购药，组织救死扶伤的工作。她号召大家为“北伐红十字会”多作贡献。后来，宋庆龄又担任了“北伐伤兵救护会”委员长，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使在北伐战争中，流血受伤的伤病员得到了精神上的莫大安慰和较好的治疗。宋庆龄所做的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她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这个思想，贯穿于宋庆龄伟大的一生。

### （三）坚定地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日益猖獗。他们纷纷组织右派小集团，如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广东的“孙文主义学会”等，进行分裂活动。1925年8月20日，他们杀害了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廖仲恺；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所谓“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党员李大钊”等议案，公然分裂革命阵营。

在这危难时刻，宋庆龄毅然挺身而出。她号召革命党人学习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并依靠共产党人，支持吴玉章出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长，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将国民党右派一拖再拖的国民党“二大”筹备起来。1926年1月7日，宋庆龄带病从上海到达广州后立即出席了国民党“二大”。她站在主席台上，以斩钉截铁般的声音，严厉谴责右派集团违背孙中山的遗训，同时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要共同努力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宋庆龄和与会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大”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等决议案，重申国民党“一大”制定的纲领，并以开除党籍、警告等方式惩处了“西山会议”的首要分子。此举稳固了国民党的基础，挽救了国民党的倾颓。

由于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

人，组织政治会议武汉分会。1月5日，他还联名通电武汉，决定中央政府“设在南昌，暂不迁鄂”，诬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为非法。

迁都之争，实质上是捍卫革命领导权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场严重斗争。宋庆龄对此立场坚定，寸步不让。1月7日，她与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蒋介石等，明确表示要按既定协议迁都武汉，敦促他们速来武汉办公。宋庆龄还去电指责蒋介石在南昌徘徊不前，有误革命。12日，蒋介石到武汉，妄图坚持错误立场。宋庆龄严肃告诫蒋介石，不要对抗中央而独断专行，要迅速让滞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来武汉。蒋介石还在由联席会议召开的，有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受到与会群众的严厉质问。鲍罗廷在讲话中也对蒋介石进行了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对武汉各界代表明确表示：“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sup>①</sup>但是，蒋介石对群众的质问和宋庆龄、鲍罗廷的批评恼羞成怒，回南昌后，竟致电武汉联席会议，要求撤消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宋庆龄毫不理睬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在武汉地区发动了一场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的运动。武汉各界纷纷举行集会，通电南昌，要求迅速迁都武汉。宋庆龄还特别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催促他们迅速到武汉来。经过如此的反复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迁都武汉。滞留南昌的谭延闿等人均于3月7日抵达武汉。

反对蒋介石挟持国民政府的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宋庆龄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革命旗帜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的革命立场，深得大家的信任和尊敬，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大革命虽在向前发展，但蒋介石仇视

<sup>①</sup>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国共合作,发扬民主,提高党权,防止个人军事独裁等一系列决议。他加紧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相勾结,公然走上了背叛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反革命道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革命中心相对抗。

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她于4月22日在武汉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愤怒声讨蒋介石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在宋庆龄等人的推动下,武汉和两湖地区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但革命形势仍在恶化。4月15日,广东也发生反革命政变。此时,在武汉国民政府已陷于十分危险境地的困难情况下,宋庆龄毫不动摇,仍然坚持斗争。

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颠覆活动下,革命危机日益加深。在武汉地区反革命逆流滚滚而来。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意志不坚定者,有的叛变,有的投降,有的隐退。但“疾风知劲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激烈较量的日子里,宋庆龄毫无畏惧。她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坚决谴责一切背叛行为,在反革命逆流中傲然挺立。

5月17日,21日,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和三十五军团长许克祥先后发动叛变。宋庆龄对叛乱表示极大的愤怒,坚决支持叶挺及工农武装镇压叛乱的正义行动,坚决主张讨伐夏斗寅、许克祥。但汪精卫等却指责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过火”,是“外国的产物”,把许多爱国人士“吓跑了”等等。为此,宋庆龄同汪精卫等人也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痛斥他们违背孙中山遗教的行径。宋庆龄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



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忠于这种信心。”<sup>①</sup>

汪精卫等人置宋庆龄的忠告于不顾,不再依靠工农大众,积极策划反共。宋庆龄严正警告汪精卫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她针对国民党一些军事将领提出驱逐鲍罗廷的无理要求,满腔愤怒地说:“鲍顾问是总理所聘请来的,你们这些军事将领没有资格来驱逐他。”并坚决主张由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这些将领们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明令讨伐。宋庆龄鲜明的态度引起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官们的嫉恨。他们与南京蒋介石集团相呼应,放出种种流言蜚语,对宋庆龄发起攻击。当时,蒋介石委派孔祥熙携带他所写的亲笔信到武汉拉拢宋庆龄。对于国民党右派的造谣中伤和拉拢,宋庆龄毫不退缩,屹然不为所动。

形势的发展,斗争的浪潮,考验着每一个人,也考验着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劝说宋庆龄也投奔南京政府。在困难而严重的抉择面前,宋庆龄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徘徊,毅然选择了坚持革命这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她坚定地向弟弟宋子文表示,坚决不同南京政府合作。如果武汉政府垮台了,也还要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使宋庆龄同自己的姐妹兄弟们不得不分道扬镳了。人各有志,人们看到了宋庆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大形象。

汪精卫是国民党中的假左派,真右派。他步蒋介石的后尘,也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叛变道路。1927年7月14日晚,汪精卫悍然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纲领。宋庆龄断然拒绝出席会议。当天,她撰写了一篇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声明。这就是著名的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sup>②</sup>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5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页。

宋庆龄在声明中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和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实行彻底决裂。

宋庆龄在声明中愤怒声讨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严厉谴责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

宋庆龄在声明中彻底撕下了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真实信徒”的伪装,深刻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宋庆龄在声明中对革命的胜利前途表示了坚定的信念。她宣告:“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她坚信违背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

七一四声明的及时发表,给叛徒们以沉重打击,极大地伸张了正义,给革命人民指明了方向,鼓舞人们去进行新的斗争。宋庆龄并不是最早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人,但却是最忠诚于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原则,对孙中山的政策从不动摇的人。七一四声明,是宋庆龄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有力佐证,是宋庆龄一生奋斗中的又一座重大的里程碑。从此,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决捍卫者和忠诚继承者。

#### (四) 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出访莫斯科

孙中山曾有赴莫斯科进行访问这样一个“最珍贵的愿望”。但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他嘱咐宋庆龄代他实现访问莫斯科的愿望。

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在大革命失败后寻求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同时表明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原则

立场,宋庆龄毫不理会蒋介石对她的拉拢,也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出访莫斯科。

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在声明中,她高度评价了三大政策在大革命中所取得的实绩,严厉谴责了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无耻行径;同时明确地表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因此我得出结论,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sup>①</sup>她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sup>②</sup>

9月6日,宋庆龄一行抵达莫斯科。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宋庆龄受到了苏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不仅因为宋庆龄是与列宁结下深厚情谊的孙中山的夫人,而且是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仍然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旗帜的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

宋庆龄到达莫斯科后,在参观访问,会见苏联友人的同时,勤奋地工作,忙于撰写《中国目前的形势》等一系列文章,说明中国的现状,表示中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呼吁苏联继续同情和帮助中国革命。为了鼓舞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能够成为继承孙中山遗志,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旗帜的革命栋梁,宋庆龄在百忙中应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演讲。她说:“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又曾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受过训练,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sup>③</sup>。宋庆龄的演讲,不时为学生们的掌声所打断,学生们感到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不愧为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勇敢捍卫者。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页。

③ 《宋庆龄辞典》,第5页。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与邓演达、陈友仁多次交谈“革命大计”,希望能够和左派领导一起共同努力,挽国民党于既倒狂澜。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联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重申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了临时行动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团结带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向军阀和一切反动派作坚决斗争,建立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中国人民脱离苦海,获得新生。宋庆龄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同蒋介石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12月,蒋介石南京政府以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是受苏联领事馆的煽动为由,派兵围攻广州苏联领事馆,杀害了副领事等十余人,最后悍然决定与苏联断交。蒋介石将与苏断交的决定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宋庆龄,遭到她的坚决反对。宋庆龄认为这是涉及捍卫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原则问题。12月17日,宋庆龄复电蒋介石,严正指出:“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sup>①</sup>宋庆龄要求蒋介石“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第二天,蒋介石再电宋庆龄,污蔑她在莫斯科停留和复电是受别人胁迫的结果,并请宋庆龄“速归”。宋庆龄接电后,怒不可遏,于23日电复蒋介石,予以驳斥:“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sup>②</sup>宋庆龄在电报中还表达了自己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决心:“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三卷,第67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8页。



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sup>①</sup>。对日军在东北不断挑衅的升级，蒋介石还特向张学良发出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sup>②</sup>。而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于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sup>③</sup>。“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反动政策的确立和实行，反映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其基本政策就必然体现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而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的特点。

1931年8月，宋庆龄因母亲病逝回到上海后，目睹了蒋介石政府面对日寇入侵，采取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对内加紧“剿”共、对抗日学生实行镇压等事实。尤其在得知蒋介石杀害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后义愤填膺，于12月20日，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宣告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决裂，并积极投入“反蒋抗日”的斗争。

宋庆龄对蒋介石政府实行的基本国策所进行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攘外安内”政策的阶级性和其产生的深刻政治原因。她在《宋庆龄之宣言》等文章中揭示蒋介石政权，在本质上“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sup>④</sup>。她说，“在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的命令之

① 《1931年大事记》11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1931年大事记》11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荣孟源：《蒋家王朝》51～5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下,这个‘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因为这个政权是“地主及资产阶级联盟的代表”,而“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领袖只有一个要求和希望,那就是,希望帝国主义者允许他们继续执掌政权,以便分得一份由蹂躏和榨取中国人民而得来的利益”<sup>①</sup>。“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sup>②</sup>她分析作为日本肆无忌惮地扩大侵华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农工,不去打日本人。”<sup>③</sup>基于对蒋介石政权本质的认识,宋庆龄宣告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亡,并断言,“这个政府绝不能统一中国,绝不能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sup>④</sup>。针对蒋介石以“安内”政策封杀抗日言论、镇压抗日力量、摧残人民民权、对内实行白色恐怖的倒行逆施,宋庆龄指出,“年来国势凌夷,民国消沉,皆坐民权不立。”<sup>⑤</sup>她认为,反对独裁统治、保卫人民抗日救亡的民主权利是抗日反蒋斗争的必要条件。

## (二) 全力支持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入侵,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将士,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激于民族义愤,不顾蒋介石限制他们抵抗的命令,奋起抗击入侵之敌。上海人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9页。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罢工、捐献等支前运动,并纷纷组织义勇军,协助军队作战,给前线将士以极大鼓舞和支持。在这硝烟弥漫而又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宋庆龄始终与上海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忘我地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奉献了全部心力。她认为:“对于抗日战事,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sup>①</sup>

在战火纷飞中,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极大危险,多次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2月12日,她在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长的陪同下,到前沿阵地巡视,向战士致意。敌机在他们头上飞行,还不时地向地面扫射。宋庆龄镇定自若,轻蔑地望着空中的敌机,向在场的战地记者畅谈十九路军抗战的重要意义,并鼓励翁旅长说:“旅长之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激动地代表全体将士表示:“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sup>②</sup> 宋庆龄对前线将士的慰问,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支持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抗敌官兵决战到底的信心。他们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坚守吴淞要塞,直到全军被迫撤离。

为了救护从前线退下来的十九路军伤兵,宋庆龄与何香凝等人一起,筹集募款,向交通大学商借房屋,办了一个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宋庆龄亲自担任该院理事,主管医院事务。院中全体职员均尽义务,不拿任何薪水。宋庆龄对记者说:“余少数友人因见十九路军卫国抗敌之忠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我辈对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7页

<sup>②</sup> 《申报》,1932年2月13日。



于其伤兵之救护,自应各尽绵薄。”她还说:“我辈设立医院之惟一单纯目的,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sup>①</sup>为了筹办伤兵医院,宋庆龄四出奔走,极为辛苦,“常忙得连午餐都顾不上吃。”<sup>②</sup>她发动妇女筹集医院所需的被褥、床单、绷带等物,并把自己的住宅当作仓库,每天都从那里发放这些物品。她还从朋友处搞来不少书籍,连同自己的部分书籍一起捐献出来,给伤兵阅读。宋庆龄经常到医院照看伤员,有时还在夜晚守护在生命垂危的重伤员床边,安慰鼓励他们。她把自己的爱国主义感情,全部倾注在为国负伤的战士身上。

轰轰烈烈的淞沪一二八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拒不增援,十九路军寡不敌众,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而夭折。宋庆龄却从中看到了胜利,看到了希望。她说:“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日军谓48小时可消灭十九路军,某军事家谓日本3日可封锁中国,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sup>③</sup>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实现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号召,得到了上海工人的热烈响应。沪西17家日商纱厂于1月31日成立了总同盟罢工委员会,4万多工人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形成了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中心。对于这场充分显示上海工人阶级的抗日爱国精神和战斗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7页

② 《宋庆龄纪念集》,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8页。

力量的大罢工,宋庆龄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为了援助因坚持罢工斗争而在生活上发生困难的工人兄弟,她千方百计筹措经费,甚至不惜变卖个人家产,亲手将筹集的两万元支票交给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党团书记,请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钱转交给沪西罢工委员会。

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发动全市工人的抗日救国活动,声援沪西工人的反日大罢工,成立了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支持沪西工人反日罢工募捐活动。宋庆龄获悉后,又捐助了1500多块大洋。此后,她又多次筹款订购粮食,接济沪西东亚麻袋厂、内外棉纱厂的罢工工人,解决了他们近一个月的口粮问题。<sup>①</sup>

在淞沪抗战中,宋庆龄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支持了中国军队与工人的抗日斗争,为弘扬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二、进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

### (一) 发起组织民权保障同盟

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对外妥协投降把东北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内纠集武装力量全力“围剿”苏区红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痛心疾首,坚决反对,针锋相对,毫不妥协。在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围剿”苏区的同时,大力营救被迫害的革命者和爱国志士。

1931年2月7日,“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

<sup>①</sup> 李华明等:《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宋庆龄认为,这时成立这样的组织,不仅必要,而且也有了现实可能性。九一八后,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反对国民党独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与抗日救亡运动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要抗日救亡,必须给人民以起码的民主权利;而抗日救亡,又为保障人权,营救政治犯——革命者和爱国志士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此外,在营救邓演达,牛兰夫妇以及陈独秀等人的过程中,宋庆龄体会到合法斗争及法治观念在争取舆论、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方面的重要性。鉴于这样的考虑,她向国民党中央提议组织一种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并向蒋介石征询意见,但未被采纳。于是“民保盟”就以民间组织、团体的面目出现。

经过四、五个月的筹备,12月上旬,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会”终于成立。12月17日公开发表成立《宣言》。

《宣言》首先指出中国民众民权尚未实现的事实与状态,接着谈到成立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惟同时亦知各先进国家皆有保障民权之世界组织……此种组织之主要宗旨在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根据同一理由我辈提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组织。”《宣言》规定“民保盟”的目的与任务是:(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合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与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此后,经过几天紧张的筹备工作,12月29日,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南京路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大厦举行民保盟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由筹备会选举产生的“民保盟”临时执委会名单: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宣传委员林语堂等。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临时执行委员会主持同盟的

工作。

宋庆龄因患感冒未能出席,而由蔡元培在招待会上代为宣读了书面演说词。她号召新闻界同人和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们应该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为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主持正义”与民权保障同盟“共肩此相互之责任”<sup>①</sup>。

至此,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诞生了。

## (二) 开展卓有成效的营救工作

“民保盟”成立后,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鲁迅也应蔡元培的邀请而加入。至1933年初,史沫特莱、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周建人、茅盾、郁达夫、王造时等知名人士也相继加入。

宋庆龄作为“民保盟”的主席,应用她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威望,主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民保盟”章程规定,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委员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总会没有能够成立,在实际工作中,同盟的最高执行机关就是由正副主席宋庆龄、蔡元培和总干事杨杏佛等七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民保盟”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了分会。1933年1月17日下午4时,上海分会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中央研究院举行成立大会,通过分会章程。经过投票,选举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9人为执行委员。

“民保盟”先后所开展的工作难以尽述,举其荦荦大者有:与违背会章的胡适作坚决的斗争;营救许德珩、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革命同志;抗议顾祝同枪杀刘煜生;抗议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等。

胡适由于坚持反动政治立场几次公开发表了违背同盟章程、攻击同盟的言论,反诬说北平陆军反省院政治犯的控诉信是“有意

<sup>①</sup> 原载1932年12月31日《申报》。

捏造”，他视察北平监狱时无一谈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并攻击说“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还说“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坚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sup>①</sup>对胡适的这种错误态度，宋庆龄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几次打电报给胡适，要求他“公开更正”。但胡适固执已见，拒不接受宋庆龄的严正警告。于是“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便于3月3日在中央研究院开会，讨论胡适问题。鲁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讨论，作出了开除胡适会籍的决议。

营救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赓、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人，是“民保盟”成立后的重大政治活动。陈赓等人先后被捕，1933年3月30日，宋庆龄与民权保障同盟中央执行委员研究营救办法，并为此公开发表宣言，指出“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或者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非法律所不许，苟无特别行动，应即立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章，为吾民必争之权利”<sup>②</sup>。4月3日，宋庆龄率领“民保盟”代表团成员到军事监狱看望罗登贤、余文化、陈赓、陈藻英等人。当不久传来蒋介石诱降不成，要杀害陈赓的消息时，宋庆龄闻讯后立即亲自由沪赴宁，面见蒋介石，慷慨陈词：“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讲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sup>③</sup>蒋介石慑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凛然正气，又怕黄埔军校学生将领离心，只得释放了陈赓。

宋庆龄所领导的“民保盟”十分关注顾祝同非法枪杀刘煜生的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80页。

② 原载1933年3月31日《申报》。

③ 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1981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事件。1933年1月21日,顾祝同以“蓄意煽起阶级斗争”和“宣传共产”为罪名,非法枪杀江苏镇江《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查封了《江声日报》。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要求惩办顾祝同。宋庆龄与蔡元培、林语堂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决定在《申报》上发表宣言以示抗议。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办顾祝同等三项要求。

宋庆龄领导的“民保盟”在与国内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着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运动。1933年春中国留德学生胡兰畦在留德中国学生中组织反帝同盟、进行反法西斯的宣传活动时,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逮捕,关进女牢。宋庆龄获悉后,与鲁迅等在上海以“民保盟”的名议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严正的抗议,呼吁释放被捕的中国留学生。经多方努力,胡兰畦“得以获释”<sup>①</sup>。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抗议书》一文,抗议希特勒政府对德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对德国进步作家、科学家所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义正词严地指出,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保护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和文化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抗议摧残德国进步学术和文化生活的法西斯暴行。当天,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等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向德国副领事贝连递交了他们共同签名的抗议书。次日,上海的《申报》发表了抗议书全文,在更大范围内谴责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进步文化的罪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33年3月18日,“民保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门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40岁。反动派要杀害杨杏佛,可说是预谋已久。早在“民保盟”成立之初,国民党蒋介石就把它看成是非法组织。蔡元培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所谓“非法说”：“本同盟之组织,实为根据《约法》所予人民民主

<sup>①</sup> 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第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权利；本同盟组织之目的为保障民权，促进法治，宗旨纯正，态度光明，绝对不能谓为‘非法’。反之，凡一切反对本同盟之主张，则恰为非法”<sup>①</sup>。宋庆龄等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民保盟”不避艰险地进行的一系列营救活动，透彻地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法西斯性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对同盟恨之入骨，必须除之而后快。

杨杏佛惨遭杀害后，宋庆龄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为了纪念死者，她更勇敢地投入了新的战斗。第二天，她写出了《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高度评价杨杏佛为革命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极度悲愤地痛斥反动派的可耻罪行，指出“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sup>②</sup>

6月20日，宋庆龄偕同伊罗生等前往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参加杨杏佛的成殓仪式。瞻仰遗容时，“深感悲切，盈盈欲泪”。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对杨被刺事，业已有一文告发表。民权保障同盟之会务，当然继续进行。”在不久后接见报社记者时，她说：“我虽然受到某些方面的威胁，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停止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的”，“杨杏佛之死不会影响运动的发展，相反地此事将激励同盟加倍努力工作。”

宋庆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和暗杀并未停止她的战斗，而是更加坚决、更加英勇地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战运动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抗日斗争中。

### 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sup>①</sup> 《申报》1933年2月10日。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5页。

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等抗日救国的四项主张。宋庆龄还向广大民众宣告,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在三个条件下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宋庆龄在讲话中还号召,全国每一城市和乡村,必须为实现四项要求而斗争。宋庆龄的这篇讲话经国内外杂志刊载,使抗日救国的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所了解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

## (二) 筹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独占中国的声明,即所谓“天羽声明”。它直接地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并在以武力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力量,直接镇压中国的革命,排挤英美等在华势力,以独占中国。这是日本发动新进攻的舆论准备,而国民党政府却对日本的声明表示了可耻的屈服。针对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开展了民族自卫运动。4月20日,以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为基础,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任主席,何香凝、马相伯、胡汉民等为委员。在民族武装自卫会筹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与宋庆龄等共同协商修改后,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由宋庆龄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筹备会名义发表。在《纲领》上签署的发起人和赞成人有各界知名人士1779人,最后公开签名表示拥护者达10万人之多。《纲领》提出,全体武装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采取办法解决战费;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筹备会又于6月20日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进一步阐述了《纲领》的抗日救国主张,并明确提出了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纲领》和《宣言》的发表,以及武装自卫会的一系



列抗日救亡活动,这是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推动全国救亡运动发展的重要活动,为以后的团结抗战准备了条件。

### (三) 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吞我华北五省,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民组织起抗日联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为民族生存而奋斗。宣言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很快传遍国内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号召的推动下,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并由此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几个星期之内,全国各地和各阶层人民中就成立了数百个救国会组织。

1936年1月,在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组织下,联合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分散的各救亡团体的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为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经过积极准备,全国20余省市、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于5月底至6月初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被大会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宣言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一,停止军事冲突;二,立刻释放政治犯;三,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保证各党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以全部力量制裁违背共同抗敌纲领,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公开发表主张,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团结御侮、联共抗日的政策。宋庆龄在这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全国统一战线组织中,起着核心领导的作

用。救国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主张，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他们不断采取威胁、警告，要逮捕救国阵线诸领袖等手段，企图破坏救国会的斗争。宋庆龄写信致救国阵线领袖，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充分支持救国会宣言和纲领，并签名于宣言和纲领之后。11月，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宋庆龄为“七君子”被捕事件发表声明和宣言，并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国内外正义舆论压力不断加强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七君子”。宋庆龄领导的救国会运动和营救“七君子”斗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团结抗战、救亡图存，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四、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一) “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宋庆龄曾多次阐述过中国抗战最终必胜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民族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论调。日本侵略者曾疯狂地叫嚣了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国民党内亲日派、投降派则散布失败主义。国民党蒋介石一直动摇于“亡国论”和“速胜论”之间，时而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胜”，对抗战到底和取得最后胜利缺乏信心；时而又因某些局部战役的胜利而忘乎所以，以为抗战可以速胜，不作持久打算。这些观点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影响着全民族抗战的继续进行。为了驳斥各种错误论调，1937年8月，宋庆龄在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已经认识到自己是有办法抵抗的。他们再也不怕这个‘友邦’了。”她说：“成百本书成千篇文章曾经谈过中日战争的问题。照我看来，大多数作者似乎都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中国抗战的力

日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大量储藏这些原料。它不能在这方面投入巨额的资金。……日本必须以输出来偿付它巨大的输入。即使在和平时期,日本要做到这一点也极为困难。”她还认为,日本农业产量的逐年下降和日本农民的日益贫困,“将使日本已很脆弱的社会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困难,更加捉襟见肘”。由此,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同时,日本军阀又决不能希望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如果在和平时期,日本的经济就已经疲惫不堪,日本的社会结构已经受到不稳定的威胁;那末这种脆弱的结构又怎能经得起亚洲大陆上的大战呢?”宋庆龄明确指出:“中国能否被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这个问题,现在已不值得讨论了。”因为,“中国土地广大,资源富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在这情形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sup>①</sup>

## (二)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宋庆龄认为,“日本黩武主义者自己的残暴行为反而大大地帮助着挑起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sup>②</sup>她高兴地指出:“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最使宋庆龄感动和兴奋的是:“所有的各党各派都一致联合起来,捐弃了过去的异见,大家集中于对付和击退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共同的目标。”<sup>③</sup>当她知道八路军 115 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板垣师团 1000 多人的胜利消息时,她写道:“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竟成了结合全中国一切资源和力量以抵抗暴敌的媒介剂,过去的红军即现在的八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96~198 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200 页。

<sup>③</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201~202 页。

路军,已是国军的一部分,正在加入作战。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她说:“我们全国的团结统一,已发生伟大的力量,如堡垒一样坚固,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的痛击。”<sup>①</sup>

宋庆龄深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但她认为:“中国人都准备以最后的牺牲来保卫祖国,我们全体民众的义愤,尽足以补偿军器上的差逊而有余。”<sup>②</sup>她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心声:“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她现在是正为了保持民族生存而抗战。”<sup>③</sup>抗战前线不断传来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平津战斗中驻守在南苑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指挥左翼部队向日军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后退裹伤,“佟将军说:‘战事这样紧急,哪里顾得裹伤!’他继续指挥作战,又遭敌机轰炸,头部受重伤,壮烈殉国。”南苑前线指挥官赵登禹将军,遭到日军伏击受重伤后,仍然指挥所部猛攻日军,直到昏迷卧地。他刚醒来,便对传令兵说:“不要管我!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他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sup>④</sup>。说罢,便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在南苑军营里近千名来支援的平津学生也大部殉国。在上海保卫战中,9月4日,日军向宝山进攻,并以炮舰飞机助战,中国军队与之血战数日。为避免日军舰炮火的威胁,中国军队从江湾、吴淞一线后撤,并命令姚子清营留守宝山。该营“受到日军三十余艘舰艇的炮击和日军飞机的分批轰炸,在日军坦克四面冲击、城内一片火海的情况下,坚决死守,经过3天苦战,全营官兵殉国。”<sup>⑤</sup>还有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等等壮烈事迹。宋庆龄告诉人们:“目前的抗战已经证明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优势”。“虽然我们 must 必须经历好几年很大的痛苦和牺牲,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1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1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2页。

④ 梁旭敬:《芦沟桥事变简记》,《文物天地》1992年第4期。

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而这,我们早已准备忍受的了。”同时,她坚信不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sup>①</sup>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淞沪抗战进行到10月下旬,中国军队撤离大场、江湾和闸北等地,日军逐渐包围了租界。这时,上海市民一度出现了惊慌,汉奸亲日派乘机散布妥协投降的陈词滥调。对此,《救亡日报》、《抵抗》三日刊发表不少文章予以批驳和痛斥。为了进一步坚持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宋庆龄在11月6日出版的《抵抗》(即《抗战》)三日刊上发表了题为《两个‘十月’》的文章,指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其野蛮和残酷,在我们领土上造成了混乱和恐怖。”“我们十月的天空,黑压压的战云弥漫,但是我们内心却闪烁着希望的光明。我们的伟大邻邦苏联,也不是在形势比我们更恶劣的一个十月中诞生的吗?”“经过了多年的黑暗,苏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到和平、进步和自由的路。”“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这些破坏我们的文化和进步的人。”她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将不仅在战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sup>②</sup>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离沪赴港。行前,她发表了《告英国民众书》,再次告诉世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去为全世界和平事业,为增进社会经济秩序,为反对法西斯与反对战争而奋斗。”同时再次向全世界人民表示:“帮助这些任务之最好办法,乃在积极拥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抗日,维持世界和平,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这便是避免明天的世界大战。”<sup>③</sup>并再次强调:“我们发动反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战争,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sup>④</sup>这样,中国人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1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1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12页。

民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必然会得主持正义要求和平的人们的支持。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重要因素。宋庆龄严正表示:“日本侵略者要想把历史开倒车,要想征服我们,要想消灭我们的民族独立,要想把自由的中国人民变成日本的奴隶。中国人民任何时候也不会停止其反抗日寇此种侵略之斗争。”<sup>①</sup>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曾把宋庆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发表的讲话和文章汇编出版,定名为《中国不亡论》,它的出版给正在坚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增强了信心和勇气,使人们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 五、争取民主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 (一) 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宋庆龄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当她见到这个纲领后,判定它具有两面性,于4月14日同何香凝联名发表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的文章,在肯定《抗战建国纲领》所包含的积极内容的同时,提出了她们关于坚持抗日救亡的七项主张:

“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务使我党恢复民众先导之地位。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三、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先,排除一切不利民族国家之私见,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四、时刻不忘当前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固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犹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陷万劫不复之地。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19页。

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六、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犹应加以严峻之刑律，以振党国纲纪。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或作战区域，因战事影响，或遭暴敌惨杀奸淫，或过奴隶生活，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或遭死难……种种惨痛，当铭刻吾人脑际勿忘”<sup>①</sup>。

这是宋庆龄、何香凝在香港期间，除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和推动华南抗日救亡的同时，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抗日的具体主张，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充分发动以民众为主体的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立场，反对形形色色的投降主义和分裂、倒退的行径。

## （二）痛斥汪精卫叛变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改变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只要国民党政府放弃抗日政策，日本将放弃过去不以国民党为谈判对手的方针，并以“共同防共”、“实现经济的结合”为钓饵，诱使国民党当局投降。同时，英美等国为了应付欧洲日益紧张的局势并维持自己的利益，在1938~1939年期间，曾几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会议，企图与日本妥协。

在这一形势下，抗日阵营中的妥协、投降、分裂活动日益加剧。早已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往来的亲日派汪精卫集团于1938年12月公开投敌。1939年4月，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订下了《汪、平协定》。5月，汪精卫在上海与南北汉奸策划成立傀儡政权。次年3月，汪记“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汪精卫集团彻底沦为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民族败类。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5页。

宋庆龄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日本侵略者与汪精卫之流所串演的这幕丑剧。1939年7月7日,宋庆龄为抗战二周年发表了《展望战后》一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它们现在阴谋利用如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来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它们原先试图以‘和平谈判’这个等于投降的口号来削弱我们的决心,但已被证明完全无效,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们目前试图用恶毒的反共口号来破坏我们的团结。”她严正指出:“这些诡计是骗不了任何人的。”<sup>①</sup>

汪精卫投敌后,曾声称其投敌之举是出于“爱护孙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不忍灭亡于无识者之手,故毅然排万难冒万险以主张之”<sup>②</sup>,并在上海召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侈谈三民主义。对此,宋庆龄于1939年11月11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发表的《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文章中,揭露了汪精卫伪装“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的假面具,指出即使在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时,汪精卫就对孙中山倡立的三民主义持怀疑态度。宋庆龄指出:“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告其信徒曰,我们为欲抵抗外来的侵略,惟有在社会上经济上求其强盛。间有对此点表示怀疑者,孙先生说:‘如对此点发生怀疑,不如不参加革命’。”“目下背叛国民革命的汉奸汪精卫,即对此点不了解,而思想发生动摇者之一。当时汪精卫意奉袁世凯之命,与革命党疏通,请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谓:‘现在我们可以不谈革命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向袁世凯拿得金钱,来集中建筑铁路的工作。’难怪孙先生在离开南京的时候,发表演说,对汪精卫这些党员们认识的浅陋,表示异常不满。现在对汪精卫不满的,已是全国同胞,而这个卖国的汉奸,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sup>③</sup> 宋庆龄的揭露和批判对汪精卫的叛国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6~277页。

② 汪精卫:《重要声明》,《汪精卫和平建国言论集》第31页,1940年10月版。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6~297页。



投敌是一个沉重打击。

### (三) 呼吁警惕敌人的分裂阴谋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日的旗帜。但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对抗日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活动，实行反民主和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和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制造多起磨擦事件。并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宋庆龄时刻关心抗日阵营内的团结。1940年5月，她结束了对重庆等地的视察访问，返回香港。返港后对中外记者发表了《渝行观感》的谈话。宋庆龄说：“抗战中之祖国，其发展与进步，实足使人鼓舞兴奋。最大多数之人民，对抗战信念甚为坚定。将近三年来之抗战，大为增加人民之民族意识”，“敌军虽侵占我沿海各省，而我仍保有极广大之自由地区，人力资财依然富厚无比”，“中国地大物博人众，可凭借者甚厚，只要坚持抗战，必可战胜日寇，已成为绝大多数同胞之共同信念。”同时，宋庆龄也指出了国民党当局在实行政治改革、关心与改善民生等方面严重不足，并特别强调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反对倒退分裂行为以击退日汪政治阴谋的重要性，她说：“在政治方面……自抗战以来，已有许多进步，但尚未达到应有之程度。如各级党政军机关，一部分人员，视抗战建国纲领为具文，不仅未能遵奉执行，且仍保留过去不良习惯之行政传统，对于领袖，对于主义，空言拥护者不乏其人，对于抗战中改善民生，尚少明确具体之实际办法，此则不能不令人深为遗憾。”“际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国内各党派均有一致团结对外之认识，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际此大敌当前，国难未除，我信贤明当局，均不愿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

估这种伎俩对今日中国团结的危害。”

宋庆龄在信中表明了“保盟”的原则立场：“在这种形势下，保卫中国同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的一边。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

宋庆龄向国际友人呼吁，希望他们关心中国事态的发展，明确支持中国的民主、团结、抗战：“我们相信，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海外友人的支持，需要积极地前进，以达到国内的民主和团结。”“我们相信，这些实际上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原则，是得到我们海外友人的支持的，国际局势明白无误地要求你们支持这些原则，并且更多地支持中国。你们的支援将有助于中国政府、中华民国在一九四一年沿着解放的道路团结向前。”<sup>①</sup>

这封信是在1941年元旦寄往国外，也是在皖南事变前发出的，它引起了各国援华团体和友好人士的关注，使他们及时地了解到宋庆龄和“保盟”的原则立场。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制造了经过精心策划的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时，极为震惊与愤慨。1月14日，她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地谴责他们背信弃义的罪恶行径，并指出，抗战仍处在艰难困苦之中，“然而，最近则有讨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sup>②</sup>。

18日，宋庆龄又与何香凝、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祸国行为”，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

① 《革命史资料》（沪）1986年第3期，第51～5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0～322页。

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sup>①</sup>。宋庆龄还通过保盟的《新闻通讯》第26期上发表《统一战线继续存在》一文,最快地向世界传播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真相,和中共方面的严正立场,使世界各地许多人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宋庆龄等人的这些斗争,与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从政治上反击紧密配合,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内外均处于非常被动、孤立的境地,使合作抗日的局面得以坚持下去。

#### (五) 反对独裁,要求民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于1941年12月9日由香港到达重庆。她到重庆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冷遇,活动受到限制,与人们交往受到监视。尽管其处境艰难,但她不仅继续领导保盟开展工作,而且顽强地继续为民主、团结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奋斗不息。

宋庆龄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她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战军兴已经四年,寇气仍炽,必须坚持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方能对得起流血流汗的前方将士和广大民众。”“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搞专制和独裁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她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说:“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倘若先生泉下有知,也会谴责这帮不肖之徒的!”<sup>②</sup>

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再次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政策,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尤其是在最近数月中,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抬起头来,大事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争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当反动浪潮达到顶点,进攻新四军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逮捕事件,各妇女团体的许多工作人员,包括‘妇女指导委员会’这个最高联络机构的一位委员,都被逮捕了。在这种环境下,有一些最活跃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3页。

<sup>②</sup> 《宋庆龄在陪都》载《陪都人物纪事》第71页,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的组织者都被迫离开了中国。”在皖南事变后的重庆，宋庆龄是唯一公开批评国民党实行镇压政策的人。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在1944年3月曾说：“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她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强调指出：“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这种靠人民一致努力所赢得的胜利，将不允许任何不民主的制度存在下去<sup>①</sup>。”

1943年1月11日，美英两国分别同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3月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为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辩护，进一步制造反共反民主的舆论。5月15日，共产国际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便大肆鼓吹“取消陕北特区，重新收编红军”的谬论，同时在陕甘宁根据地周围集结40多万军队，准备大举进犯。7、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多次进行挑衅。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宋庆龄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943年1月25日，宋庆龄就中英中美签订新约一事发表的谈话中，指出：“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切归于平等。”她特别指出，必须坚持抗战，否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予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她呼吁废除专制统治，发扬民气，召开真正民主的国会，这样，才是真正的废除（不平等）<sup>②</sup>。3月，宋庆龄在为孙中山逝世纪念而发表的谈话中指出：“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召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该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59～361页。

<sup>②</sup> 《解放日报》1943年1月30日。

取最后的胜利。”<sup>①</sup> 9月,宋庆龄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抨击了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她指出:“西班牙单独在欧洲武装反抗法西斯的时候,不幸的‘不干涉’政策使它得不到武器。而今天最沉重地打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阵地的军队,却遇到一个更严厉、更残忍的‘不干涉’。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sup>②</sup> 宋庆龄强调: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之上的。”<sup>③</sup>

由于官僚资本的垄断和压榨,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退,使人民进一步遭受苦难。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激起了人民反对专制统治以争取抗日战争真正胜利的高昂情绪,从1944年,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

宋庆龄这时发表的文章和重要讲演,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进一步呼吁废除一党专政,真正实行民主。1944年2月8日,美国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了宋庆龄《致美国工人们》的信,宋庆龄指出:“凡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凡是发挥了人民的积极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一个经济落后与缺乏武装的国家能够击退一个优势装备的侵略者的唯一武器)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国的抗战在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相反地,当反动势力公开投敌,或者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且破坏民主运动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6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8页。

发表召开追悼邹韬奋大会的公告,她出席了10月1日在重庆道门口银社举行的追悼邹韬奋大会,并为大会亲笔题写了“精诚爱国”的横额,悬挂在庄严肃穆的会场正中。正如沈钧儒在大会上号召的:我们哀悼邹韬奋就是“要为实现民主而奋斗”。宋庆龄发起与参加悼念邹韬奋先生的大会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宋庆龄始终从民族解放的大局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坚持三大政策的正确原则。她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正确主张和救亡运动,在最艰苦最困难的年代里,仍然和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竭尽全力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渡过困难战胜敌人。她以坚定的革命精神,渊博的学识,高尚的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进步人士、友好人士的崇敬和爱戴。她凛然的正气使战友钦佩、使敌人震惊。她始终与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与广大民众站在一起。宋庆龄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 第四章 统一战线事业的卓越推动者和杰出模范



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宋庆龄在她为新中国奋斗的一生中，始终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长期性，并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统一战线网络体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卓越而独特的贡献。她不愧是统一战线事业的光辉旗帜、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模范。

### 一、促进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基本矛盾乃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sup>①</sup> 由此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政治的一般主题，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实现资产阶级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

### (一) 大声疾呼 积极尝试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因母亲病逝从德国回到上海。她起初是为母亲奔丧的,但时局的发展很快地就召唤她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新的伟大斗争中。

这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大陆政策”的总方针和“东方会议”的新策略,精心策划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仅仅3个月,东北大好河山便沦于敌手。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而国民党政府却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他对内对外关系的准则。按照这个反动政策,国民党政府一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一让再让,致使日本的侵略战火从东北烧向华北;一面加紧“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相继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围剿”。同时,蒋介石还加强独裁统治,肆意镇压抗日民主运动,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白色恐怖十分严重。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蚕食鲸吞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宋庆龄悲愤交集,她不仅强烈地意识到抗日救亡已成为新的历史主题,而且明确地断定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抗日救亡的最大阻力。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取国内民主,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民主权利”夺回来,是抗日救亡的先决条件。因此,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这段时间里,宋庆龄比较自觉地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反蒋抗日”的立场。认为日本得以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自己身上。”因为“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农工,不去打日本人”<sup>①</sup>。因而,这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9页。



个政府“绝不能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sup>①</sup>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像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sup>②</sup>

然而,应该看到,宋庆龄在进行“反蒋抗日”的时候,并没有影响她对剧变形势的判断,未曾妨碍她对中心任务的把握。她充分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就是说,宋庆龄在30年代初,就非常难能可贵地注意和重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其主要表现:

一是在理论上论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对抗日救亡斗争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她冲破共产党内推行的“左”倾路线的干扰,于1932年12月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并且要忠诚地合作”的光辉思想<sup>③</sup>。之后,她在撰写的文章和公开的讲话中,又深刻地论述了发动全民抗战,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宋庆龄遵循孙中山唤起民众的思想,认为全国人民总动员,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是战胜凶恶的日本侵略者的必要条件。她说:“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sup>④</sup>如果不唤起人民大众,“结果就是中国被瓜分、被灭亡。”<sup>⑤</sup>因此,宋庆龄大声疾呼:“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的完整。”<sup>⑥</sup>并且坚信“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sup>⑦</sup>这些表明宋庆龄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开始逐渐形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1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12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1页。  
 ⑦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5页。

成。

二是在实践上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进行尝试。宋庆龄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1932年开始,她就以卓越的胆识和无畏的勇气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进行探索和尝试。

### 1. 团结各界人士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在上海燃起战火。国民党十九路军激于民族义愤,公然违背南京政府的命令,奋起抗击,在黄浦江畔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血战。但在当时,中共中央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所统治,在组织路线上推行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一套做法,对十九路军将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执行所谓“中间派”政策,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是永世的反革命”,把反蒋的中间势力看成为“帮助国民党维持统治”的敌人。更有甚者,还认为国民党左派因为可以“欺骗”群众,而比右派更危险,因此他们对长期和我们党合作的宋庆龄亦采取不信任、不联系的错误态度。面对这种情况,宋庆龄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个人恩怨荣辱,仍然敬仰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谋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但在行动上则坚持原则,对“左”倾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加以抵制,她不仅自己毅然挺身站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列,而且贯彻统一战线思想,积极发动和广泛团结各界人士支援十九路军官兵,共同抗日御侮,鲜明地表现了她的广阔胸怀和政治远见。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行动起来,与上海军民同呼吸共命运,以全部精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她同何香凝等不辞劳瘁,冒着枪林弹雨,多次奔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并同军长蔡廷锴等亲切交谈,热情赞扬他们违命抗战,认为这是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降的耻辱,不愧为军队之“模范”、抗日之“先锋”。并发动募捐活动,呼吁海内外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物质上支援处于困境中的十九路军。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救治受伤的抗日将士。在宋

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宋庆龄还和史量才、胡愈之、陶行知等一起研究《申报》如何更好地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积极有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史量才的转变带动了工商、实业界中一批人。1月31日,史量才联络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并被推选为会长。该会与蔡廷锴保持密切联系,对十九路军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援。总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日日夜夜里,宋庆龄以其炽烈的爱国情怀,冲破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怪圈,举起统一战线的旗帜,发动和团结军界、政界、商界、妇女界、新闻界、文化界等各界上层著名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前线,共同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2. 创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宋庆龄为争取抗日与民主,于1932年12月同社会名流和进步人士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民保盟”)。民保盟的章程规定该组织的宗旨为“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还规定凡赞成同盟的主张并愿从事于实现此主张之实际工作者,“不拘国籍、性别及政治信仰”<sup>①</sup>,均可为该同盟的成员。这些表明民保盟是宋庆龄创立的一个由文化界著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组成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政治团体。

民保盟成立后,在宋庆龄、蔡元培的领导下,围绕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不畏险阻,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诸如号召团结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妥协退让;营救被非法拘捕的国际友人、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师生等。这些活动是当时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起到了配合作用。

## 3. 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

<sup>①</sup>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见陈漱渝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随着时局的发展,共产党改变了过去不与宋庆龄接触的错误做法,并越来越接近宋庆龄。1933年3月,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联合上海工人、学生、文化界等28个团体组成统一战线的抗日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并被推选担任会长。

3月8日,宋庆龄参加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章程及要求国民党政府北上抗日、保障民权、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宋庆龄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她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进攻更加严重”<sup>①</sup>;强调只有“唤起民众”,才能“产生出一种不可征服的民族与社会势力,来打破帝国主义与其在中国阴谋叛逆的联盟的势力”<sup>②</sup>;呼吁“一切民族革命分子都应当担起参加这种奋斗的责任。”<sup>③</sup>宋庆龄在演说中,第一次提出她对中国抗战的全面主张,即派遣全国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军队,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热河,保卫中国;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等四项要求。由于这四项要求贯彻了抗战与民主相结合的原则,成为当时众多救国主张中最全面、最彻底的主张。

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不久,即建立了中共党团。4月间,沪东、沪南、沪北、沪西相继建立分会,开展了一些抗日宣传和组织募捐、接济东北义勇军等活动,在早期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4. 筹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

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紧急关头,为加强抗日救国运动的力度,实现动员全民族对日作战,1934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起成立了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2页。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并将由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公诸于全国同胞。《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五)成立由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产生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sup>①</sup>。宋庆龄率先拥护并公开发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以及由她领衔的一千多位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签名发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成立,标志着宋庆龄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已经形成。同时也表明她又一次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极为可贵的尝试。

8月1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大会发表《成立宣言》和《对日作战纲领》,并推选了领导成员:主席宋庆龄,组织部长李定南,宣传部长林里夫,军事部长李国章,总务部长陈璧如,经济部长章乃器,民众武装交际部长黄申卿。

武卫会成立后,曾多次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创办《武装自卫》、《抗日先锋》等刊物,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同时主要依靠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推动,在一些大城市建立地方组织,北平、上海还在各区成立分会,在一些大中学校中建立小组,甚至在东北义勇军中也建立了武卫会组织。各级武卫会组织及其成员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各种形式广泛联系群众,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宋庆龄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这段时间里,她已逐步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思想,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为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尝试及实际的组织工作。只是在当时的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42~143页。

形势下,还不可能建立包括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集团在内的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已。

## (二) 殚精竭虑 促进形成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进一步改变了国内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出发,逐步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政策,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的转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建立的可能的关键时刻,宋庆龄紧紧把握历史机遇,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促进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 1. 率先沟通国共高层的联系。

1935年,中国整个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我国的步伐,在强占整个东北后,又制造华北事变,野心勃勃地把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向中国内地,从而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急速上升,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抗争,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根据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调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并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要求。宣言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在全国各界引起巨大反响。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宋庆龄在上海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10多人率先签名响应《八一宣言》,赞同瓦窑堡会议决定;还将上述两个重要文

海党组织还介绍张子华乔装成仆人与董同行。

1月中旬,董健吾、张子华从上海启程,抵达西安后因陕北冰天雪地,道路不通,耽搁竟40余天。2月27日,他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正好都在前线。留在瓦窑堡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博古(即秦邦宪)分别会见了董、张两人,并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进苏区后化名周继吾),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五项谈判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sup>①</sup>这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

3月5日,董健吾携带中共中央的信函离开瓦窑堡。临行前,博古还交给他江西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三枚和布币大小整零一套,请他转赠给宋庆龄,留作纪念。董健吾回到上海后,立即向宋庆龄复命。宋庆龄为董健吾成功地完成使命感到非常高兴,并向他表示感谢。

这样,国共两党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推动下接通了。总之,宋庆龄是最早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从而率先沟通了国共两党最高层接触,为国共合作抗日建立了头功。

## 2. 主张并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sup>①</sup>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托请她对潘汉年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予以指导”，并与潘具体“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最后还请宋庆龄介绍与她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潘汉年进行晤谈<sup>①</sup>。从信的内容来看，其中心意思是希望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及其崇高威望，帮助共产党实行逼蒋抗日政策。

宋庆龄阅信后，把中共中央的嘱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她一方面热忱地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甚至把潘引荐给宋子文和宋美龄，使他和宋氏兄妹多有接触；一方面更加旗帜鲜明地阐述和宣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936年11月10日，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纪念词》中指出：“在目前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sup>②</sup>特别是她在领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中，更是积极贯彻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中央改变错误政策的方针。这种思想和策略在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她在《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和《为救国会七领导人被捕事件宣言》等文章中，一再强调全国救国会的目的和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立即对日抗战，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sup>③</sup>并明确表示：救国阵线“决不鼓吹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它用全力“促成各阶级的协调”，因为在国难期间全国人民利害虽有不同，“也只有相忍为国，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5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2页。



才能保证整个民族对日抗争的统一步调”<sup>①</sup>。又说：救国阵线“绝不反对政府”，恰恰相反，它“完全是促进政府与人民一致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sup>②</sup> 如果政府能够抗日，“它必然忠诚拥护政府。”<sup>③</sup> 这些表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国内政局的变化，宋庆龄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态度已由对抗逐渐转变为争取对话，力求合作，共同对外。

可是，蒋介石却视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不计前嫌，为推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救亡的努力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大军准备“围剿”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逼迫已与红军达成停战议的张学良、杨虎城重点“剿共”战火。如不服从命令，就把他们的部队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这样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张、杨向蒋介石“苦谏”无效后，被迫实行“兵谏”，在12月12日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救国会领袖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此，中共中央一面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与张、杨“协商大计”；一面电告在上海的潘汉年，要他与南京政府洽谈有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宋庆龄在得知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她不念旧恶，胸怀全局，深谋远虑，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立即作出了要亲赴西安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决定。

据胡子婴回忆：事变的第二天（即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件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5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0页。

她一定会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去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答案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接着婉转地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如果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我很快地省悟过来,决定立即随她去西安。然后,孙夫人要我陪她一起步行到何老太(即何香凝)的住所,约她同行。何患心脏病,经常卧床不起,一听这话,立即从床上坐起,欣然答应同行。后来由于去西安的交通工具解决不了未能成行<sup>①</sup>。这段回忆充分体现了宋庆龄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促西安事变妥善解决的高尚品德和远见卓识。

事变发生后,最着急的要数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尤其是宋美龄当“听到她丈夫被劫持,一下子就晕了过去。”<sup>②</sup>她对何应钦等人的用心特别敏感,唯恐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中致蒋介石丧命。因此,宋美龄坚持要求妥协,力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但尚不知张、杨的态度,尤其不了解中共对此的立场,于是她请宋子文立即去见宋庆龄,希望从她这位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二姐那里探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宋庆龄随即找到潘汉年,将此情况作了转告,并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同时建议她劝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以及中共代表共同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潘汉年还表示自己愿亲赴南京,会见宋子文、宋美龄。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把《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等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劝说和促进宋子文、宋美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sup>②</sup>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下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97页。

龄由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均很好的澳籍顾问端纳陪同他们一起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这样,宋庆龄通过潘汉年沟通了南京与西安联系的渠道,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宋庆龄故居在整理珍藏的宋庆龄遗稿时,发现一份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英文打字稿)<sup>①</sup>。声明精辟地分析了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她认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结果,决不是什么“由于张学良个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引起的”;指出张学良发动事变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御日本的入侵”。但是局势异常复杂,如果对事变处理不好,就将导致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样不仅“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强调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正在扩大“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内战必须停止”,“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并怀着焦虑的心情说:“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近的危险。”为此,宋庆龄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些表明宋庆龄始终把握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这个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方针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宋庆龄以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

<sup>①</sup> 见顾正斌:《评新发现的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纪念宋庆龄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3~144页。

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宋庆龄称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国走向团结御侮这条道路上的第二个伟大里程碑。”<sup>①</sup>

### 3. 呼吁立即恢复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但是,情况十分复杂,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使国内和平受到新的威胁。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继续迫使蒋介石实现他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诺言。为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西安事变的善后交涉与谈判。接着又举行了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谈判,最后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这段时间里,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为扫除重重障碍,促进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继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37年1月15日,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他找人向宋子文活动,要求宋“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们拥护他调解之诚意。”潘汉年接到电报后,立即请宋庆龄做宋子文的工作。在给张闻天的复电中,潘汉年报告说:“已请大姐(指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sup>②</sup>

2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实行积极的让步,以表示其真诚合作抗日的决心。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为支持和配合中国共产党调整的政策,敦促国民党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去年9月18日毛泽东来信中的要求,一改大革命失败以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第一次以中央委员资格,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石曾、孙科、鹿钟麟、李烈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53页。

<sup>②</sup> 引自《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钧、梁寒操、经亨颐等 14 人联名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椎心泣血。”接着又指出：“本党同志，负革命成败民族兴亡之大任，将何以对我总理在天之灵？将何以慰诸先烈不死之英魂？更将何以告数万杀身成仁残手断足之革命将士？”提案还明确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sup>①</sup>最后呼吁国民党应乘“与本党向外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拥护统一抗日”之机会，立即“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sup>②</sup>

18 日，宋庆龄在三中全会上，又大声疾呼，慷慨陈词，发表了《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说》。她在演说中首先指出：“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焦灼地注视着它。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sup>③</sup>只要政府忠实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和他的“三大政策”，就一定“可以救中国”<sup>④</sup>。接着，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派散布的失败主义论调。她说：“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63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63～164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65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66 页。

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日本不仅经济和财政“太脆弱”，兵力不足，而且“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sup>①</sup> 由此“日本不能战胜中国”，胜利将属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她发出警告：“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sup>②</sup> 宋庆龄还针对亲日派汪精卫在会上的反共叫嚣，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批判，指出：“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最后，她强烈呼吁：“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并满怀信心地表示：“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sup>③</sup>

宋庆龄满怀爱国激情，紧扣时代主题，代表人民心声的提案和演说高举了孙中山三太政策的旗帜，打击了亲日派，批评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团结和教育了中间派，使广大爱国的国民党人士进一步明了抗日救国大义，大大推动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大会否决了汪精卫提出的以坚持“剿共”为中心内容的政治决议草案。会上通过的决议中，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实际上确定了团结抗日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5~16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7~168页。

的方针,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基本上是相近的。

从1937年2月开始,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进行了五次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敌视共产党人的本性依然不改,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宣传和取消阶级斗争的无理要求,给两党谈判设置障碍。1937年8月宋庆龄发表文章,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说: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中终于“讨论了与共产党讲和的问题”,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宣言中仍然提出要共产党“停止宣传和放弃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之类的无理要求”,作为“和解的条件”,这“将使妥协不易迅速实现”<sup>①</sup>。她提醒国民党中枢注意中国共产党已经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表示,只要政府真心抗日,他们就不会攻击政府。他们所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携手共赴国难。”并说:“共产党希望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证明。他们曾尽一切努力来维持中央政府与东北军之间的和平。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张的。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sup>②</sup>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进行了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十年内战,“而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成了抗日的先锋”<sup>③</sup>。可见,国共两党是否能合作,关键在于国民党方面。为此,宋庆龄呼吁国民党“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放弃种种无理要求,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sup>④</sup>

国共两党谈判中,共产党极其尊重宋庆龄,及时向她通报谈判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3~19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4页。

的情况和征询她的意见。1937年7月,周恩来在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前夕,到达上海,于11日(或12日)在博古、林伯渠的陪同下特地拜访了宋庆龄。周恩来向宋庆龄详细介绍了有关当前时局及中共的政治主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同时,他还把此次赴庐山将向蒋介石提交的、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宋庆龄,征求她对宣言的意见。宋庆龄看了非常高兴,表示完全赞同和坚决支持。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宋庆龄和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大力推动和督促,终于在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而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深为感奋,于9月24日,发表了《国共合作之感言》。她说:“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感动得几乎要下泪。”<sup>①</sup>并语重心长地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sup>②</sup>这样,“孙中山先生死而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了!”<sup>③</sup>

字字表心曲,句句融激情。感言表明宋庆龄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无私无畏、呕心沥血,为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巨大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了,她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欣慰。

### (三) 坚持原则 竭力维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它包括除了汉奸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投降派以外的国内所有阶级、阶层、党派、团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7页。



体以及海外华侨等。如此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增强了抗日阵营的力量,这是极大优点。但是也带来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性。如前所述,这个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然而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追求不同的理想和目标,只是由于日本侵略,才使双方由分裂走向合作。因此,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就不可避免。事实证明,在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存在着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条路线,存在着抗战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激烈斗争。对此,宋庆龄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云谲波诡的政治场景中,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尽心尽力地为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异常复杂的实践活动中不断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思想,从而丰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体系。

#### 1. 阐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含义与目的。

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除了国民党顽固派中伤诋毁外,一些人们对它的认识,或有误解,或不明真相,或认为皖南事变后统一战线已经破裂等等,显得十分混乱。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认为首先要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

何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性质和目的又是什么?宋庆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名称,并非偶然叫出来的,它是一个“精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名词”。冠之以“抗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因此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任何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团体。“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sup>①</sup>“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1页。

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

宋庆龄在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含义时,还针对国民党惯用的以“统一”为名实施独裁的伎俩,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说各个属于它的党派不能有“各自的观点和目标”。相反地,党派应有各自的一定独立性。统一决非是“统制”。因此,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党一派独裁”<sup>①</sup>,各党派应一律平等。这是统一战线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 2. 国共之间的关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宋庆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但其核心则是国共合作。因而对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应引起严重注意。她指出:虽然“我们的抗战前途所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能否保持下去,并非党派的问题,而是战还是降、为民族而战斗到底还是用卖国诡计使抗战瓦解的问题。我们统一战线的的原则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上面,并非由任何一党所制定的。”但无可否认,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治力量,各自拥有军事实力,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对时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中,“国共之间的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sup>②</sup> 这就是说,团结是抗战的需要,中国抗战的关键则在于内部的团结,而内部团结的关键又在于国共合作。因而,改善两党关系,维护两党合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3.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实现和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

宋庆龄认为要实现国共携手合作,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有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共同行动的纲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2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3页。

领。这个纲领不能是一党一派的,只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结晶”<sup>①</sup>。以前孙中山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曾经下过一次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sup>②</sup>。又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这次战争的目标正是孙中山一生的目标——争取充分的民族平等。”<sup>③</sup>由此,她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时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就成为实现国共合作和所有致力于抗日御侮的党派、阶级和阶层的“共同行动的纲领”,成为“统一战线政策的真实基础。”<sup>④</sup>

基于这样的认识,宋庆龄向国民党大声疾呼,必须取消独裁统治,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动人民抗日救亡。她说:“九一八至一二八后,我等即向本党建议,必须继续秉承总理十三年改组精神,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团结,积极进行御侮救亡。”<sup>⑤</sup>特别是在全国抗战开始前不久,为了敦促国民党改变政策,实现联共抗日,宋庆龄又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国民党立即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孙中山的遗嘱。认为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而要实现两党合作,就要“采取有效步骤”来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因为三民主义“适合目前中国的情况”<sup>⑥</sup>,而“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sup>⑦</sup>。为此,她特别强调:只有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sup>⑧</sup>,“才能救中国于危亡”<sup>⑨</sup>。宋庆龄重申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8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8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3~224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6页。  
 ⑦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3页。  
 ⑧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7页。  
 ⑨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5页。

阶级、各阶层、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的战斗旗帜。中国共产党当时已明确宣布：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sup>①</sup>但共产党讲的三民主义是指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虽然阉割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灵魂，但却一直标榜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者，因而不敢公开反对宋庆龄重申三民主义的主张。正如宋庆龄在《展望战后》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约十六年前开始第一次合作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承认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族的共同纲领。抗战开始时，两党再次紧密合作，重申了对这个纲领的信奉。”<sup>②</sup>

宋庆龄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呼唤国共重新合作和民族精诚团结，反对日本侵略，保卫神圣祖国，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促成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斗争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4. 实现民主和改善民生是建立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宋庆龄遵循孙中山“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思想<sup>③</sup>，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要实现国共合作，充分调动全国人民抵御外侮、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她特别强调实现民主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sup>④</sup>这就是说，抗日与民主好比是一辆车子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9页。

的两个轮子,它们是相辅而行,互相促进的。

为此,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强烈呼吁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民主自由,并明确指出,民主权利是不能和抗日斗争分开的。相反地,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争取民主是抗日斗争的“一部分”。因为争取民主是“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件<sup>①</sup>。惟有国民党政府立即明令全国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sup>②</sup>1937年2月,宋庆龄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一文中,又再次强调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全部力量投入神圣的抗战。她说:在抗战时期,“要群众行动起来,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国民会议,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要做到这一点,“全靠一种群众真能参加的选举制度。”总之,要“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sup>③</sup>

全国抗战爆发后,宋庆龄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照我看来,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sup>④</sup>因为这既是“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建国工作”、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需要。她认为从历史来看,过去十年内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忽视了民权主义”,从而使“我们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并指出:“中国有见识的人向来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sup>⑤</sup>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因而“要与共产党讲和”,实现国共合作,“只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sup>⑥</sup>这就是说,实行民主政治是建立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

随着抗战的发展,由于蒋介石集团对民众运动的兴起有着根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3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4页。

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仅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而且千方百计加以限制和破坏。对此,宋庆龄极为愤慨,她一方面对国民党限制和破坏民众运动的行径加以揭露和谴责,认为这不仅“对动员我们的人民参加抗战产生不利影响,而且难以肃清汪精卫集团的屈辱投降思想”<sup>①</sup>。她还进一步指出,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间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民主,“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sup>②</sup>,一方面又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来说明实行民主对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她说:“凡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凡是发挥了人民的积极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战争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国的抗战在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相反地,“当反动势力公开投敌,或者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且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sup>③</sup> 宋庆龄正是从抗日与民主一致性的原则出发,一再呼吁“在中国政府里实行更民主的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沿着民主的路线,通过更大的自由权利,让中国人民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国内局势才能得到改善,中国才能在不仅威胁着自己、也威胁着别国的危险面前,继续保持团结。”<sup>④</sup>

在实行民主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改善民生。宋庆龄认为:“以为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国家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救出来,这是愚蠢的想法。”但是,当时的中国,“乡村中是一片贫困、疾苦和灾难的景象。我们的农民仍受尚未废除的封建残余势力的搜刮,以及苛捐杂税的痛苦。……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正影响着劳苦大众。不仅工人的处境十分凄惨,青年知识分子也找不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81~38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36页。

碍。”<sup>①</sup> 1939年7月,她发表《展望战后》一文,尖锐地指责国民党妨碍和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反动政策。文章指出:“严重的弱点一直妨碍着我们的统一战线的发展。”这就是少数顽固派,“以各种借口,公开地或隐蔽地不同意扩大和加强我们的民族团结。”<sup>②</sup> 并说:“背叛统一战线和试图限制民主的发展”,“必将削弱我们的抗战力量,鼓励‘求和’与停战的空想,并导致我国的最终失败。”<sup>③</sup> 1940年5月,由于反共磨擦事件迭起,宋庆龄在《渝行观感》一文中,又正告国民党当局:“际此大敌当前,国难未除”,决不能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事,以免“为日寇所乘”<sup>④</sup>。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指出这种反共行为如果不加制止,“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sup>⑤</sup> 并强烈要求国民党“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奠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sup>⑥</sup>。18日,宋庆龄又与何香凝等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sup>⑦</sup>

皖南事变的发生,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宋庆龄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这种倒行逆施表示愤慨和严加谴责;另一方面鉴于大敌当前,又为摆脱危机指明出路。她说:“我们将继续呼吁恢复中国的统一战线,巩固中国的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5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1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0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2页。  
⑦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3页。

团结,抛弃那些只会削弱中国的力量和落入敌人圈套的国内争端。”<sup>①</sup> 这些充分表明,宋庆龄极有分寸地把握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及其关系,在斗争中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综上所述,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后,在团结抗战出现波折,甚至面临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宋庆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不仅宣传与教育了群众,同时也是对国民党的严正警告,对捍卫、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民族的神圣抗战得以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坚持下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她的统一战线思想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宋庆龄独特风格的统一战线原则和策略思想。

## 二、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奋斗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杰出的国际主义者,她一生积极从事追求人类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活动,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积极争取和团结国际正义和进步力量支援中国抗战,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国际范围,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使二者休戚相关,互相支援,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懈奋斗,作出了谁也无法替代的巨大而特殊的贡献。宋庆龄不愧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

### (一) 跃登国际舞台 参与领导“反帝国主义同盟”

宋庆龄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博大胸怀的伟大女性,她一生闪耀着璀璨的国际主义思想光辉。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36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在镇压各国人民反抗时总是互相勾结,因此各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斗争已经不再是局部的国内问题,而是成为统一的国际问题,应相互支持,共同斗争。列宁为此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宋庆龄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她早年追随孙中山征讨军阀及与共产党合作进行第一次大革命的过程中,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外联络和宣传,争取国际正义力量援助中国革命,同时也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4年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转道经过日本时,在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讲,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sup>①</sup>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义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sup>②</sup> 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宋庆龄在开办的妇女党务训练班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的讲演,明确指出:妇女要求得解放,应当“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sup>③</sup> 这些论述表明,宋庆龄在20年代就萌发了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妇女和民族解放的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于1927年8月下旬赴苏联首都莫斯科。这期间,她受到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邀参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10周年的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0页。

庆典,并进行了参观访问活动。宋庆龄在苏联的实地考察和所见所闻,使她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感受到了“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诞生”<sup>①</sup>,看到了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风貌。她曾多次向苏联人民发出致敬函电,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同情与合作,并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和苏联工人阶级“将继续并肩作战,打垮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sup>②</sup> 这表明宋庆龄的革命思想有了迅速发展,认识到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国际主义真理。

1928年3月,宋庆龄离开苏联去德国。在柏林期间,宋庆龄同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妇女运动领袖蔡特金有着密切的来往,还和许多德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她与这些德国著名人士的交往中,相互交流了保障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经验,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从1927年到1931年在苏联和欧洲期间,她还积极参与了国际的反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从而直接地把中国革命与国际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战场。

1927年,宋庆龄和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德国)、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巴比塞(法国)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这年12月,宋庆龄从苏联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席了反帝大同盟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是国际上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的和平大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从而“使中国革命成为全世界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9页。

的一件大事,特别受到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的注意。”<sup>①</sup>在会上,宋庆龄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929年8月,该同盟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第二次大会,宋庆龄虽因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未及参加,但仍被大会推为名誉主席。其后,宋庆龄又相继担任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名誉主席、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副主席等职。这样,宋庆龄漫步国际舞台,成为英勇的国际反帝战士、享有盛名的国际和平及进步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正如王安娜所说:“各种国籍,各个阶层的人都把她(宋庆龄)当作为和平与社会正义而战的先驱者。”<sup>②</sup>

## (二) 高举反战旗帜 主持远东反战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所挑起的,而日本法西斯则是发动侵略的急先锋。1931年秋,日本精心策划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次年1月,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当时,刚从国外归来不久的宋庆龄毅然挺身站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列,她在动员各界人士支援淞沪抗战的同时,还努力争取国际声援,吸收在华国际友人参加抗日工作,从而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国际的反帝反战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曾代表反帝大同盟向全世界进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声援危亡中的中国。这个呼吁得到热烈的响应。反帝大同盟总部也发表了一个极长的宣言,痛斥日本侵略的罪行,号召各国反帝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在来自国外的声援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苏联文豪高尔基。他在接到宋庆龄的电报后,便立即在1932年3月2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的文章,用钢铁般的语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91—9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sup>②</sup>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1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5月版。

议,以讨论远东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和国际争取解放与和平斗争的关系。

从1933年6月起,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协助下,积极筹备在上海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遵照中共中央6月18日发给上海局的指示精神,中共江苏省委与宋庆龄协商后决定,请宋庆龄公开出面筹备,具体工作则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主持。

为了动员国内外反帝反战的人们积极支持与参加这次大会,宋庆龄于8月6日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其主要内容是:

首先,警告全国与全世界人民要充分认识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她深刻指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加深,各国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这些矛盾冲突正把世界迅速导向新的战争火焰中去。”“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于剧烈的经济战争中。货币关税的战争不久即将一变而为毒瓦斯、炸弹和重炮的战争了。”<sup>①</sup> 因为“危机与冲突必然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先声。”<sup>②</sup> 这就清楚地阐明了只要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严重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真理。

其次,列举了资本主义世界狂热地扩军备战,奔走于缔结同盟,特别是在德国,法西斯已夺取了政权,“恢复”了国家主义政策。而远东的日本侵占了中国广大的土地,还在长驱直入,企图在瓜分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竞争中,抢在各帝国主义者的前面。同时,它又在一心一意地在它夺取的中国领土上扩张军备,计划进攻苏联,等等事实,并由此得出结论:“这一切把人类投向战争、死亡和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6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7页。

毁灭的活动,正是当前时局的特点。”<sup>①</sup>

再次,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她明确指出:要制止这种帝国主义战争浪潮,“就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sup>②</sup> 这充分显示了宋庆龄主张建立国际反战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

最后,热诚地呼吁一切愿意为阻止新的世界大屠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斗争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于9月在上海举行的反帝反战大会。

宋庆龄的这篇声明深刻而精辟地阐明了反帝反战大会的正义性和紧迫性,以及建立国际反战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对动员人民参加和支持这次大会起了重要作用。

8月18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代表团抵沪。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下,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封锁,按计划码头举行了欢迎大会。宋庆龄同一些群众手持鲜花,热情洋溢地迎接了代表团。代表团一行4人,领队是英国工党议员马莱勋爵,团员是法共党员、《人道报》主编伐扬·古久烈,比利时共产党人马尔度,英国人哈密尔敦。巴比塞本人因生病未能来沪。

远东反战会议本来是打算公开举行的,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千方百计对这次会议进行阻挠和破坏,因此被迫秘密举行。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对会议的召开、生活安排与安全保卫作了大量细致、周密、艰巨的工作,并非常成功。

开会地点选在虹口大连湾路一座装修未竣的新楼中。<sup>③</sup> 8月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8页。

③ 《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第40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5月版。

29日晚上,分散隐蔽在各处的代表分批陆续进入楼内隐蔽起来。第二天拂晓,宋庆龄由向导带领转了几个圈,好不容易甩掉特务的跟踪,坐出租汽车到了会场。与会代表55人<sup>①</sup>,其中来自外地的有苏区的红军代表,东北义勇军代表,还有工人、农民、学生、参加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士兵代表;来自国外的除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的4名成员外,还有法国共产党人雅克·多里奥、法国社会党人布比,《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日本、朝鲜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代表在来沪途中不幸被捕,未能到会。

8月30日,会议由宋庆龄宣布开幕,推选了马莱、古久烈、马尔度、宋庆龄及东北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上海工人代表等9人为主席团。还推选了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法国)、高尔基和伏罗希洛夫(苏联)、台尔曼和托尔格勒尔(德国)、工人阶级老战士汤姆·曼(英国)、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片山潜(日本)、未德和毛泽东等为名誉主席<sup>②</sup>。宋庆龄任主席,主持会议。马莱报告了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宋庆龄在会上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著名讲演。在讲演中,她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和世界局势;论述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阶级根源;阐明了战争与革命以及她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所抱的态度。她理直气壮地宣告:“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sup>③</sup>因为“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sup>④</sup>。并颇有预见地警告世界人民:爆发世界大战已为期不远了。她说:“我不想笼统地、全面地讲那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可以说,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sup>⑤</sup>为此,她在讲

① 黄霖:《宋庆龄主持召开的远东反战会议》,《上海滩》,第52页,1996年第8期。

② 引自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1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0页。

演中强烈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为中国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sup>①</sup>这是一篇把制止日本侵华提高到世界战略的高度的重要历史文献,对动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去具有很大的意义。

宋庆龄讲演后,苏区的红军代表和东北的义勇军代表及其他各地代表也纷纷发了言。一致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战争。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决议》、《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的抗议书》、《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进攻红军的决议》等。大会还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

宋庆龄主持的远东反战大会不仅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宋庆龄把中国反日斗争与世界反帝战争结合起来的一次成功尝试。

### (三) 抨击绥靖主义 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又不断制造事端,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中国各族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冲破重重阻力,开展了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气吞山河的瑰丽篇章。

但是,英、美等一些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一直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即实行纵虎为患的“绥靖主义”,在很长时间里根本不认识不承认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从而严重影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8页。

响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绥靖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统治集团在 30 年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导致内外交困中的一种政策选择,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径的全面姑息和纵容。日本率先在远东挑起战火,对中国肆意侵略扩张,这不仅直接威胁了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而且动摇着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帝国主义远东太平洋秩序。西方国家尽管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慨,却没有也不愿采取有力的对抗措施和协调行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国仅仅发表一篇“不承认主义”声明,对日本奉行“中立”政策。英、法和受他们控制的国联,从一开始即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了纵容态度,并希望日本能立即北上,进攻苏联,后来在国民党政府要求下,国联才派出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聊以塞责,其《调查报告》充分暴露了英、法等国在中国问题上消极的两面政策。他们都不敢对日本进行外交制裁和经济制裁,深怕这样做会过分刺激日本,至于武力对抗更不在考虑之列。总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对日本的侵华行径基本上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绥靖主义政策。

宋庆龄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西方国家的错误态度,她在对外宣传中严厉地揭露和批评了这种绥靖主义政策。九一八后,当国民党政府幻想依靠英、法等国控制的国联收回东北时,宋庆龄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能够向中国进攻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帮助,他们都瓜分中国。国际联盟给日本充分的自由行动,他们所努力的不过是帝国主义间的分赃权利与对于他们本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欺骗。”<sup>①</sup> 随着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宋庆龄又于 1935 年 1 月,再次尖锐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在得到国际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99 页。



掀起了·一股劝诱中国同日本“谋和”的逆流。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活动,构成了远东慕尼黑的严重危机。

在这关系到中国抗战前途和世界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宋庆龄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揭露和谴责了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活动。1939年7月7日,她在抗战两周年纪念日致美国友人的公开信中说:“我要求你们密切注意民主国家中的保守派”,由于他们害怕中国将“赤化”,“期望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争”,因而滋长“鼓励‘求和’与停战的空想。”显然这是一种“蠢笨行为”,它只能“助长侵略者的野心”,“破坏民主国家本身在远东的防御力量”,从而“导致我国的最终失败”。而这一失败,“将使日本易于扫荡民主国家在东亚的最后一点利益。”<sup>①</sup>随后,宋庆龄又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中,进一步揭露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并重申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她尖锐指出:“国际局势的变化使英美的一些集团的阴谋和希望复活起来了,它们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从而帮助日本“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但中国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是任何别的国家所出卖不了的。她庄严宣告:“我们将要与任何这种倾向作斗争”。宁愿战死也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侵略者作战”,直到最后的胜利<sup>②</sup>。由于宋庆龄等的揭露和谴责,以及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慕尼黑的悲剧才没有在亚洲重演,中国战场始终巍然屹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庆龄在揭露和批评西方绥靖主义的过程中,宣传和阐明了中国抗战的重大国际意义。1937年9月,即全国抗战爆发后两个月,她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黠武主义者以及他们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2~283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4~345页。

是威胁，”因而，“中华民族的抗战确乎有着国际的意义。”她郑重宣告：“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sup>①</sup>此后，她又多次重申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了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sup>②</sup>这些精辟的论述，高度概括和充分揭示了中国的国际意义。

在法西斯日益猖獗，欧洲战争爆发的前后，宋庆龄从世界风云的全局出发，不断强调西欧和远东反法西斯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她指出：“日本强盗在东方，德意法西斯在西欧，都已经充分地表曝了他们的企图和手段。”<sup>③</sup>这个事实表明，当今世界的特点是：“和平与民主势力对战争与法西斯势力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的生死斗争。”<sup>④</sup>而“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为保卫全世界的民主而战，它确实是民主国家与民主的敌人之间世界范围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sup>⑤</sup>这就是说，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宋庆龄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不仅重申中国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而且强调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这年10月，她在《致外国团体的信》中说：“目前法西斯侵略的浪潮已扩展到了欧洲”，但“远东前线依然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它还将被证明是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地区”<sup>⑥</sup>。稍后又说：中国的抗战的意义不仅限于远东，而且改变了“太平洋两岸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未来的历史，并且使它更加光辉了。”<sup>⑦</sup>

宋庆龄基于对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的科学分析，即中国战场

---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2~20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3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9页。  
⑦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08页。

是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主战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单是为了中国人民自身的解放,也是为了全人类,因而她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战理应得到世界的支持和援助。为此,宋庆龄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我们的抗战是反抗压迫者、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而这一切也是你们的敌人。从这共同的基点上,我们有着呼吁你们援助和支持的权利。”<sup>①</sup>同时,她还强调国际间的援助是相互的、双向的,也就是说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各国人民援助中国,也就是援助了你们自己。“请你们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sup>②</sup>在这里,宋庆龄以辩证的思维阐述了援助者与受援者之间是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的相互援助的伙伴关系。

总之,在抗战期间,宋庆龄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从历史和未来的高度,最先全面、深刻、客观、公正地阐述和宣传了中国抗战的重大国际意义。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舞广大军民更加英勇顽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更重要的是突破了“绥靖主义”的怪圈,赢得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了解、同情和援助,促进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日阵营的形成,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完全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四) 发起建立“保盟”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宋庆龄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 she就把制止日本侵华提高到世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光辉思想。1934年4月,宋庆龄在与何香凝等联合发表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4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4页。

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又指出：“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朝鲜人等等）作友军；同时，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的关系。”<sup>①</sup> 这就是说，中国在抗击日本侵略时，应遵循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积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1936年11月，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纪念词》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尤其要联合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sup>②</sup> 由此可见，宋庆龄是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国际上，竭力主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

不仅这样，如前所述，宋庆龄为建立国际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凭借她个人的崇高品质和威望，还在她周围集合了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格兰尼奇、詹姆斯·贝特兰、耿丽淑、爱泼斯坦、王安娜等一群旨在援助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为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标志着以宋庆龄为核心的这条特殊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1937年12月，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乘船离开了已成“孤岛”的上海故土，到达香港。次年6月，她在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支持和协助下，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保盟是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的国际性救济组织。这个组织是在中华民族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扫除西方绥靖主义的障碍，架起了国际主义的友谊桥梁，成为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的一个光辉典范。

在保盟最初成立时，由宋庆龄、廖承志、廖梦醒、港英当局医务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43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54页。

总监司徒永觉的妻子希达尔·塞尔温——克拉克夫人、香港大学教授曼·法朗士,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和稍后来港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克拉克夫人、廖梦醒分别担任名誉秘书和秘书,法朗士、邓文钊分别为名誉司库和司库。宣传工作先由英国人约翰·利宁负责,不久由爱泼斯坦、贝特兰负责。先后参加保盟工作的有美国友好人士耿丽淑,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香港首富何东爵士的女儿何依华,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的次女柳无垢,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以及邹韬奋、金仲华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宋子文宣布退出保盟。1943年宋庆龄筹建了一个由中外支持者组成的新机构,国内方面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和茅盾;国际方面有印度的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布恩、德国著名作家托玛斯·曼等。

从保盟的人员组成以及支持者来看,它既具有广泛性,又具有国际性,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产物。总之,保盟的成立,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一步联系起来,从而正式形成了以宋庆龄为核心的这个特殊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保盟成立后,着重做了如下工作:

1. 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实况。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从它成立的一天起,就把向全世界人民传播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实况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从而起到了对外宣传的窗口作用。

保盟先后出版了20多种宣传品,向外国朋友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战的真相和困难,呼吁并指导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工作。在这些宣传品中,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数保盟中央机关刊物《保盟通讯》。这是一份英文刊物,后来又增加了中文版。宋庆龄

在百忙中笔耕不辍,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外广播演说和致海外友人的信函等,着重抨击了西方的绥靖政策,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援助中国与保卫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辩证关系。不仅如此,她还委派观察员和委托一些在中国抗战前线服务或来访的国际友人,通过实际调查,在《保盟通讯》上发表了《访问战斗中的西北》、《同中国西北的八路军在一起》、《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等战地报告30余篇。这些战地报告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以耳闻目睹和鲜为人知的事实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包括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游击区军民的战斗、生产、生活等情况,尤其报告了他们的困难和需要的援助。可以这样说,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以及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真相,有许多是由宋庆龄和保盟传向世界的。

由于保盟出版的宣传品,特别是《保盟通讯》具有举世公认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加之它们文风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新鲜及时,从而赢得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信任和欢迎,为争取各国朋友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援,并相互支持,共同努力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2. 动员世界人民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中国抗战。

保盟成立宣言指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sup>①</sup>。事实正是这样,保盟的出色宣传,特别是由于宋庆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具有感召力的正义呼声,很快得到欧美民主国家中的许多团体和友好人士的广泛同情和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组织的各种援华团体,都与保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保盟给中国抗战以巨大的援助。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32~233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庆龄的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的感召下,各国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士也对援华事业表示同情和支持。其中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和夫人,英国工党领袖曾在邱吉尔战时内阁任大臣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夫妇,香港总督罗富国、杨慕琦,以及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等上层人士,还有一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直接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支援抗日工作。更有一批医务人员来华支援国际和平医院。

此外,很多外国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为支援保盟捐助巨款。同时还有许多普通工人和海员也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尽力。他们中不少人仰慕宋庆龄,“有些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sup>①</sup>。

保盟这座国际友谊之桥梁,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39年6月,保盟成立一周年时,各国朋友的捐款就达25万港币。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的时间里又收到16.3万港币的捐款。除了现金之外,更有大量的捐赠物资被运往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各国都有战事,由于宋庆龄和保盟的努力工作,各国对华援助仍然不断而来。据统计,保盟在1942~1945年仅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医疗工作、儿童、西北计划、河南灾民救济项目款额就达165.3万美元、2.15亿元法币。由此可见,国际援助的数额是相当可观的。此外,在宋庆龄等的号召和推动下,世界各地的华侨也给抗战以极大的支援,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捐款高达26亿元。宋庆龄和保盟除了向海外募集捐款,同时还在香港举办了义卖、义演、义映等一系列筹款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

事实表明,保盟不愧是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友谊桥梁。宋庆龄是这座友谊桥梁的“总建筑师”。她为了拯救中华,呕心沥血,竭智尽力地领导保盟,吸引和团结了无数国际友人和海外侨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138页

胞,投身到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战线,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积极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 3.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雪中送炭”。

保盟对源源而来的捐款和物资如何进行分配,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宋庆龄明确提出,保盟的救济方针是“帮助需要最迫切的地方。”<sup>①</sup> 据此,她把援助的重点放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他们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在抗日战争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条件却又最为艰苦,国民党政府不仅断绝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供给,苏、美、英等国提供的援助也不分给共产党一份,而且还派兵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企图困死各个抗日根据地,消灭人民抗日武装。因此,他们正是最急需救济的地方。保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给予了援助。

一是致力于建立以国际和平医院为核心的医疗救济体系。1938年底,保盟以英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经费,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后来,在延安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4所国际和平医院、60个流动医疗队、2个医科大学和2个制药厂,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游击战争环境和效率很高的医疗网络。

二是动员和组织国内外一批又一批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去抗日根据地。其中来自国外的医务人员,就有加、印、美、英、奥、德、东欧各国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的120多人。他们不仅工作出色,有的还献出了生命,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大夫都是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的。

三是输送大批药品、医疗器材、高级营养品、优质御寒物资以及资金等。如大型流动手术救护车、便携式X光机、医用显微镜、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30页。



新型外科器材、麻醉剂、磺胺药物、消毒包及防治天花、肺炎、白喉、赤痢、霍乱等疾病的疫苗和药物。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毛毯、军大衣以及被单和蚊帐用料等,营养品主要是炼乳、奶粉、维他命、鱼肝油等。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港3年半时间,约送出120多吨各种医疗救济物资,每月平均要送出3吨左右。这些援助被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交口赞誉为“雪中送炭”。

四是建立孤儿院、保育院等。闻名中外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就是在宋庆龄亲自关怀下,由保盟向美国洛杉矶的华侨募集款物兴建的。此外,保盟对延安的抗日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也给予了援助。

宋庆龄身处香港,心系内地人民,她领导保盟始终不渝地为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做着“雪中送炭”的工作。对此,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非常感激,铭刻在心。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专门拜访了宋庆龄,深情地对她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sup>①</sup>

#### 4. 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保盟建立以后,它对边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援助除了“输血”之外,还提供“造血”功能,即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一场独特的经济救亡运动,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经济困难,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之誉。

这个运动的最初发起人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在上海的

<sup>①</sup> 杨耀健:《宋庆龄在陪都》,《红岩春秋》,1991年第2期。

铁如以及宋子文、何东等 20 余人为委员。该会成立后,即开展广泛的国际活动,美国、英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都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的促进委员会,多方面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筹集资金和物资。据陈翰笙统计,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两年多时间里,“接受了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款两千多万元”<sup>①</sup>。

在香港,宋庆龄还亲自主持了保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为援助“工合”而联合举办了“嘉年华会”、“一碗饭运动”等一些重大活动。如“一碗饭运动”就筹集到 22144 元港币、615 元国币,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又补赠 2000 多元港币,共凑足 25000 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始终把支援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的工合事业作为首要任务。该会通过西北办事处把大部分捐款汇交解放区。如 1942 年 2 月,在宋庆龄关怀下,国际委员会把来自马尼拉的捐款 10 万元一次拨给了延安,用来发展边区毛织“工合”事业。宋庆龄还安排陈翰笙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转延安。由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大力支援,使解放区的“工合”不仅得以生存下来,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到 1942 年 9 月底,延安地区已发展有 41 个工业合作社,共 1041 名社员,生产在一年内增加了 4 倍。另外,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根据地也发展了工业合作社。据 1945 年 6 月的不完全统计,仅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先后建立了包括 40 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 230 多个。工合运动生机勃勃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由此可见,工合国际委员会和保盟一样,都成为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它为支持中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坚持长期抗战,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 118 页。

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宋庆龄不仅具有内容丰富和颇有特色的统一战线思想,而且不遗余力地从事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促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巨大努力。正是有了这样的合作,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才得以向前推进,中华民族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有新的特点和新的使命,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统一祖国,建设祖国贡献力量。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积极参政议政,不但自己模范执行,而且把一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等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和平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作用。宋庆龄光辉的统战思想和为统战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而独特的贡献,在历史上永放光芒。

## 第五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最后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宋庆龄始终积极投入的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救国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但是,宋庆龄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坚持的团结、民主、进步的事业仍在向前发展,她为迎接新中国的战斗,在新的形势下仍在继续。

1945年12月,宋庆龄将中国保卫同盟改称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保盟”为此发表声明: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任务。要解决和完成它们,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

“战争以法西斯的失败告终,并且带来了和平。似乎人民现在能安定下来,享受劳动的果实了。可是,在中国就不能这样。中国所遭受的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

“中国政府面对一大堆政治和军事问题,却不能恰当地处理它

们。”<sup>①</sup>

这些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将如何解决呢?

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宣言,阐明中共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达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并且让出了南方八个解放区,促成并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真挚而顽强的努力。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置全国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于不顾,在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之后,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对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和法西斯专政。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宋庆龄继续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解放,为民众的基本民主权利和生存权利,为建立一个真正和平、民主、团结、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 一、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和个人独裁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积极支持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在国共谈判期间,她会见了从延安抵重庆参加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并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名义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还出席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的茶会。在茶话会上,宋庆龄讲了话,表示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在建设方面对边区、解放区继续予以援助。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3、39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945年12月,宋庆龄从重庆返回阔别8年的故乡——上海。上海,她的行动仍然受到反动当局的阻挠和监视。但她无私无畏,坚持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以各种斗争方式,不断揭露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 (一) 祭悼民主战士,疾呼和平民主

宋庆龄回上海后不久,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特务,冲进学校,血腥镇压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罢课师生,开枪打死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4人,重伤60人,造成著名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大、中、小学及各群众团体两万余人,在玉佛寺举行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追悼大会,宋庆龄被推举为大会主祭团成员之一。大会由柳亚子致悼词,一致通过致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政府四项诺言,惩办屠杀师生的凶手等10余条正义要求<sup>①</sup>。宋庆龄为大会赠送“为民前驱”的挽幛。

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于4月8日冒恶劣天气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和请示,飞行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同机罹难。史称“四八烈士”。噩耗传到上海,宋庆龄不胜悲哀。她和左舜生、黄炎培、柳亚子、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许广平、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胡风、沙千里、史东山、蔡楚生、柯灵、夏衍、华岗、潘梓年等共同发起上海各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sup>②</sup>。4月30日,宋庆龄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止和反对,参加追悼大会,并和左舜生、黄炎培、柳亚子、马叙伦、马寅初、陶行知、章乃器、叶圣陶、潘梓年、华岗、许广平等24人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由左舜生

<sup>①</sup> 《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16日,1946年4月30日。

<sup>②</sup> 《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5月4日。

任总主席，马叙伦主祭。由宋庆龄领衔的祭文中，说：“吁乎哀哉，八年抗战，先生等不死，外侮已弭而先生等死。人孰不死而先生等之死，举国为悲，先生等之死，似无为之而实有人事。先生等之不辞危险，冒云雾之围袭而事空行者，岂不以民主之危，似千钧之系于一发，而思维而止之，乃竟以身殉，而不得见民主之治，吁乎哀哉！”宋庆龄送上挽联，上联是：和平大业犹赊，贤劳正赖，何意中道捐弃，碧血长天永留恨；下联是：和平曙光初吐，瞩望方殷，难堪噩耗惊传，苍生大地尽含悲<sup>①</sup>。

1946年6月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并对其统治区加强了白色恐怖。6月底，昆明各界人民组织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万人签名运动。7月11日，李公朴（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昆明支部负责人之一）遭特务暗杀。闻一多（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昆明支部又一负责人）拍案而起，公开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并激昂地说，为争取民主，绝不怕牺牲。15日，闻一多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7日，周恩来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表严正声明，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的法西斯行为。宋庆龄面对特务环立的白色恐怖，毅然挺身而出，于7月22日的声明中谴责国民党腐化、恐怖和政治暗杀。在上海各界发起召开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中的人员中，宋庆龄再次名列榜首。并在追悼大会上以“血溅金沙，冗有大名光宇宙。魂招歇浦，愧于巨笔志历勋。”<sup>②</sup>的挽联，再次发出正义的呼声，疾呼和平民主。

## （二）谴责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

当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时，宋庆龄于1946年7月22日，在上海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主张——《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12页。

<sup>②</sup> 蒋洪斌：《宋庆龄的足迹》，第6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护宋庆龄于7月22日发表的声明。

延安中国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于8月9日致电宋庆龄拥护她在7月22日发表的《声明》，指出：“先生发表庄严声明，号召停止内战，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立即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中国之危亡，并谴责中美反动派狼狈为奸。对此正义呼声，解放区七千万妇女衷心拥护，誓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到底。”<sup>①</sup>

8月12日，重庆的工商、文化、学术、文艺、戏剧、新闻、律师和教育等各界人士史良、邓初民等136人，为响应《声明》联名发表《给全国同胞的一封信》。信中指出：“7月22日，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上海公开发表对时局主张，指出中国的好战分子发动内战，加深民族危机，威胁世界和平，主张结束独裁政体，立即成立各党派一致参加的联合政府；并吁请美国撤退在华驻军，暂时停止一切的援助，……这完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与要求，我们呼吁全国的人民，一致的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的主张，誓为其实现而奋斗。我们并向美国政府与人民呼吁，……立即从中国的土地上，撤退那‘并不能增进中国人民间的和平与秩序’的驻军，收回美国于7月14日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得到和平与民主的时候，暂时停止一切军事经济的援助。”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中国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穷困中拯救出来，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奠定东方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础，中美间的伟大友谊，也才会更加强大与巩固。”<sup>②</sup>

8月13日，蔡廷锴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干部理事会，为响应宋庆龄的《声明》，发表《声明》说：“我完全赞同孙夫人在7月22日的号召，它不但代表着全国主张公正和平人士的意见，亦即表明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内战烽火正在蔓延中，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已重临战争和死亡的威胁，我们主张立即停止内战，重新

<sup>①</sup> 《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8月10日。

<sup>②</sup> 《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8月12日。



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两党争端。”<sup>①</sup>

1946年9月23日,上海各人民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即日起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宣传周运动,并致电联合国及美国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宋庆龄的7月22日《声明》,在国外也得到强烈的反响。7月23日,美国共产党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政府撤回一切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8月2日,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发表谈话,赞成《声明》,认为为促进和平(美国)应放弃军事干涉,这是美国人民所欢迎的。<sup>②</sup>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圣路易环球民主报》等报刊,发表谈话或评论,支持《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援助,主张撤退驻华美军<sup>③</sup>。

《密勒氏评论报》(上海)于7月27日发表社论,指出宋庆龄忠心为国,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她的这一历史文告,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号召。苏联塔斯社从上海发出电讯,指出宋庆龄的声明能够将中国引向和平与民主的道路。

对宋庆龄的《声明》,国民党当局想禁止也禁止不了。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7月24日致宋庆龄信中,引用艾米·肖费小姐(受雇于美国国务院)同原美国《时代》杂志记者,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新闻顾问杰克·比尔的谈话。“肖费小姐请他谈一谈声明将产生多大的效果。他说:‘也许主要的效果是在海外……。在中国,它是被禁止发表的。但是,即使在中国它也会传播开去。懂英语的中国人从国外的报导中了解到声明,然后转告别人。正因为遭到禁止,人们一旦知道影响会更大。就美国而论,它将产生

① 《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8月17日。

② 《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8月5日。

③ 《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7月25日。

相当大的效果……。目前,只有4个中国人的名字在美国有分量,他们是:大元帅、蒋夫人、宋子文和孙夫人。孙夫人在此时发表声明,将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sup>①</sup>

1946年11月19日,美国医生乔伊·皮奇致宋庆龄信中说:“你的公开声明已引起了众多美国人的思考。一些有相当地位的人(他们是费城的保守派)曾告诉我说,读了你的声明后,他们更加仔细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并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真实的情况。我知道,我们需要的是行动,美国人民从蒙蔽中幡然觉悟时,行动就会立即到来”<sup>②</sup>。

宋庆龄的挚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当时在美国曾说过:“孙中山夫人给美国人民的信中有一句特别引人注目的话。她说,反动派打不赢中国的内战。”

由此可见,宋庆龄的7月22日声明,使国内外人民了解中国内战的真相,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取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的积极支持。这是宋庆龄在全面内战之初对中国人民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 (三) 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实行组织联合进行反独裁斗争

宋庆龄主张迅速组成联合政府,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1947年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演出了一场“行宪国大”的闹剧,声称要选举、“还政于民”,他们到处散布“孙夫人在广州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的谣言,妄图利用宋庆龄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欺骗民众。对于国民党的这种拙劣表演,宋庆龄十分气愤,她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假民主欺骗民众的闹剧。于是在9月1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指出“此种传闻完全不确,我并无任何从事政治运动以图参加政府的意图。”“我在广州既不是‘代表’,也不是

<sup>①</sup>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83~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sup>②</sup>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04页。

正式居民。”宋庆龄的声明表明了她在抵制“行宪国大”的鲜明立场，给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坚强支持，再次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宋庆龄一贯关注国民党各民主派的反蒋斗争，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实行组织联合进行反独裁的斗争。早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后不久，在上海的李济深等就准备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的统一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从内部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们曾与宋庆龄联系，宋庆龄从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促成联合政府建立的战略高度出发，支持他们的行动，并约李济深在上海新雅酒家会面，宋庆龄在其秘书（英文）卢季卿及其丈夫祝世康的陪同下赴约。会见时，李济深向宋庆龄介绍了筹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设想。宋庆龄听后表示支持，并鼓励他要多发挥作用。随后，李济深就到香港着手筹组“民革”的事宜。当宋庆龄了解到国民党将派特务去香港谋害李济深时，立刻派专人到香港通知他加以防范<sup>①</sup>。

1947年9月，不断受蒋介石排挤、被迫赴美“考察水利”的冯玉祥到达纽约后，开始联合在美国的国民党民主分子，进行反内战反独裁斗争。同年11月，在纽约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冯玉祥还派朱学范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到香港联络。

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指出“在我军反攻胜利发展中，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必须考虑自己的立场，计算将来的出路，蒋介石集团自己及其美国主子也必须预筹退路”<sup>②</sup>。同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镇压群众运动，迫害共产党员、民主

<sup>①</sup> 祝世康：《峥嵘岁月忆深情》，载《文汇报》，1981年6月5日。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70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

党派成员和革命者。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先后秘密转移到了香港。

国民党内各民主派别在反蒋斗争中,互相支援,配合行动,并且产生了联合的要求。为了团结和集中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统一斗争步调,1947年秋,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信中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划一切”<sup>①</sup>。并决定在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讨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非宋庆龄同志莫属”,并委托朱学范“同她联系,请她俯允担任主席。”<sup>②</sup>

朱学范通过“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的关系,请俞志英到香港来,俞志英既在劳动协会工作,又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能够经常见到宋庆龄。朱学范把李济深、何香凝等亲笔写的《上孙夫人书》交给了俞志英。主要内容是: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的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信中恳切表示“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主张为主张……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sup>③</sup>朱学范托俞志英把《上孙夫人书》带到上海面交宋庆龄,并且向她详细汇报他们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俞志英接受这个重大任务后,通过龚澎找到

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第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宋庆龄纪念集》,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宋庆龄同志》(画册),第172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向他请示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章汉夫对俞志英说:你不用去上海了。并说:“宋庆龄同志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她赞成成立国民党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参加这个革命组织,经她缜密考虑,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sup>①</sup>当宋庆龄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时,中共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意见。章汉夫要俞志英把这情况转告朱学范。

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和朱学范等听到宋庆龄和中共的意见后,“每个同志都很兴奋,把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革命活动的支持,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爱护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而对宋庆龄同志的深谋熟虑更是异常钦佩。”<sup>②</sup>

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出席代表110余人,选举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20人为主席团,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sup>③</sup>。1948年1月,大会通过了有关文件,选举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柳亚子为中监委主任。

民革在《成立宣言》中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的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民革的《行动纲领》规定:“本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内对外政策为基本原则”,“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

① 《宋庆龄纪念集》,第107页。

② 《宋庆龄纪念集》,第108页。

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第18页。

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行动纲领》还提出:“反对美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之内战政策,”号召人民一致起来,“要求美国及顾问团退出中国,停止军事及财政援蒋。”<sup>①</sup>

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民革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时刻,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大联合。它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三大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同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公开决裂,从而把国民党爱国民主的联合和斗争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加陷于孤立。

## 二、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以上海为基地,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争得他们应得的一份。它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紧密合作,给解放区的医疗事业和其他事业以巨大的援助。

### (一) 介绍真实情况,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

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尤其是住在华北和以前敌占区的,他们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经常为发生的灾荒和瘟疫困扰着,看不到在近期的希望,只能生活在失望和赤贫中。中国的文化教育也不是短期能够恢复的。”“中国需要外国朋友们的更多帮助。她继续吁请道义、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渡过战后的困难时期。”“虽然国际救济组织是十分慷慨和令人钦佩的。但是,它们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中国的广大人民需要全世界的朋友和同情者大力援助。”“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

<sup>①</sup>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第18页。

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sup>①</sup>

宋庆龄还以个人通信的方式,争取外国朋友的同情和帮助。1947年1月9日,她致函美国出版商乔治·布雷泽勒,信中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也就是我心中首要的事,是如何帮助中国。我认为你们的机构在这方面能有许多作为。”<sup>②</sup> 1947年4月,宋庆龄在《向国外的呼吁信》中,呼吁国外朋友“赶紧”援助中国人民。她说:“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任务是为华北晋察冀地区公共卫生工作提供必要的设备。然而这仅是这项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接到全国各地的请求都注明了‘紧急’字样。只有不断收到外界的援助,我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不论你捐赠的是钱或物资,我们无不欢迎。”<sup>③</sup> 当国际援助遇到困难和发生问题时,宋庆龄于1947年9月复函美国另一出版商弗兰克·泰勒,指出:“我有件担忧的事想告诉你。如你能加以考虑,我将不胜感激。就是将来从美国获得资金的可能性问题。我们总觉得不久将会有某些行动。USC(即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参与的联合行动,在所有细节问题上都避开我们。但我们不知道是否现在是考虑我们自己单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sup>④</sup> 宋庆龄在上海以中国福利基金会为阵地,继续运用她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影响,争取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朋友更多的支持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 (二) 支援解放区医疗事业和其他事业

1945年12月,宋庆龄回上海后制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计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4页。

②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0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0页。

④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32页。

划,把工作重点放在援助解放区国际和平医院和其它事业上。她宣布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远景计划:(1)支持国际和平医院与医学院的工作(全在边区与解放区);(2)支援 10 个托儿所与孤儿院工作(也在边区进行);(3)援助贫病作家(在上海、重庆、昆明、成都进行);(4)支援实验农场与制药厂的工作(在边区)。

从以上的计划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始终把援助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和其它事业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并且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广大解放区军民对医药卫生和儿童保育工作要求的增长,中国福利基金会所资助的各项事业也随之迅速发展。

从抗战胜利到 1948 年的 3 年中,中国福利基金会资助的国际和平医院,有了迅速的发展。在 8 个解放区中,由原来的 4 所发展为 8 所,分别分布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苏皖、山东、晋绥、冀热辽和东北等 8 个地区,还有 42 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共有 11800 个床位,此外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为当时的 1.4 亿人口的中国解放区军民服务。早在抗战刚刚胜利时,当时的保盟就利用沿海运输恢复的有利时机,把用美国援华会提供的款项在马尼拉买下了美军作为战争剩余物资拍卖的一所有 250 张病床的医院的全部设备,运到上海,再转运到苏北,建立了第四国际和平医院。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在收到这所医院的全部设备后,高兴地专函向宋庆龄致谢并开列了详细的收据。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努力下,国际和平医院得到了不少的国际援助,包括捐款、设备和药物。解放区许多第一次出现的东西,都是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运送到解放区的。如第一架战地用的轻便 X 光机、第一台显微镜、第一批外科器械、麻醉剂、磺胺药物以及第一架制造外用青霉素的简单机器。此外,分布在 8 个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还经常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去的各种药品、维生素、毯子和奶粉。这一时期,中国福利基金会还曾试图建立一个供应国际和平医院



的经常运输制度,并且证明在有些地区是行得通的。在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驻开封代表、“解总”河南分会负责人赵政一给“解总”总部的一封信中提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已包租两架飞机运送医疗物资前往邯郸。这批物资存于中牟 80 箱、存于开封 30 大箱,包括盘尼西林、医疗设备、医学书籍等,全是非常有价值的物品。这批物资标明赠送给山西北部孔大夫负责的国际和平医院,计划经由黄泛区转送北方。假如这条线路被证实是安全的、令人满意的话,以后有可能会继续按这种方式带医疗物资过来。”<sup>①</sup>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福利基金会对于国际和平医院的帮助是大量的,持续的。而这些国际和平医院的发展,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国际和平医院网的组成,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帮助解放区先后成立了 6 所白求恩学校和培养急救员、卫生员、护士、助产士和其它医务人员的短期医科训练班,并给他们运去了大批医学、医药书籍和刊物。解放区的这些学校虽然处在连年战争不停的环境中,同国际和平医院一样,要经常搬迁,但是他们仍然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了教学。仅在白求恩建立的第一个医院里,到 1948 年,就培养了 2000 多名医务工作者,其中包括医生、护士、化验员和药剂师。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资助下,解放区还成立了好几个制药厂,几乎遍布于各个解放区。其中最早的是西北制药厂,规模最大的是山东的新华制药厂。这些制药厂起初只能制生药,后来物质条件有了改善,也能制造化学全合成药品。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对许多解放区的农场提供了援助,如对延安的光华农场,三边的畜牧场,山东莱阳农场,河北辛集农场等。除了派农业技术专家到农场工作,还送去种籽、人工授精器、杀虫剂等。

<sup>①</sup> 赵政一:《致中国解放区救济总部的信》,《民国档案》,1984 年第 4 期,第 26 页。

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的儿童事业也进行了积极的援助。西北的边区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是最早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援助的儿童福利机构。洛杉矶托儿所是宋庆龄通过洛杉矶的国际友人和华侨募集的物资和捐助援建起来的。他们起初收养战灾孤儿、无家可归的儿童,后来便发展成一般的托儿所了。像这样的托儿所,在陕甘宁边区一共有10个,在山东有7个,其他各地还有许多。当时中国解放区儿童保育委员会的主任蔡畅1946年7月30日写信给宋庆龄,向她介绍解放区儿童工作的情况,“祈望夫人多赐珠书并与赞助。”邯郸福利托儿所的建立,便是1946年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法币20万元的资助,再加上当地政府拨款15万元,以及各界人士的捐赠后,才得以实现的。位于山东莱阳的胶东托儿所,经费困难,在战争期间丝毫得不到外界的援助,孩子们缺乏足够的营养食品和药品,他们向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吁请援助,很快基金会给他们送去了救济物资。1946年12月22日,胶东托儿所写信给宋庆龄,并开具收据:收到经由胶东国际和平医院转来赠送的婴儿物品一宗。

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还热情关怀和支援苏北淮阴的新安旅行团。这是陶行知和他的学生汪达之创办的一个进步少年儿童团体,成立于1935年10月。1946年春,他们筹办《华中少年》杂志、《儿童画报》和少年丛书,苦于缺少经费又没有印刷机,便在4月27日写信给宋庆龄,对她“在那样不好的环境下,热心为中国人民幸福而艰苦奋斗,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敬礼。”并希望能支援该团急需的印刷设备等物品。7月24日,宋庆龄批示中国福利基金会给“新旅”复信:送上油印机一架,如有需要请告知,当尽可能代为设法……在收到了这架油印机后,该团团团长左林9月14日给宋庆龄写了热情洋溢的信,表示“非常感激”。

此外,针对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中国福利基金会还直接或间接介绍了许多外国医生,护士和其他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工作。苏皖

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曾在一封给宋庆龄的信中提到：“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全部建筑和设备，系以 200 间房间计，另于医院正式开业时，此间医疗人员较少，我们只能训练若干看护。至于院长、内外科、产科主治医师、看护长，统统希望选择介绍，以便顺利进行。”在一个时期内，由中国福利基金会资助的几个医疗队，同时在几个解放区工作。如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宋庆龄就请了美国外科医生薛尔茨，以及内科医生、化验室主任、高级化验师和总护士长等外国朋友去帮助进行医疗救治工作，并请他们代为培训医护人员，帮助解放区医护人员提高技术水平。在 1947 年到 1949 年，宋庆龄向董必武介绍了美国农艺师寒春去解放区。中国福利基金会还通过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招募了 2 名护士伊莎贝尔·伊斯顿和赛布尔德逊，并陆续介绍了美国护士白尔瑟·兴登，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琼·兴登，饲养牲畜专家，兽医欧文·恩斯脱等到国际和平医院和其他单位工作。他们不仅给解放区带来了新的技术，而且帮助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

据不完全统计，仅 1944 年到 1947 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解放区的捐款即达 22 亿法币，不包括其它医药物资和书籍等。1947 年，当解放战争处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转折阶段，中国福利基金会委托一些国际友人为解放区送去 15 吨医药物资。1948 年，宋庆龄在《致海外朋友》中说：“在去年一年中，中国福利会继续把捐款和物资赠送给华北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和它们的四十所分院、白求恩医学院、药厂、孤儿院和实验农场。虽然目前的内战使运输既困难又危险，然而已有数吨手术器械，主要是药物，医学书籍，种子和农业书籍，儿童衣服，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转给上述单位了。”<sup>①</sup> 1949 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又将由于解放战争未能运出上海的 300 吨物资拨交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43、444 页。

### (三) 争取“联总”工作人员为解放区提供更多物资

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争取更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解放区,就要做“联总”和其他半官方救济团体的工作。首先是同“解总”密切合作,进行反对不合理分配的斗争。战后掌握救济物资的“联总”,把救济金和物资的98%拨给了国民党政府,而战祸严重的解放区,只分到2%。“联总”驻华官员和职员对此加以证实。1946年,有300人联名写信给“联总”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抗议国民党把“联总”的救济用作政治上的武器。他们提供的数据是:全中国有资格接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共420万人,其中260万人在解放区;“联总”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到那时为止共65万吨,其中运往解放区的仅3300吨,即使这么一点物资在运送过程中还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滞或干扰。宋庆龄多次强调:“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援助理所当然应归中国人民所有。”<sup>①</sup>根据宋庆龄的意见,中国福利基金会同“解总”紧密配合,强烈要求改变不公正的分配状况,并且不断揭露美国政府操纵“联总”,利用“救济支援蒋介石集团进行反人民内战的罪恶事实。”

在同“联总”歧视解放区军民的不合理分配斗争的同时,宋庆龄还注意同“联总”、“行总”(即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争取他们多为解放区军民提供资金和物资。这一争取工作取得了成效。宋庆龄曾设家宴邀请“联总”专管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美国医生鲍锡克参加。席间,宋庆龄介绍了各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希望他能主持公道,对送往解放区的药品在数量上应该多些,在质量上还应好些。中国福利基金会和“解总”的工作人员都能同“联总”和“行总”的人员广交朋友,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和需要援助的物资。许多“联总”工作人员因运送物资到解放区亲眼目睹的事实,也使他们加深了对

<sup>①</sup> 《中国福利会二十年》,第19页,中国福利会馆藏。

中国解放区的了解,并寄予同情。1947年4月4日,“联总”中国分署60多位高级职员集体通过决议,向“联总”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按照“联总”的宗旨办事,停止对中国解放区军民的歧视。“联总”中国分署的职员、著名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曾帮助起草向“联总”和“行总”交涉的文件,还提出要求拨给解放区医药物资。“联总”另一位职员、美籍农业专家李马萨,主动向“解总”介绍援助农业物资的品种和性能,亲自陪同“解总”人员进仓库挑选解放区适用的农具机械等。还有不少“联总”人员热情帮助开展工作。如“联总”护士、美国人陶乐赛·桃爱尔小姐、牙医师摩西·奥斯布尔、化验师丽琳·凯泰小姐3人,1946年同在华北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和晋察冀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这年底,当地人民政府决定撤退时,他们自动请求留下,放弃了搭乘去北平的最后一架飞机的机会,跟解放区军民一同撤退到了山区,坚持在那里达5个半月之久,为解放区培养医护人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还有一位加拿大人夏理逊,他是“联总”医务官,加拿大人夏理逊,在1946~1947年期间,为支援华北解放区军民,他不顾艰难险阻,3次亲自带队把中国福利基金会等团体捐购的大批医药物资送到解放区,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沿途的刁难和折磨,以及过度劳累而在1947年1月10日,不幸在山东张秋病逝。临终前的9日晚上,他在呓语中还不停呼叫:“快点呀,那些病人等待着药品救命呐!医生的眼睛都盼穿了!已经两个多月了,我应允的事,一定要实现诺言呀!”<sup>①</sup>第二天清晨,他离开了人间,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享年才59岁。噩耗传到上海后,1947年2月7日,“解总”、中国福利基金会、“联总”在新亚饭店举行了夏理逊悼念会。宋庆龄出席了悼念会。“解总”代表林仲郑重宣布:将邯郸国际和平医院命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和夏理逊医学院,以志纪念为中国人

<sup>①</sup> 《宋庆龄在上海》,第112页,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民献身的国际和平战士夏理逊大夫。

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对中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支援解放区军民赢得胜利的历史功绩,董必武在《祝中国福利会二十周年》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中国福利会在宋庆龄先生的领导下,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着卓越的贡献的。”<sup>①</sup>

### 三、共商建国大计

#### (一) 黎明前的战斗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聚集在长江北岸,准备渡江南下。此时,南京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陷于全面崩溃、穷途末日的局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方面演出蒋介石“引退”的闹剧,由李宗仁“副总统”出任“代理总统”,开展“和平”攻势,妄图赢得时间,偏安江南,实行“划江而治”,以便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仍调兵遣将负隅顽抗,在京沪杭一线布置重兵,妄想在上海为中心的三角地带内严防死守背水一战,以期作最后的挣扎。同时在国统区加强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正当国民党政权行将覆灭,人民解放事业胜利在望之际,宋庆龄的政敌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宋庆龄要出山了”,“孙夫人将在国民政府中就职”。宋庆龄听到这种政治诬陷,非常气愤,连声申斥:造谣!无耻!卑鄙!为了辟谣,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亲自签发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声明》声明说:“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sup>②</sup>

<sup>①</sup> 《董必武选集》,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sup>②</sup>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sup>①</sup> 上述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宋庆龄的尊重、关怀和诚挚的感情。

1949年2月20日,宋庆龄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信中说:“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sup>②</sup>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审时度势,决定还是留居在上海继续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工作,以迎接上海解放。根据当时上海的形势,宋庆龄是采取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方式进行活动的。如支持联救会开展救济难民、难童的工作。联救会的全称是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它是1949年4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由上海社会公益人士和一部分社会救济福利、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成立的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由颜惠庆任主任委员,赵朴初为总干事,办公处设在云南中路仁济善堂。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它的团体会员。宋庆龄首先表示,把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存物资交出来供联救会使用,同时在人力上积极支持和参加联救会的各项活动。基金会的总干事谭宁邦和三个儿童福利站的站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多数参加了联救会的工作。儿童福利站也作了收容儿童的场所,并把西摩路宋家老宅(今陕西北路369号)让给第三儿童收容站使用。由联救会和基金会等机构一起在市区开办14个儿童收容站,一律附设儿童福利站,开展救济难民和儿童的工作。中国福利基

<sup>①</sup>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0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58页。

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sup>①</sup>

6月28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南下上海。

6月29日,当邓颖超来到宋庆龄寓所拜访她时,两位伟大的女性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邓颖超把两封信转交给宋庆龄,并告之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恳切盼望宋庆龄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宋庆龄接过信后非常激动。

6月30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饭店大礼堂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的纪念晚会,这是上海解放后举行的第一次盛大集会。陈毅、潘汉年等党政领导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代表以及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吴有训、周予同、茅以升等各界人士都到会参加,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也应邀出席了晚会。大会由陈毅市长致词,他讲完话就立刻宣布:“请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讲话”。由于宋庆龄是抱病参加大会,所以由邓颖超代她上台宣读她写好的祝词:“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旗帜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向人民的力量致敬!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他们的英勇,无匹;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sup>②</sup>

全场为她这诗一般的语言所倾倒,为这渗透了她对人民、对共

<sup>①</sup>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06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1页。



产党、对人民军队充满真切感情的祝词所感染，会场上掌声雷动。邓颖超用她那口齿清楚的标准国语，读得抑扬顿挫、感情充沛和铿锵有力，声声扣动人们的心弦。

随后，各界代表都作了热情的讲话。

7月7日晚，为欢庆上海解放和七七抗战十二周年，上海各界代表在南京路大光明戏院举行纪念大会。当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宣布大会开始、并推举宋庆龄、颜惠庆、黄炎培、吴耀宗、胡厥文、茅以升、季方、陈毅、粟裕、舒同等22人为大会主席团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宋庆龄和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坐。

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演讲。她自豪地说：“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力量。”她严正警告帝国主义：“我们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在亚洲统治的基础，他们的势力正在崩溃中。因此，我们向企图阻止我们巨大的民主浪潮的帝国主义提出严重警告，我们向虚妄地制造国际战争烟幕并且威胁人民民主力量的和平愿望的反动派提出严重警告：滚开吧！否则你们将同归于尽。”<sup>①</sup>

### （三）为建立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贡献力量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的陪同下，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北平。一路上“她热切地注意着各种新生活的迹象”<sup>②</sup>，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那些新种植的田地，那些最近收割的田地，当它们在我的眼前滑过，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驰过去，当我看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3、464页。

<sup>②</sup>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17～51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到标明出地形的、无数大小的河流,有些是涓涓的细流,有些是急浪翻腾的大河,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而这种力量随处都看得到。……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它使我想到了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我所看到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会‘行’的。我也看到,只须具备技术知识,我们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是会‘知’的。……假如把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我们可以向前推进得很快。各阶层的人必须联合起来向我们的革命目标奋斗前进,这是唯一向前进步的道路。”<sup>①</sup> 她北上途中的这番思绪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充满信心。28日,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北平火车站,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到车站迎接,洛杉矶儿童保育院孩子们向宋庆龄敬献鲜花。洛杉矶保育院抗战时期设在延安,是由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捐建的。宋庆龄一贯关心儿童,儿童也代表着祖国的未来。这个欢迎仪式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这一精心的安排富于戏剧性,却又非常符合历史的发展”<sup>②</sup>。9月2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一起步入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面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像片,使宋庆龄倍感亲切、欣慰和振奋。宋庆龄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89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这次会议是由不同党派、不同阶级和阶层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组织,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且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大会通过了共和国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4~476页。

②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20页。

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大会上,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发表了讲话,她热情讴歌了人民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达到了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sup>①</sup>接着她还就农村工作、工业化生产、文化教育以及国际形势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讲话结束时她说到:“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sup>②</sup>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宋庆龄当选并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表明她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这是对她为中国民主革命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这预示着在中国开始了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新时期。

10月1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宋庆龄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检阅陆海空三军和群众游行队伍。当毛泽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8~470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1页。

## 第六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献计献策,参与制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探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擘划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殷切关注中国的统一,为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致力于国际宣传工作,把中国社会主义进步的事实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宋庆龄在众多的领域中,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光辉的业绩,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 一、参与制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建设新中国的和平年代里,宋庆龄一如既往地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不倦地工作,积极地参与到筹划新

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工作中去。

### (一) 视察东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当务之急。当时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多农民仍旧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而旧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为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基本任务——彻底根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策略方针。1950年6月1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土地改革问题展开讨论,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草案》。毛泽东在会议的闭幕词中号召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积极参加,支持土地改革,像过去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新中国的诞生,使宋庆龄感到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她怀着对中国迅速复兴的希望和信心,1950年10月与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一起在朱明、廖梦醒、沈粹缜、罗叔章的陪同下,赴东北考察。在东北农村,宋庆龄仔细地向当地的农民了解土地改革后各方面的情况。在双城县民和村,宋庆龄视察了供销合作社、民和小学和几户农民家庭。每到一处,她都和群众亲切交谈,问寒问暖<sup>①</sup>,临行时宋庆龄还和女村长傅雅东一起抱着丰收的稻谷合影留念。在长春市郊胡家店村,宋庆龄看望了翻身农民,并到村民家叙谈,村民告诉宋庆龄,农民现在不缺吃、不缺穿、只缺文化。去年在战争废墟上重建村庄时盖了一所前所未有的学堂,村里儿童都能上学了,在农闲时还办冬学,有七百名成年人注册,其中有三百多是妇

<sup>①</sup> 《黑龙江日报》,1981年6月4日。

土地改革后农民“经济生活的巨大改善,文化活动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进。”“这一些进展如何有利地影响了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在从事恢复和重建工业时,具有何等的热情。”“我们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多么彻底地工作着,他们怎样改正错误以寻求真理,他们怎样充分地认识工农阶级的力量,他们又怎样动员这一个力量,走向更大的成就。”<sup>①</sup>

视察回来后,宋庆龄对东北的情况作了深刻、实在、而又全面的研究,并就此行撰写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她以详实的数据,真实的事例,对土地改革后东北农村和城市的现状作了分析。宋庆龄认为,经过土地改革的东北农村,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改后进行的耕种科学化运动、互助组等都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农业产量因此而迅速提高,富裕了的农民购买力迅速增加,这就大大刺激了工农业生产。宋庆龄同时还深刻地指出:在东北农村,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基本的经济状况,同时也为改变整个政治环境和政治机构铺平了道路。“群众的自由,代替了旧日所受的压迫。群众的权力,代替了集中在地主及其狗腿子手中的暴力。”<sup>②</sup> 土改后农村中“除开过去的地主外,各阶层都积极地参加了政府的管理。”<sup>③</sup> 显示出参加农村政治生活的广泛性。宋庆龄特别介绍了政府推动工作的基层组织——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宋庆龄不仅分析了土地改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了东北农村的生活,她还就土地改革对东北农村在福利、文化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她认为土改后“东北的农民在思想上已经获得解放,他们渴求知识与文化。”<sup>④</sup>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95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1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1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19页。

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宋庆龄还就土地改革对城市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乡下农业生产不断增加的基础上,东北的城市正迅速地发展为新中国的基地。”“由于土地改革后生产率的增加,而且在城市中依靠了工人阶级,东北的工业产量已逐渐恢复起来,走上了重建和发展的道路。东北工业不仅完成了对于人民解放军和农民的任务,并且为经济建设积累了资金,为大规模生产积累了经验。”<sup>①</sup>

宋庆龄的这篇调查报告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对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它通过土地改革后东北在政治、经济、福利、文教等方面取得的卓有成效的事实,说明了土地改革对中国经济恢复的必要性。因为中国要工业化必须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村提供轻工业原料和市场,没有一个彻底的土地改革,就不能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她不仅肯定了土地改革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深刻变革,也预示了这些变革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美好未来。宋庆龄经过这次东北考察,不仅看到了中国复兴的希望,也验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切实可行的,是解决中国贫困的正确方法。党中央在广泛征询了各级党委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在1950年冬起,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开展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

## (二) 指导制定新中国的救济福利工作方针

建国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中国经济几乎面临崩溃,特别是蒋介石集团进攻解放区,以及在溃退前施行的大规模的破坏,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的灾难还存在着。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面临的灾情已是刻不容缓,救济和福利工作成为人民政府整个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19~620页。

1950年3月周恩来致信宋庆龄,托罗叔章前往上海迎接她出席并指导全国救济会议和筹备工作。宋庆龄长期从事救济事业,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在十几年的救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她在中国救济福利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的成立为宋庆龄的事业开辟了新的天地。开国不久她就致信伍云甫,就全国救济和福利工作提出了她的看法和具体的建议:她首先针对各级救济福利组织之间缺乏适当的协调,搞了过多的小计划和无止无休的重复等问题,提出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决定全国在救济和福利方面的需要,尤其要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的地区的需要予以特别的注意。”“这个机构可能是临时的,但是它带有长期性,它将在各个民间组织之间,在官方渠道和民间组织之间起协调人的作用。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可以授权该机构,把救济和福利工作交与各组织承担。所有这些组织当然必须遵照政府的指示,接受它的指导。这特别适用于民间组织。”她还针对全国各救济福利组织都没有向中央机关如实报告它们的活动的问题,建议“建立所有救济福利组织的请示报告制度,以便我们能制止重复,保证最高的效率,并从已发放的全部救济中获得效益。”宋庆龄还建议“出版一个月刊或者通讯以领导救济工作,并对未来的计划予以指导。”以此解决救济和福利工作的各个方面未能有计划地推行工作标准的问题。根据多年的救济工作经验宋庆龄提议“建立国际宣传机构,根据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则接受中国的友人馈赠的礼物,并在此基础上向国外募集资金和物资。该机构也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在自力更生建设新中国中取得的成就。”<sup>①</sup>

为了尽快克服面临的困难,医治创伤,并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950年4月1日,宋庆龄在罗叔章陪同下,带病离沪赴北京,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00页。



### （三）参与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从1949年到1952年，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先后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各种民主运动，恢复了国民经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根本大法，已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1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二十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决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宋庆龄等32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

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在制定宪法草案期间，宋庆龄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积极地参加到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工作中去。虽然她的国务活动非常繁忙，但她仍千方百计抽时间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她阅读并研究了许多中外有关制宪的书籍和文件，如：《苏维埃宪法及其发展史》、《宪法的概念与本质》、《苏联宪法通论》、《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1954年3月23日，宋庆龄出席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接受这个初稿作为起草宪法的基础，并决定在二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起草初稿的讨论和修正，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以后几个月里，宋庆龄一直在北京参与宪法草案的讨论和修改工作。当时“她正患骨折，但每天仍要用许多小时看文件材料。”<sup>①</sup> 为了广泛征求各方人士对宪法初稿的意见，草案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组织展开讨论，历时二个多月，参加人数

<sup>①</sup>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000多人,提出了修改意见600条,宋庆龄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对这些意见仔细斟酌后再对宪法草案进行修改。6月11日宋庆龄出席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委员们一起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交《关于宪法起草委员工作经过的报告》的讨论情况报告,并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

6月14日,宋庆龄又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三十次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宪法草案公布后,交与全国人民讨论。在这次会上宋庆龄作了发言,她激动地说:“自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就得到了独立和民主。我们有共同纲领作为共同奋斗的目标。现在通过我们国家四年多的事实,总结各方面的宝贵经验来制定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宪法,这是空前的、伟大的、非常光荣的一件大事。”<sup>①</sup>她自豪地指出:“我们这个宪法,将昭示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知道我们国内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大家庭;使他们知道我们对外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她以亲身参加制定宪法的经历体会指出,这部宪法是一部贯穿民主精神的社会主义宪法。她说我们这个宪法,“是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制度。况且每一字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每一条文都通过事实考验,我们的宪法将成为每一个公民自己的公约般的条文。”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力量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一切剥削和贫困。而宪法更将保证把我们国家建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sup>②</sup>在发言中,宋庆龄还就这部宪法草案中对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权利一项表示了由衷赞许,她称这是新中国的新事情。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6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6页。

姻等问题<sup>①</sup>。宋庆龄对大家反映的生产管理上有浪费现象,机构庞大造成劳动力浪费,以及希望增加学习机会等问题,表示“一定要把大家的要求忠实地向上面反映”<sup>②</sup>。工人们激动地说:“宋副委员长亲自到我们工厂里来问我们工人有啥意见,她真是我们人民的代表。”6月1日和2日,宋庆龄还到公私合营仁德纱厂视察工作,宋庆龄了解了公私合营前后的情况,以及劳资关系等。临行前,宋庆龄说:希望你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依靠工人群众搞好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努力<sup>③</sup>。6月11日,宋庆龄又前往江苏省松江专区视察工作,着重视察了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宋庆龄同联民农业合作社的干部以及社员进行了座谈,她详细了解了这个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过程和生产情况,中农参加合作社时有何思想顾虑,社内经济利益的处理,新式农具的推广,合作社如何帮助周围的新社、互助组和单干户,青年团员在合作社内的作用;妇女参加生产后家庭地位的变化以及统购统销和“三定”政策的执行情况。她还征求了农民对政府的意见与要求。座谈后,她巡视了田地、水渠和副业生产,在泥泞的地里来回步行十余里。她还访问了社员家庭,临行时,她对社员说:“希望你们努力生产,争取更美好的生活,为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树立榜样。”回到上海,宋庆龄又对几家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就视察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sup>④</sup>。

同年7月,宋庆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她听取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等。在

① 《解放日报》,1955年5月30日。

② 《解放日报》,1981年6月5日。

③ 《解放日报》,1955年6月16日。

④ 《解放日报》,1955年6月14日。

会上,宋庆龄作了题为《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的发言。她肯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人民用创造性的劳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是关系着我国六亿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的计划,也是我们将会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通过,无疑地将在我们全国人民中间掀起普遍高涨的劳动热情,”同时“也将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热切关注和欢迎。”她还就会前视察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增产节约运动展开中应注意的问题,是要防止满足于已有成绩的心理。应该克服的浪费和可以发掘的潜力,还是很多的。”农村中,应该重视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加强工农联盟教育。在发言中,宋庆龄还就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作了明确的阐述,她说:“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应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分清轻重缓急,根据可能的条件,来适当地解决人民的需要。”<sup>①</sup>可以看出宋庆龄的建议是非常现实和深刻的,其中一些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1955年12月中旬,宋庆龄在访问印度前夕对云南省进行了考察,一个月前,她刚参加了人大常委会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工作,不久,她就来到云南,视察了晋宁县上蒜乡的李能农业生产合作社,少数民族的阿拉乡,云南纸烟厂,昆明市珠玑街的街道工作,竹器和五金等手工业合作社,省人民委员会的保育院以及黄土坡军区保育院等单位,向大家征求对政府的意见与要求。宋庆龄就此写了《视察云南省工作的报告》。报告中,她肯定了云南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成绩,从视察的情况看,宋庆龄认为毛泽东所预言的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确实已经到来。同时她又针对所了解的情况认为,云南是具有优良自然条件的好地方,但是云南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技术水平较低,她建议:“云南除了可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20~123页。

以发展粮食的生产以外,还可以大大地发展经济作物,如烤烟、甘蔗、木棉、咖啡、麻、香蕉、蚕桑等。因此,如何贯彻执行发展云南交通的计划,特别是修通昆明的铁路计划,和大力提高技术,发展与农业相适应的工业,是发展云南经济的重要条件。”<sup>①</sup>此外,她还强调了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云南,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建议中央在这项工作上应当予以更多的帮助。针对云南卫生工作远远跟不上人民生活需要的实际情况,提出这是一个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呼吁加强卫生工作和大力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工作。宋庆龄的这些建议源于她对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对中央了解地方的情况具有很大的帮助,也为制定国家全面发展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怀着对人民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推心置腹。虽然她是党外人士,但是几十年的风雨同舟,中国共产党已把她看成是真正的同志。中共中央除了请她参加重要会议和国事活动外,有重大的事情都要征求她的意见与她交换看法。宋庆龄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制定新中国社会发展计划的工作中去,她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她不仅具有远见和才能,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而且还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高尚的情操。因此她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广泛尊敬与信任。

## 二、擘划中国现代化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铲除封建专制制度,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现代化强国,使中国以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宋庆龄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后,矢志不移、毕生奋斗的根本目标。早在1927年宋庆龄就指出:“中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88页。

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sup>①</sup>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宋庆龄期望和追求的“新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宋庆龄感到由衷地高兴,并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领导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渐形成了其被历史证明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知灼见。

#### (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宋庆龄认为: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继承的社会,在生活、工作方面,都不合时宜,和人类的进展有着一段距离。”<sup>②</sup>只有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中国革命才算真正完成。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经济建设是关键。早在建国前夕,她就指出:“发展生产是当前政策的基点”<sup>③</sup>。建国后,宋庆龄又指出:“现在全国大陆差不多已完全解放,今后应积极推动生产建设了。”<sup>④</sup>她认为,全国解放后,中国主要的革命任务,“是在改变我们的经济”<sup>⑤</sup>。宋庆龄虽然没有正式使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词语,但从她此后经常强调必须“全力进行生产”<sup>⑥</sup>,中国“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就是迅速发展我们的国民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7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1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40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09页。

经济,首先是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以及消除殖民主义造成的经济上的停滞落后的状况,以使我国人民能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享受幸福生活”<sup>①</sup>等有关发展经济的论述,完全表明,宋庆龄认为,中国要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经济建设中,宋庆龄认为,要“有步骤地把我国从农业国改变为工业国”,首先“必须发展现代工业”<sup>②</sup>,实现工业化,彻底改变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状况,建立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早在1949年12月宋庆龄就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落后的国家工业化起来。没有这一个条件,无论我们整个民族或者我们妇女,都不能挣脱外国帝国主义或者本国封建制度的枷锁。”<sup>③</sup>她认为:“为了结束我们城市和乡村中的落后情况,我们必须发展现代工业。没有工业化,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就不能提高,而且,民族独立的确也不能获得保证。”<sup>④</sup>因此,“工业化对中国来说,其重要性犹如心脏对人一样。”<sup>⑤</sup>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核心就是国家工业化。宋庆龄闻之,高兴地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有计划地实现工业化的阶段,以使我们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更向前进。孙中山以他一生中四十年的时间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今天在中国已经取得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0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8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3页。

了胜利。这一胜利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新时代里、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以使中国从任何意义上说来,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sup>①</sup> 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宋庆龄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以后长期奋斗的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她表示深深地赞同。与此同时,宋庆龄又根据自己对国情、世情的认识,对中国工业化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她说:“完成这一艰巨复杂任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重工业。”“随着工业有能力供应先进农机具,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将逐步提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工业上和农业上进一步发展的手段。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并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工业上的强大力量,以捍卫我们的新生活,这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必需的。”<sup>②</sup>

宋庆龄还认为,在经济建设中,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的主要作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sup>③</sup> 她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人民民主,要繁荣富强,并有足以保卫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么旧社会里需要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农民的生活。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压迫农民的基础上的。正是封建制度,造成缺口,使得帝国主义乘虚而入,驱使我们走向贫困和落后。”<sup>④</sup> 她认为:“土地改革就是要解放潜在的才能和创造性,使得农业生产品自给自足,为工业化准备基础。这曾是孙中山的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纲领。……这是中国贫穷的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sup>⑤</sup> 为此,宋庆龄对新中国的土改运动极其关心,亲自赴东北作了认真的考察。土地改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2~3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6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65页。



革取得伟大胜利后,宋庆龄非常高兴,她说:“大体上,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我国内,已经是‘耕者有其田’了。”<sup>①</sup>不久,宋庆龄发现,中国虽然经过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但中国的农业仍然处于分散、原始的状态,解决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提高生产力,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她指出:必须“以全副力量促使农业现代化,并使它得到高度的发展”<sup>②</sup>。并对工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有了认识,认为工业化可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先进的生产资料,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反过来,农业的逐步现代化,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生产必须的各种原料,“为工业化准备基础。”<sup>③</sup>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等重要,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宋庆龄认为,在经济建设中,要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是至关重要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她将科学技术与现代化工业、农业列入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sup>④</sup>。早在1953年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宋庆龄就在致全体儿童保育工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的同志们的公开信中提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时期已经开始了。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你们所培育和教导的儿童,不久就将贡献出他们的劳动和创造。……儿童工作者更要努力提高自己改进工作,不仅要学习新的技术,还必须创造新的技术,我觉得这件工作是我们未来生命的血液,现在是掌握在适当的人员手里了”<sup>⑤</sup>。1955年1月,宋庆龄指出:“我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工业必须转变为独立自主、生产多样化机械化的工业,为数少得可怜的技术人员必须增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6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6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66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1页。

多。”<sup>①</sup> 1956年8月,宋庆龄又指出:“在国内,我们面对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我们的落后状态,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这是一个取得经济独立使我们不再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人员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重新建设我们的国民经济,这种工业化要由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掌管并且充分利用我们丰富的潜力。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主要是发展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对我们民族的生存是有决定性意义的。”<sup>②</sup> “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后期,也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我们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就一定要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不断提高文化的素养。”<sup>③</sup> “不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不学好本领,那么社会主义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远景始终是远景,成不了现实。”<sup>④</sup>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遭受了曲折,“直到现在,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也还没有完全改变”<sup>⑤</sup>,宋庆龄认为这是我们在建设中没有将科学技术提到重要的地位。她认为:“不要以为一个人只要有勇气就能从事劳动生产,现代化的生产越来越需要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不然的话,怎么能操纵复杂的机器?怎么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怎么能攀登科学文化高峰?怎么能改造自然,征服宇宙?劳动人民不但要做政治上的主人,还必须做文化上的主人。……用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知识武装你们的头脑,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你们的头脑,立志做文化的主人,做自然的主人,做宇宙的主人”<sup>⑥</sup>。宋庆龄虽然没有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她的一系列论述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充分显示了宋庆龄

---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7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1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6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34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6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67页。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认识的深刻性和独到性。

## (二)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它建立之初,就将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奋斗的最终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得到了苏联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1950年2月与中国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国际上对中国予以重要支持。与此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还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对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国初期中国只有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关于建国初期在外交事务上“一面倒”的政策,宋庆龄认为:“世界上许多事件已经证明,而且还在每天证明,这是进步国家所能倒向的唯一的一面。因为当前只有两者可选择:一面是苏联;另一面则是主要地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由于我们和两面都有过来往,通过他们的外交政策,我们很快地看到了,他们之间是白昼与黑夜那样地不同。”<sup>①</sup> 对于建国初期苏联在向中国提供多方面的援助,宋庆龄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她说:“‘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现在,有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苏两大国家的人民的团结合作,全人类解放的希望就更加接近实现了。”<sup>②</sup> 宋庆龄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要在薄弱的技术基础上建设起来,就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援助。”<sup>③</sup> 而伟大邻邦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是我国人民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苏联的援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中国的工业化起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由此也在经济建设中基本照搬了苏联模式。这些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0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4页。

模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

宋庆龄赞成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她说:“今天当我们正在复兴我们的国家并按照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而逐步前进的时候,我们更要勤勤恳恳地来学习这些宝贵的经验。……苏联确实实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关于这一点,经过五年来的丰富的经验,在极大多数人们的心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苏联人民把他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改变成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所作的胜利斗争的全部结论告诉了我们,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其价值是难以估计的。”<sup>①</sup>但她对学习苏联建设经验采用教条主义的方式、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模式,是反对的。早在“一五”计划建设初期的1954年,宋庆龄就说:“在学习中还要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建设的实践中,在把苏联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时,我们不断地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领导思想上的重要性。苏联的经验加上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教导人们去抓住问题的关键,帮助他们去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并鼓励他们去克服各式各样的困难。”<sup>②</sup>宋庆龄的观点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宋庆龄只能用含蓄的方式提出她的观点。后来,宋庆龄就明确指出:“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任何教训都不能盲目地搬用”<sup>③</sup>,并深刻地揭示了苏联模式的弊病。她说:“在苏联,农业和轻工业经常发生危机,重工业受到重视但却是孤立的,工农之间的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政策,“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小型工业,强调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实现扎扎实实的高速度工业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0、6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15页。

化”，是“完全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的”<sup>①</sup>。这些论述表明，宋庆龄已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不可以简单地仿效别国的模式，而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中”产生出“各项政策”<sup>②</sup>。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胜利地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1981年2月，88岁高龄的宋庆龄回顾总结了她一生的革命经历，认识集中到一点，就是“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sup>③</sup>“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个光辉的思想，无疑地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 （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宋庆龄早在与孙中山共同探索中国革命和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就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强大的动力。在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迅速果断地将工作的重心由军事转向经济建设，顶住了国内外的种种压力，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3年中国共产党制订和实施了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同时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酝酿后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了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也已大都提前完成。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短短的几年内取得了一系列的世人瞩目的成绩，宋庆龄不由感慨万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33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6页。

千,她在《五年以前和现在》中说:“我国人民正在建设的今天,其美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他们正在建设中的未来,其美好又是今天所不能衡量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中平等的一员,这正是中国无数革命者和先烈在屈辱的、受殖民主义压迫的漫长年代里所梦寐以求的。”<sup>①</sup>她在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纪念日撰写的《回忆孙中山》一文中欣慰地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变而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不仅把孙中山奋斗一生的理想变成现实,而且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理想”<sup>②</sup>。宋庆龄认识到:“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情况,只有共产党在行动上最勇敢、最坚决。它把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在坚持实践中运用到中国革命中。正如事实所一再证明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打败国内外敌人所必不可少的阶级决心。”<sup>③</sup>宋庆龄由此坚信:“没有共产党,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成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我们就连社会主义的希望也没有了”<sup>④</sup>,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57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泛听取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意见,以便克服缺点,发扬成绩,争取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党内外各界人士积极响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放肆进攻。面对这种情况,宋庆龄撰写文章,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她诚恳地说:“从我三十余年革命工作的经验中,我对中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269~270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262~263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282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282 页。

代化强国,还有一段艰难曲折的路,还要艰苦奋斗几十年。这就要求你们这一代人有远大理想,有革命志气,继承革命传统。……你们应该成长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长为对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对人类的前途做出贡献的人”。<sup>①</sup> 宋庆龄表示:“今天,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我衷心地祝愿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辉煌的前程。我将非常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并肩前进在这伟大而英雄的行列中。”<sup>②</sup>

### 三、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殷切关注着中国的统一。她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就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作了全面、精辟的论述。晚年,她热切盼望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在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宋庆龄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 (一) 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1950年9月,宋庆龄在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博西克博士信中,重申“我们政府提出的要求执委会驱逐国民党代表”,强调指出:“国民党的代表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代表不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代表着四亿五千万人民。”<sup>③</sup> 1954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她又一次指出:“我们认为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取得合法地位的美帝国主义领导集团的政策,是完全没有根据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8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90~59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58页。

的。”<sup>①</sup>

在美国的庇护、扶植和支持下,退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继续打着所谓“中华民国”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宋庆龄在1955年发表《只有一个中国!》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中国人民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的中国。在近代史上,这是第一个真正拥有主权的中国。它充分体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意志和愿望。”<sup>②</sup>在这篇文章中,宋庆龄首先回顾了历史,分析了把中国分裂成几部分的主张的根源,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干预中国国家生活时惯用的手法。事实上,这也是他们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主要方法。臭名昭著的‘势力范围’,就是这种分裂政策的具体结果。”<sup>③</sup>“他们的目标是继续使我国人民成为各种外国侵略势力集团——它们相互争夺并与各自的中国傀儡相勾结——的宰割对象。”<sup>④</sup>其次,揭示了“两个中国”主张的实质。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仍然梦想恢复在中国已失去的统治地位,“尽管国民党残余匪帮只不过是一具残缺不全的僵尸,但这是他们唯一可利用的力量。它在台湾被支撑起来并在全世界被作为美国的‘盟邦’展示出来。它出面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以使它在世人的心目中代表‘合法的’中国”,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这是“在侵略战争、军事骚扰和颠覆阴谋都未能搞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个陈旧的分裂战术又被端了出来”,“只不过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遭受着的帝国主义干涉的翻版”,其要害是“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强国从中国分裂出去一部分领土,并为了自己的目的,试图把它变成一个政治实体”,“制造‘第二个’中国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基地,以便从多方面再

---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4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4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46页。



度向中国人民发起进攻”，“这就是‘两个中国’主张的实质。”<sup>①</sup>最后，宋庆龄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停火”、“中立化”、“托管”、“公民投票”等谬论，指出这些鼓吹“两个中国”的论调“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严正宣告：“中国绝不容忍对其内政进行如此粗暴的干涉。这已不是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它在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是无所畏惧的。”“台湾和中国其他领土不能被任意装扮成‘第二个’中国。它们必须再一次地并永久地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中来，在全体中国人民建设幸福富裕生活的过程中，作出贡献并得到福祉。”<sup>②</sup>

自1950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须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sup>③</sup>以来，“台湾地位未定论”成为美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借口。美国的侵略行径和荒谬论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既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也为近代重要的国际协定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肯定。宋庆龄多次指出：“全世界一切公正舆论都肯定地承认，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sup>④</sup>“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好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如此，这一点已为今天世界上一切明白是非的国家所承认。”<sup>⑤</sup>宋庆龄代表中国人民发出了正义的声音：“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无权干涉”<sup>⑥</sup>，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过去必须从国民党的暴政和腐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4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51、154页。

③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第4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30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8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30页。

化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我们祖国的任何其他地方并没有甚么不同。它的解放纯粹是一个内政问题,并不牵涉到超出我们的领土完整和完成我们对中国革命责任以外的问题。它将照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来解决,因为我们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sup>①</sup> 宋庆龄在1955年撰写的《只有一个中国!》一文中,进一步揭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的霸权主义和强盗逻辑。她指出:台湾和其他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能证明它们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真是太多了。因此,当中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有权解放这些领土时,美国政府就试图否认这一权利,并使之和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对立起来。‘侵略’的叫喊甚嚣尘上。”对此,宋庆龄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要侵略他们自己!”,“这种肆意扭曲的逻辑,是一点也站不住脚的”<sup>②</sup>。美国政府还不惜进行原子战争,以此来威胁世界人民。“美国官方发言人力图说成他们有‘权’采取这种行动,声称:‘我们必须防止台湾落入敌人手中,因为这将威胁我国的安全’。(!)”<sup>③</sup> 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居然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说,如果合法所有者试图从非法武装占领者手中收复失地,就是‘侵略’,就是‘战争行为’。这就是说,强占距本国海岸八千英里,而距合法所有者只有五至一百英里的地方是‘和平行为’,是保卫他们的‘国家安全’。换句话说,美国统治集团试图把他们一手造成的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人民。”<sup>④</sup> 深刻揭露和驳斥了美国统治集团的蛮横无理的霸权主义和强盗逻辑。

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以军事力量霸占我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并以台湾为针对我国大陆心脏的军事基地,对我国沿海进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8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48、14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4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49页。

行不可容忍的海盗行为和袭击行动,制造远东的紧张局势,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和平建设,严重威胁世界和平。

宋庆龄严正指出:“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直接侵略行为,特别是对我国领土台湾的继续侵占以及对我国人民公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军事财政援助,是和维持远东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务不相容的。”<sup>①</sup>“美国不仅违背了她本身也是签字国的各种国际条约——这些条约规定出中国对台湾的合法地位,而且它还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他们自己的领土。事实上,美国所作的这种罪恶的行动,乃是发动新战争的前奏曲。”<sup>②</sup>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他们阻碍朝鲜问题的解决;他们从事于用武力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这一最富有挑衅性的勾当,并无耻地在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签订了一连串完全是为了侵略目的的军事性的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着一个全面的战争。”<sup>③</sup>

宋庆龄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统一是远东和世界和平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她说:“对中国来说,最当前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如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要得到保证,必须制止在我国沿海进行的不可容忍的海盗行为和袭击行动。中国人民已经宣布,我们一定担负起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那个苦难的岛屿上的同胞以结束这个对和平的威胁。”<sup>④</sup>对于帝国主义报纸和电台诬蔑中国不愿意和平共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西方某些人士的思想混乱,宋庆龄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我们的领土台湾和其他岛屿的决心和我们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义愤竟会在西方某些人士中间引起惊讶和不安,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我们必须对这些人说:朋友,不要从中国身上找远东紧张局势的根源;我们绝对不威胁任何人!根源在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9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85页。

于公开侵略中国并且正在准备更大的侵略,同时把其他亚洲民族和国家视为奴隶的美帝国主义!”<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以来,宋庆龄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深刻阐述党和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方法。她多次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解放台湾完全是一个内政问题。”<sup>②</sup>“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它纯属中国的内政。那里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中国境内的事,它只涉及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残余的关系问题,而对任何其他国家或人民的事务则毫不相干。”<sup>③</sup>“台湾问题必须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以及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利益来解决,并且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加以解决。”<sup>④</sup>采用何种方式,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安排。

建国初期,解放台湾,歼灭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势力,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宋庆龄在1950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我们决心全力支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使它能尽速完成解放战争,把帝国主义永远赶出中国,并消灭封建势力的最后残余。为把台湾交还给它的合法主人——中国人民——而放射的每颗子弹,为解放西藏而采取的每个步骤,都意味着加强世界的安全。因为,只有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人民才能以全部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于国家的重建。因此,这种武装斗争的结果是有利于和平的。”<sup>⑤</sup>

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并确立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宋庆龄指出:“由于美国霸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和阻挠我国解放沿海岛屿,严重地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6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1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5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5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51~552页。

一贯的主张,没有别的要求。”<sup>①</sup>

二是向台湾当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1955年4月,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期间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他说:“如果美军撤退,我们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sup>②</sup> 宋庆龄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做了许多工作。她号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于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欢迎他们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sup>③</sup> 她还动员海外侨胞为和平解放台湾多做贡献,指出:“国外华侨一向都是热爱祖国的”,“爱国是一家,大家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不分迟早,早爱国的不应歧视晚爱国的。祖国是大家的,大家都有义务,也有权利爱国。我们应该作到使所有的华侨全体都团结在爱国的旗帜下。我恳切期望在座的诸位,将这种精神传达到全体侨胞,共同作好这个工作,这样就是对祖国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做出了贡献。”<sup>④</sup> 她深情地表示:“我们希望我国全体人民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和睦相处”<sup>⑤</sup>。

## (二) 热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的壮大,中美两国关系逐步出现解冻的形势。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77、478页。

②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第6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0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08、20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17页。

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sup>①</sup> 1978年12月,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sup>②</sup>。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宋庆龄是很高兴的。1979年6月2日,宋庆龄在北京致信索尔兹伯里说:“我知道你对我们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你为此曾作出了如此艰巨的努力——一定非常高兴。我十分希望你在今年10月份能在这里同我们一道欢呼畅饮。”<sup>③</sup>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sup>④</sup> 公报第一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来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在此之前,1978年10月和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和缅

<sup>①</sup>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第249~250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第250页。

<sup>③</sup>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58页。

<sup>④</sup>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妇女,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她以副委员长的身份,表示完全赞成<sup>①</sup>。

3月29日,宋庆龄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国际儿童年,我们支持和赞助联合国的这一决议。在国内,我们要开展活动,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事业,在此,我向台湾的儿童工作者致以热烈的问候,我们热切关怀台湾的儿童,我们要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统一祖国而努力。”<sup>②</sup>

1979年9月,新中国建国30周年前夕,宋庆龄发表重要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她恳切地说:“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三十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今天,不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来完成这项伟大事业。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做出应有的贡献。”<sup>③</sup>

1980年1月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新年茶话会,共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佳节。邓颖超在会上发表对台政策的讲话,讲到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在国内外得到各方面的积极响应,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烈拥护《告台湾同胞书》中所宣告的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的爱国统一战线,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活动和努力。宋庆龄表示特别高兴。当她听到邓小平提出,我们满怀信心地跨入了八十年代,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在四个现代化建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149~150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71页。

<sup>③</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90页。

设中作出显著成绩,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始终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时,她兴奋地和全体同志热烈鼓掌<sup>①</sup>。

3月5日,宋庆龄主持首都各界人士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并致词,指出蔡元培的精神“对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也会起积极的作用。”<sup>②</sup>

3月8日,宋庆龄出席全国妇联举行的三八妇女节联欢会,在致词中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我们更加深切怀念台湾的姐妹们。我们愿寄语台湾的姐妹,热切盼望你们回来探亲访友,共叙骨肉之情,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sup>③</sup>

10月7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通过《关于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决定》,宋庆龄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这一革命,也是为了向台湾当局呼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此她是完全赞成的<sup>④</sup>。

同月,宋庆龄为《中国建设》增出中文版作祝词,指出:“希望《中国建设》中文版将为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消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让我们更紧密地携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统一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sup>⑤</sup>

1981年,在宋庆龄病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怀念在海外的亲属,通过同海外亲属的联系,来促进祖国的统一。据邹韬奋夫人沈粹缜(曾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在宋庆龄最后的日子一直陪伴着)回忆:“她断断续续地和我谈了很多。有一次她对我说:‘我牵

① 《宋庆龄纪念集》,第15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97页。

③ 《宋庆龄纪念集》,第150~151页。

④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49页。

⑤ 尚明轩等:《宋庆龄年谱》,第3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由宋庆龄出面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刊物,不是临时的决定,也不是突然的动议,而是两位伟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换意见和酝酿之后达成的共识。其中稍有发展的是,宋庆龄最初从救济福利角度开展国际宣传,而周恩来从对外宣传介绍新中国的更高的角度,委宋庆龄以重任。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着手筹办一个新的对外宣传刊物,虽然是以人民团体——中国福利会为出版单位,但实际上却是一份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刊物。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宋庆龄立即着手筹办这份刊物。1951年1月21日,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住宅会见了刚从美国回国的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商谈办刊事宜。宋庆龄委托陈翰笙去上海,与富有国际宣传经验的金仲华一起参与该刊物的筹备工作。宋庆龄还通过在美国的朋友邀请正在美国的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返回中国参加办刊。1951年6月,宋庆龄选定了刊物的名称为 CHINA RECONSTRUCTS,中文刊名为《中国建设》。这个刊名,不仅表明其宗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同时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因为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曾经办过的一个刊物,就命名为《建设》。同年8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召开了一次《中国建设》筹备工作会议,就《中国建设》的编辑方针、读者对象和报道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世界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这本双月刊将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为突出这本刊物的民间特色,这次会议还规定:“一般不刊载文件和政治报告的原文、理论、政治和军事文章。”要求做到:“内容充实,文章通俗”,有“配合文章

和特写的插图和单独的摄影图片”而且“文章一般都署名”<sup>①</sup>。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以她丰富的对外宣传经验,为这本刊物指明了发展方向。

《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初期,设立了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编辑委员会,金仲华担任主任,陈翰笙担任副主任。下设业务部和编辑部,业务部设在上海,负责印刷出版及发行业务。编辑部设在北京,负责采编及翻译业务。

1952年1月,《中国建设》第1期正式出版,为英文双月刊。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是一些农民扛着农具走向他们在土改中刚刚分得的土地,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革。封底是一幅动人的木刻,工人们正在重建鞍钢。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它将用权威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照片、插图和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文章。《中国建设》最初的读者,正是通过这本杂志的报道,了解到当时正在努力医治战争创伤、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开始建设新生活的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中国建设》第1期印刷1万册,向国内外发行。宋庆龄在收阅样刊后,即写信给金仲华,感谢大家的努力并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希望“我们所做的以及今后要做的努力将使我们的杂志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增进和平的强有力的杂志。”<sup>②</sup> 1952年2月15日,宋庆龄在致吉洪诺夫的信中指出,《中国建设》“在宣传中国人民建设自己新生活的同时,也表明我们对和平与合作的强烈愿望以及我们保卫和平和我们的成就的决心。”<sup>③</sup> 这进一步表明了她的办

① 《真实报道的传统》,第5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77页。

③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38页。

刊宗旨。

《中国建设》创刊后,在宋庆龄的亲自领导下,在周恩来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下,迅速成长起来。1953年,业务部从上海迁到北京,改在北京印刷。工作人员也大部分集中到北京办公,组成了杂志社。机构和人员充实后,《中国建设》于1955年1月改为月刊。

## (二) 坚持真实报道的传统,关心指导《中国建设》的发展

宋庆龄一贯强调《中国建设》要保持和发扬“真实报道的传统”,她对文章的要求很严格,在任何时候她都反对只报道成绩回避问题。如在1958年,国内盛行“浮夸风”的时候,她看了编辑部准备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福利事业的文章后,特意写信提出了意见:“稿件昨晚收到。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虽然我们有了很多进展,但目前还不能满足我们需要的一切。第四页上讲到了这一点,但可以讲得更清楚些,因为从这里到文章结尾给人一种印象,好象现在我们可以解决每个人的困难,而且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情况。”<sup>①</sup>这个意见充分体现了宋庆龄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纪念《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之际,宋庆龄以《真实报道的传统》为题,给杂志撰写了一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她在文中系统地回顾和阐述了办刊的宗旨和原则。指出:“在1952年,中国福利会开始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来继承并发扬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所建立的、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这个刊物从创刊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描述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回顾过去的10年,“我们保持了真实报

<sup>①</sup> 《真实报道的传统》,第27页。

道的传统。”展望未来,她明确表示:“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sup>①</sup>《中国建设》在宋庆龄的具体指导下,始终保持了它特有的“真实报导”的传统,以新鲜、活泼、生动的文体来描述中国人民平凡而伟大的劳动,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我国政府的各项政策。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阅读《中国建设》杂志后说:“《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sup>②</sup>

宋庆龄要求《中国建设》必须形成和保持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并适应外国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创刊后不久,她在给第一任社长金仲华的信中就提醒杂志社的工作人员,这本杂志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这本杂志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情中国、要求和平、政治上并不进步的人士。1958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编辑部提出拟在本刊多加一些关于政治斗争的内容,宋庆龄复信说:“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但必须表现我们自己的风格。以免和《北京周报》雷同。”<sup>③</sup>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对宋庆龄所提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这一点特别注意,并指出:《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等没有多大区别,反而不好<sup>④</sup>。在宋庆龄和周恩来的共同关心指导下,这本杂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保持真实报道的传统,用事实说话,文章通俗,图文并茂,反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增加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

宋庆龄十分关心杂志的质量,尽管国事繁忙,她还是抽出时间审阅一些重要稿件,细心阅读新出版的杂志,多次给杂志社负责人写信指导工作。1959年11月,宋庆龄和金仲华在谈到《中国建设》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77~379页。

② 《真实报道的传统》,第10页。

③ 《真实报道的传统》,第7页。

④ 《真实报道的传统》,第9页。

的工作时说:除工农业经济建设的文章外,文化艺术方面也要注意,使刊物内容能显得百花齐放,丰富多彩。1960年1月,她看到当期的杂志后,马上写信说:“我很喜欢第一期的杂志,从头到底都很生动有趣,而且效果一定会很好。我特别喜欢这期的封面。整本杂志的编排比前几期有进步,在这方面当然还存在重要改进之处,但就这一期来说,编得很好。”关于杂志的政治内容问题,宋庆龄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也表达我们对他们人民,特别是邻居的友好。我们杂志的口气可以缓和一些,但可以而且必须把事实说清楚,使问题可以明确起来,而国家之间友好的真正基础得以维持。我觉得我们已经是这样做了,今后应该继续贯彻这个方针。”<sup>①</sup> 1960年11月,宋庆龄在给鲁平的信中,对1960年各期《中国建设》提出了她自己的意见,肯定了这一年“我们杂志的内容是恰当和及时的。……今年的内容要比过去更为有力和敏感。……杂志的设计在更大胆放手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同时也明确指出:“在设计出版方面,特别是图片印刷和美术工作,肯定还有改进的余地。”<sup>②</sup>

发行工作是对外刊物工作重要环节,宋庆龄对此非常重视。创刊之初,她在给金中华和陈翰笙的信中都提到要注意杂志的促销发行工作,信中指出:“必须仔细考虑在宣传促销领域我们做什么,如何去做。……我们是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能和可以利用的方法来开展工作。”<sup>③</sup> 在谈到杂志进入美国碰到不少困难时,宋庆龄坚定地表示:“我们并没有放弃努力”<sup>④</sup>。宋庆龄还专门写信邀请国际友人耿丽淑负责杂志的对外销售,她甚至关心到杂志发行量和订户的情况。1956年宋庆龄准

① 《真实报道的传统》,第12页。

② 《真实报道的传统》,第14、15页。

③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46页。

④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57、358页。

备出访印度时,特地写信询问编辑部在扩大杂志发行方面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助。到达印度后,她抽空征求印度朋友对《中国建设》的意见,亲自作扩大发行的工作。30年来,每期《中国建设》出版后,宋庆龄都要亲自寄出几十本,以“林泰”的名义发给国外的老朋友们,以扩大杂志的影响。1981年初夏,当远在德国的老朋友王安娜收到宋庆龄寄给她的最后一期杂志时,宋庆龄已经逝世了,杂志是她在病中嘱托工作人员寄出的。

《中国建设》卓有成效的发行工作,使更多的海外读者看到了这本杂志,并通过它了解到新中国建设的真实情况,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许多外国读者在阅读了《中国建设》之后,纷纷给编辑部来信,他们当中有的这样写道:“杂志改变了我以前由于你们国家多年来与世隔绝而产生的印象。”“你们的杂志办得很好,是向世界打开的一个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当前的政策。”<sup>①</sup>

晚年的宋庆龄,虽然体弱多病,但她仍然关心着《中国建设》的事业发展。1980年10月,当《中国建设》又一个新的版本——中文版创刊时,她高兴地在创刊号上亲笔签名题词。1981年3月12日,宋庆龄已89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了,但她还是给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答谢大家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十六年致她的慰问。信中她以一贯的至诚和谦逊的态度写道:“病了两月余,尚未全愈。恕我勉强执笔,不能多写。”但她在信中仍然提到“希望此版的订户日增,成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欢喜阅读的刊物”<sup>②</sup>。这是宋庆龄写给《中国建设》编辑部的最后一封信。

### (三) 亲自为《中国建设》撰写文章,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宋庆龄既是《中国建设》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同时又是《中国建设》最有威望和最丰产的一位作者。自1952年创刊号起,直到

<sup>①</sup> 《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第74页,《中国建设》杂志社。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7页。

1981年她逝世前4个月,她为《中国建设》撰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包括介绍新中国建设成就、论述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重要性、发展各国人民之间友谊、保卫世界和平等。从这些题材,可以看出其涉及面之广,反映了宋庆龄对一系列国内、国际事务和问题的见解。在《中国建设》上刊登的许多阐述一个历史阶段或一个重大问题的文章,大多出自宋庆龄之手笔。这些深受读者赞赏的文章,成为《中国建设》一大特色,大大提高了这本刊物在海内外的声誉。

《中国建设》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宋庆龄撰写的《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她在文中向世界人民阐述了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宋庆龄认为保卫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最大福利事业,指出“世界和平与福利事业有着直接的关联。两者是相辅而行的,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也可以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危害。”建国初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标志着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先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现了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现公费医疗制度,使广大职工在旧中国无法解决的因生老病死等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得到一定的解决。宋庆龄在文中指出:“去年,福利事业在新中国所表现的空前进步,反映了我们对于和平的热切愿望。”“劳动保险已经第一次成为我们国家的立法。”“儿童保育、医疗、工人的住宅和工人区的现代设备,以及各种各样的农村福利工作都在举办之中,使我们亲眼看到了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这种进步只能从一个珍视和平并维护国际间和平关系的政策中产生出来的。”<sup>①</sup>

1952年3月,宋庆龄为《中国建设》撰写了《〈中国建设〉致读者》,指出:“《中国建设》的名称正说明了它的内容在于报导解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变化。”宋庆龄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医疗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73页。

卫生防疫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也是伟大建设运动的一部分成果”，“这些成就不但为中国人民而且为全世界人民的卫生福利事业完成了一桩历史任务。”宋庆龄在文章中还谴责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及所带来的灾难，揭露与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罪恶行径。她指出：“中国人民并不惧怕现在加在他们身上的恶毒攻击。正如他们排除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馑疫病一样，他们正在预防着人为的疫病。为了击溃阻碍他们进步的那些武装干涉，中国人民创造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坚强的国防力量，为了击破强加在他们国家领土上经济封锁的企图，中国人民依靠了他们自己丰富的资源和与其他国家在友好平等基础上进行贸易的方法，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面貌。为了粉碎细菌战，中国人民在医务卫生方面正在走向新的水平。”<sup>①</sup>

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际，宋庆龄以《五年以前和现在》为题在《中国建设》杂志发表专文，集中向国外介绍了自1952年以来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及我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从那时以来，中国的确发生了伟大的变化。”她告诉世界人民：目前的中国“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全国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高潮，千百万人成为有文化的人。学校成倍增长。艺术正在向前发展。医药卫生设备扩大了。尽管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的人民现在比以前吃的更好，穿的更好，学习提高，思想提高了。”回顾五年来的变化，宋庆龄感到自豪和兴奋，“如果说我们赢得了其他国家对我们的重视，这是因为我们人民努力的结果。我国人民正在建设的今天，其美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他们正在建设中的未来，其美好又是今天所不能衡量的。”宋庆龄向世界人民表明：“我们正集中力量为国内最大多数的人民谋求最大的幸福。这一点同我国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第303、306页，中华书局印行。



奉行的外交政策一样,也表明我们是爱和平的。”<sup>①</sup>

1965年年底,我国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面胜利完成,工农业都超额完成了计划,纠正和克服了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宋庆龄对1949年至1965年底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在她看来,这十六年来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一点也不使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之逊色”<sup>②</sup>。1965年12月,宋庆龄发表了她的重要文章《解放十六年》。她高兴地写道:“旧中国已经变成了新中国。一个经常遭受疾病、饥荒和水灾摧残的贫困落后的国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正在战胜自然、以坚定的步伐走向繁荣、生气勃勃的中国。”“从1959年到1961年,我们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现在我国经济和我们人民在度过了这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我们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的。”“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挠我们继续朝着我们的目标迅速前进——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先进工业、先进农业、先进科学文化和巩固的国防的国家。”<sup>③</sup>

1976年“文革”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了,但她仍然非常忙碌,继续孜孜不倦地撰写文章,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介绍给世界人民。1978年宋庆龄在《中国建设》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四十年》,她向世界宣布:“一个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的长征开始了。在这个新的长征队伍中,中国福利会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象以往四十年一样,为人民服务,并且通过《中国建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66、269、270页。

②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7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61、464页。

设》，把中国社会主义进步的事实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sup>①</sup>

197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宋庆龄还特意撰写了《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她说：“三十年来，我们的人民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制度，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sup>②</sup>

宋庆龄在《中国建设》或其他对外刊物上发表涉及重大题材的文章，都有她独到的见解和与众不同的独特文风，都是以准确无误的事实和颠扑不破的真理服人。在谈到重大问题时，她总是高瞻远瞩，立场鲜明，观点清楚。她讲的是大道理，用的却是最朴素的语言，平易近人。周恩来总理对宋庆龄文章的独特风格有过很高的评价：“宋庆龄的文章说理清晰、语言新颖，是亲自动手写的，这种作风和文风很值得学习。”<sup>③</sup>

宋庆龄作为《中国建设》出版者中国福利会的主席，在从1952年创刊以后的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亲自领导着《中国建设》的工作，不断地把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告诉世界人民，让世界了解中国，并使它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对外刊物之一。《中国建设》从最初单一的英文版本，发展为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等7个文种8个版本，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庞大的读者群，成为连接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诚如陈毅所说：“事实胜于雄辩，唯真理可以服人。《中国建设》向世界各国朋友介绍真实情况，这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sup>④</sup>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6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93页。

③ 陈日浓：《亲切的关怀，难忘的教诲》，《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总第36期，第7页。

④ 《真实报道的传统》，第20页。

## 第七章 献身妇女儿童文化福利事业

献身妇女儿童文化福利事业,忠诚地为人民大众谋求福利,是宋庆龄毕生追求的崇高目标。为此,她全身心地投入和领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阶了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在 20 世纪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一、开创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

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以新的救济思想为指导的救济团体,它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服务。它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架设起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友谊桥梁,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度过困难、战胜敌人,以及救济战灾儿童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宋庆龄通过它开创了我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

#### (一) 新型的救济团体和新的救济思想

1938 年 6 月,宋庆龄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公开宣布它的目标:“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

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sup>①</sup> 它和旧社会的那种以赢利为目的的“慈善”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宋庆龄认为,“在旧社会里,大部分的救济福利事业,正是被当作另一种大买卖来做的”,旧社会本身制造了一些问题,扩大和促进了“慈善”的急迫需要。旧统治阶级没有条件来制定和实施人民所需要的救济福利工作,“于是就培养了大量的私人慈善事业。”<sup>②</sup>

保卫中国同盟诞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它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广泛团结国内外朋友。”<sup>③</sup> “它的主要工作为支援抗战,并为联合战线之一部分。”它“当时强调将筹得之款项及物资送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八路军和所有解放的敌后地区去。”<sup>④</sup> 后来,宋庆龄一再强调:“中国福利会一直肩负着双重任务:首先,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进步的斗争中帮助解决某些急需;其次,向世界各国朋友阐明中国人民斗争的意义和目标。”<sup>⑤</sup>

宋庆龄在保盟建立后,针对争取国际援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的问题,反复阐述了救济思想,并以此加强指导保盟开展工作。宋庆龄的救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1. 援助是相互的。

宋庆龄在《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中指出:“日本希望征服中国,用作征服一切太平洋国家,随后并征服全世界的根据地。今日你们帮助我们向这种威胁作战,也就是帮助你们自己,免得你们自己的青年,以后在别的战场上牺牲。”<sup>⑥</sup> 后来,她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指出: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侵略和黑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1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1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2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5~246页。

暗统治的伟大斗争，“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sup>①</sup>她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在《展望战后》一文中，她坚定地相信：“只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主之后，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才会解放出来，使整个世界受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sup>②</sup>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她在《致耿丽淑》的信中说：“过去，中国人民总是处于‘受援者’的地位。现在胜利以后，我们能够从物质上与精神上都处于‘捐赠者’的地位，特别在被压迫国家的进步势力中间尤其如此。”<sup>③</sup>

## 2. 援助不是“施舍”。

宋庆龄和她所领导的保盟，坚持反对一些外国救济机构把对中国人民捐助(救济)视为“行善”和“施舍”。她多次阐明，保盟主要的工作是救济，它首先是一个救济团体，但它绝不是中立的。她一再表示：“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针对有人鼓吹要施行人道主义，宋庆龄尖锐地指出：“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摧毁，它们就必然要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她有一句名言：“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sup>④</sup>她坚持这种精神，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同时取得了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援。保盟曾对两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把1917年生产的物品也运来中国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4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8页。

的事公诸于众,并且严正指出:“捐赠一些完全无用的器械,对中国伤员和尽一切力量护理伤员的优秀医生,这是一种侮辱。”<sup>①</sup> 宋庆龄在回顾以往的工作时,非常自豪地说:“在中国的福利工作中,并没有一点‘慈善’的气息,也没有资本主义救济活动的‘施舍’心理”<sup>②</sup>。

### 3. 接受援助是为了自救自助。

宋庆龄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指出:保盟“请你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恢复了自尊心的工人可以“在物力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以无比的热情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做出成绩来的。”<sup>③</sup>

后来,她在《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国外朋友们“他们都了解到,要给予真正的、持久的、建设性的和民主的救济,不是通过外国机构来分配救济款物,而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有自救的力量。”<sup>④</sup> 她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的讲话既形象又深刻:“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在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sup>⑤</sup> 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宋庆龄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只有把援助和我们自己一切的力量用在比以前更艰苦的战斗上,我们才有资格要求援助。只有这样,中国的土地才能得到解放;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把中国建设成新世界的一部

①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译本)第50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1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09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39页。

分。”<sup>①</sup> 中国人民接受援助是为了达到自救,进而达到自助和自力更生。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是以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它不存在旧的救济事业中“通常出现的浪费与混乱,给各种各样的尸位素餐、营私舞弊以至直接的贪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真正用于救济福利事业的金钱,是微乎其微的”<sup>②</sup> 腐败现象。她认真对待每一项捐助,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在收据上签名盖章,有时自己还亲笔复涵。她还常常抽空去仓库参加劳动。保盟的帐目都是经过审计的。有人曾建议宋庆龄买一辆轿车,她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她说:“把每一个铜板都用到祖国的抗日战争中去吧”<sup>③</sup>。在宋庆龄的廉洁奉公精神感召下,当时参加保盟工作的人,都是为了中国抗战而出力。保盟机关,只有几个骨干在那里办公,他们都是名誉职工,不取报酬。一旦工作需要,便会有许多志愿者出来替保盟工作。如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贺耀祖夫人倪斐君等都是这样的志愿者。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同国民党另一元老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也共同为保盟出力效劳。英国爵士的女儿何娴姿医生为保盟参加过在库房里清点药品的劳动。

宋庆龄在回顾从保盟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历程时,非常真诚地说:它的“一贯宗旨为中国人民服务。”<sup>④</sup>

## (二) 架起了世界人民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桥梁

《保卫中国同盟宣言》明确宣告它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

抗战伊始,宋庆龄又从深入前线的外国记者如詹姆斯·贝特兰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19页。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人民日报》1993年5月17日。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5页。

等人的报告中,从林可胜医生的呼吁中了解到许多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当时我们至少需要3万名合格的军医医官,而我们只有6千名;当时有一支活跃在长江流域的部队,竟因疟疾的危害削弱了60%的战斗力;八路军、新四军的伤病员甚至没有毛毯御寒!

宋庆龄看到,中国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先进的军队医疗机构、合格的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及药物等等;同样重要的便是在游击区维持小规模工业。宋庆龄认为:这些经济和医药援助,对于坚持抗战、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sup>①</sup>。

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多种方式,让不同国籍的地区的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够正确了解中国人民的实际情况,他们在干什么、需要什么、希望什么等,以便人们切实有效地援助中国。从保卫中国同盟成立时开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为止的3年多时间,以及保卫中国同盟于1942年在重庆重建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止的4年里。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取得联系并从中获得重要援助。他们中有美国援华会、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加拿大医疗救济会、巴黎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古巴、泰国等地的援华团体、华侨社团和红十字会。

保盟提供的大量药品和物资、钱财至今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仅从1941年1946年8月底为止,单单美国援华会就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提供了各项救济款项总数为:美元,1588286元;法币,439386188元<sup>②</sup>。

世界人民从保盟的报道中知道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具体困难后,他们即从多方面声援中国人民。1941年5月2日,美国费城举行一次援华演出。当晚,费城3000名观众以一致的意见发出了两份电报:一致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立即全面对日禁运战争物资;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8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5页。



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同国内外朋友们一起工作。尽管障碍重重,中国人民始终是朋友遍天下,任何封锁、阴谋诡计、中伤诋毁和其他敌对行为都不能分隔我们。”<sup>①</sup>根据地军民对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给予的大力支援,铭刻在心,永志不忘,曾以多种方式表示感谢。但宋庆龄在给沈其震的信中却谦虚地说:“抗日战争时期,曾为解放区的医药物资作过一些支援,那是微不足道的。”<sup>②</sup>

沈其震反复阅读宋庆龄的来信,大加称颂:“她忠肝赤胆,胸怀天下安危;她不怕风云诡谲,能尽其在我;她藐视征途血险,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边。”<sup>③</sup>

#### (四) 救济战灾儿童——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

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造成了数千万难民和战灾儿童。其中大约有300万名的孤儿。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战灾儿童给予极大的关怀,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1939年3月28日,在援助战灾儿童运动的开幕会上,宋庆龄说:“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其中有的是为了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有的是被空轰炸死的父母的子女;有的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还有成百万的儿童,虽然他们的父母还活着,但有的是战斗在前线的战士,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他们无力照顾这些孩子。”她强调指出:“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sup>④</sup>宋庆龄在介绍国内孤儿院的概况后,恳切地呼吁:“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sup>⑤</sup>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4~555页。

② 《宋庆龄纪念集》,第133~134页。

③ 《宋庆龄纪念集》,第13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2页。

1940年10月18日,保盟在半岛旅馆举办了一场专门为战灾儿童募捐的文艺义演。宋庆龄伫立在会场入口处迎接嘉宾,由中国青年舞蹈家戴爱莲演出民族舞蹈和她自编的现代舞,由来自原在上海的歌唱家斯义桂演唱中外名曲。这次演出非常成功,观众500名,净收入3685.35元,全部作为保盟救济战灾孤儿的基金。为了救助战灾孤儿,保盟在1940年派出艺术团去美国各地义演募捐。中国宗教界人士刘良模、歌唱家蔡绍序等在美国与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同台义演。

不久,美国医疗援华会执委副主席考泰伊大夫电告保盟:美国少年改革会已筹得22500美元,将用来为中国为战灾儿童购买物品。保盟立即向他们详细报告了所需项目,其中主要是强化维生素制品之类的儿童营养品。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内涌现了许多救亡救难的团体,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团体因完成了历史任务而告结束。“保盟”则不同,不仅在抗战时期,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特别是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其他团体无可比拟、也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而且肩负着长期从事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历史使命。抗日战争胜利后,“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一面继续给解放区以巨大的物质援助,同时又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子女开展社会福利和儿童文化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为中国福利会,并根据时代的要求,确定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妇幼卫生保健、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开展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和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宣传和对外交流与合作。宋庆龄生前为实现上述目标,为缔造未来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国福利会和保卫中国同盟是一脉相承的。“保盟”是“中福会”的前身,“中福会”是“保盟”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宋庆龄创建的“保盟”成为开创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为此,周恩来把中国

的救济福利事业称为“孙夫人的事业”。这是对历史和事实作出的科学评价。

## 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20世纪中叶,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巨变,中国妇女也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和进步。宋庆龄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一位伟大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位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杰出的活动家和领袖,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斗争中,她是一面光辉的旗帜。

### (一) 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

宋庆龄关注妇女问题,早在美国求学时就已开始,而且对男女平等充满信心。她于1913年4月,在自己就读的韦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了极具远见的《现代中国妇女》一文,她深信:“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sup>①</sup>

宋庆龄对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苦难,有着深刻的理解,她认为“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受压迫的国家里最受压迫的阶层”<sup>②</sup>。确实如此,中国妇女历来只能处于服从的地位,当男人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总是过着被摧残、被奴役的生活。在近代,中国妇女同样遭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而且她们还受着宗法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和夫权的压迫。

妇女的命运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的。1911年,中华大地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辛亥革命,统治中国2000年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宋庆龄欢呼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随后,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妇女运动不能不引起她更多的关注,宋庆龄在投身和领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斗争中,正是始终跟随着历史和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4页。

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sup>①</sup> 海伦·福斯特·斯诺在《回忆宋庆龄》一文中也提到了宋庆龄对女权主义的批判态度和对共产党领导地区妇女运动的赞扬。海伦说,宋庆龄总是反对被她称之为“沉闷无益的女权主义”,相信妇女会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取得进步与平等<sup>②</sup>。

正是这样,宋庆龄非常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不仅把男女平权作为民权主义一部分加以倡导,而且注意把妇女吸引到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引上同民主革命紧密结合的道路上。1924年11月28日陪同孙中山访问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时,她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讲演,鲜明地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为此,她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sup>③</sup> 宋庆龄在公开场合发表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日本一家报纸称这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宋庆龄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决捍卫者,她坚持国共合作,并肩战斗。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斗争中,她和共产党人的合作更加紧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和何香凝、邓颖超一起组成了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并向大会提交了《妇女运动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内容共有11项,着重提出国民党今后应特别注意妇女运动,团结妇女力量,从事革命活动,以扩大革命阵线。决议案还明确提出,除“领导妇女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外,同时应注意妇女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50页。

② 《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8年第1期,第1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23页。

本身的解放”，并以此作为妇女运动的指导方针。宋庆龄在随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任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并代理中央妇女部长。妇女部有一套高级干事班子，时称“六大干事”，她们是：邓颖超、蔡畅、刘清扬、黎沛华、刘蘅静、向警予。阵容之强大，令人瞩目。

宋庆龄深知中国妇女只有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在争取民族民主、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她在广州女校、妇女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出号召：“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那么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sup>①</sup>

1927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武汉后，开办了由宋庆龄任主任的妇女党务训练班，培训妇女骨干。训练班聘请了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夫人、共产党人恽代英、张太雷等担任教员。宋庆龄为创办妇女党训班发表了敬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妇女姊妹学习党务政治一切实用知识，以求妇女本身的利益。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宋庆龄更进一步阐明了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道理，她说：“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sup>②</sup> 北伐战争中妇女党训班的学员，在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劝募钱物等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的学员以后还参加了南昌起义，担负宣传、联络、救护等工作。

## （二）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紧密结合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面对新的形势立即引导妇女运动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并和何香凝一起发动妇女筹办了国民伤兵医院，还亲赴抗敌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在民族危亡关头，宋庆龄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页。

珍品,准备分别在纽约、巴黎、伦敦义卖,以所得款项支援中国抗战的医疗救济事业。这些义卖品在运往英、法两国时,都得到了免税优惠,唯独运往纽约的艺术品,美国海关却不同意免税。为此,保盟和捐助义卖品的5个妇女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宋庆龄领衔、保盟和5个妇女团体共同署名,致电罗斯福夫人请求帮助:“华盛顿,白宫,埃莉诺·罗斯福夫人:为在纽约举办中国医疗救济义卖,下列对此作贡献的人,惊悉纽约海关扣留义卖品,鉴于英法已同意免税,如蒙出面调解说情,我们将万分感谢。”<sup>①</sup>

为了购买抗战部队急需的药品,特别是治疗疟疾的奎宁(疟疾是对抗日战士危害极大的疫疾),宋庆龄煞费苦心。当她了解到许多团体都在香港购买大量药品,局面比较混乱,她就倡议由所有医疗救济团体组成药品联合委员会。委员会除难民救济会中国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红十字会等团体的代表参加外,中国妇女救援会香港分会、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和中国妇女俱乐部的代表也是委员会重要成员。药品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为中国医疗救济活动的合理运作,为各团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还特别关注坚持在敌后抗击日寇的广大游击战士。1939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宋庆龄参加了香港各族妇女的纪念大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主题就是呼吁各国妇女援助中国的游击战士。她呼吁所有的妇女,不论种族或阶级,都应该站在斗争前列来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支持中国抗战,援助英勇抗敌的中国游击战士。她说:“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名义,我觉得我不仅有权利向你们呼吁,而且有权利向你们要求援助。”因为中国的游击战士,“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sup>②</sup>。在激动人心的演说中,她盛赞战斗在每一条战线的中国妇女,“在全国斗争的杰出领袖人物中,各阶

<sup>①</sup>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译本),第21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9~270页。

级的妇女都有。”正是“在这些人物的领导下,千百万的妇女在工作着。目前的斗争不仅带给他们以新的负担,而且增加了她们的自尊以及对未来的信心。”<sup>①</sup> 后来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宋庆龄特别提到了“最进步的人物之一”的何香凝和“活跃的妇女领袖”邓颖超。她还提到了丁玲,说:“丁玲所领导的西北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所有战地服务组织中活动范围最广的,它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教育和鼓动工作。”“这个战地服务团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为战地服务组织树立了榜样。”在这篇长文中,宋庆龄感叹道:“只有在陕甘宁、晋察冀和其他的边区,才产生了承继 1925 年到 1927 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sup>②</sup>

1942 年的三八妇女节,宋庆龄和宋霭龄、李德全等被推为重庆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主席团成员。同年 7 月,宋庆龄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长文,她宣告:“中国的妇女,和中国的男子一样,正在为她们的祖国而战。在目前有关整个国家前途的斗争中,她们已经证明自己是我国历史上女英雄们的好女儿了。”<sup>③</sup> 后来她在回顾重庆时期的工作时说:“我们也像在香港时那样,按照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同国内外朋友们一起工作。尽管障碍重重,中国人民始终是朋友遍天下,任何封锁、阴谋诡计、中伤诋毁和其他敌对行为都不能分隔我们。”<sup>④</sup>

### (三) 推进战后妇女儿童工作的开展

1945 年底,宋庆龄返回上海。1946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发表谈话,呼吁世界友好人士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现万分需要精神、物质和技术的支援,以渡过战后一段困苦时期。”<sup>⑤</sup>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269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356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348 页。

④ 《永远和党在一起》,第 17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5 月版。

⑤ 《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 32 页,中国福利会编,1988 年 5 月版。

宋庆龄在上海全身心地领导和直接主持着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并开始了她更艰苦更复杂的斗争。

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下,她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想方设法募集医疗物资,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支援解放区。同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上海,开辟了新的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救济福利事业。中国福利基金会在1946年至1947年间,在劳动人民和工厂女工集中的沪西、沪东和虹口地区,先后创办了三个儿童福利站。在仅有100多平方米面积的铁皮房子内,分别设有识字班、图书室、保健室和营养站。宋庆龄后来撰文回忆说:“我们展开的工作宗旨在于动员工人阶级的儿童,教育他们认识群众力量的价值和作用,并以这个力量做基础,把革命的真理贯彻到这整个人群中去。”“我们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的原则来完成这个工作。”识字班由觉悟了的儿童们主持,“他们热烈地学会了这种办法,就象燎原之火一般地传播开来。”<sup>①</sup>宋庆龄十分关注母亲们的实际问题,在保健室特为母亲们开设了儿科门诊,后来又增设了婴儿保健科和妇产科特别门诊。每天为那些母亲们带着面容憔悴、营养不良的孩子免费看病治疗,免费化验或X光透视,有时还要为病孩解决住院免费治疗。宋庆龄为此专门与当时的市立第四医院、第五医院和时疫医院洽谈,建立了为贫困儿童免费住院治疗的协作关系。第三儿童福利站有个家境极为贫困的孩子,患了贫血症等多种疾病,病情危急,就由福利站出面,与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的市立第四医院联系住院治疗,并写了一封公函:

上海市立第四医院顾院长:

经孙夫人宋庆龄同贵院联系,承蒙同意为清寒儿童免费治病。现有敝站学生张学恕前来贵院求治,请援引前例予以照顾免费治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32页。



疗,即领近祺!

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盖章)<sup>①</sup>

经过该院的精心治疗,张学恕恢复了健康。解放后,张学恕成长为经济学教授,出版有《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等多种学术专著。宋庆龄挽救了一条小生命,正如她所说,保存了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

儿童福利站不分昼夜都有人上门求医,有的孕妇半夜临产,立刻找到福利站求助。位于沪西胶州路的第一儿童福利站,仅在1948年一年里就为13位产妇进行了紧急接生。保健室的医生、护士定期举行母亲会,向母亲们宣讲妇幼保健卫生知识,对营养不良的孩子还发给营养辅助品,有奶粉、炼乳、鱼肝油、钙片、维他命丸等,还为母亲们开展儿童营养示教活动。位于沪东许昌路的第二儿童福利站举办的婴幼儿食物营养展览,针对贫民区的特点,向母亲们介绍的多为植物营养食品,如用黄豆磨制豆浆;传授自制菜泥的方法,保持叶绿素而不破坏维生素C。用实物示教,普及营养知识,使母亲们懂得如何防止婴儿的佝偻病和其他因营养不良而引发的疾病。宋庆龄非常关怀劳动妇女和重视福利站的医疗保健工作,她在参观营养展览时,表现了极大兴趣,对展出的实物、表格和文字说明都一一仔细观看,不时露出笑容,并表扬了保健室的医生、护士。筹办营养展览的童树民医生受到很大鼓舞,她是由新四军派来上海工作的。童医生回忆起了孙夫人领导的保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先后向新四军支援、运送了大量的医疗设备和医药物资的情景,尤其使新四军女战士深深感动而令童医生难以忘怀的是,孙夫人特别关心女战士的特殊困难和特殊需要,她曾特地捐赠了一批粉红色的毯子,更受怀孕女战士欢迎的是包在毯子里的接生包,包里有小孩穿的衣服,有淡红色的,也有浅蓝色的。孙夫人想

<sup>①</sup> 《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6年第1期第10页。

得更周到的是还送来一大批奶粉,解决了产妇由于东征西战,营养不良、母乳不足的大问题。

母亲和孩子血肉相连,妇女工作和儿童工作是分不开的。为了发动妇女界对福利站工作的支持,宋庆龄把妇女工作和儿童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她于1948年1月向在上海社会上有影响的范沈颂萱、杨素兰、江兆菊等分别发出23封信,邀请她们参加儿童福利委员会。信中恳切地说:“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上海儿童工作计划已面临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紧急关头,它理应并需要得到我们为其争取的最广泛的支持。听说你关心援助贫苦的少年儿童,特别是能给予他们有用的知识和健康的工作项目,因此我们请求得到你的帮助。我们正在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组建一个永久性的儿童福利委员会,已提名你为可向这个团体服务的成员之一。委员会的目的是协助我会促进直接照顾的约5000名儿童和间接照顾成千上万其他儿童的工作。”“如果你能同我们一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我很感谢。我愿向你保证委员会所做工作的成果将是令人鼓舞的。”<sup>①</sup>这个儿童福利委员会于同年2月4日正式成立。宋庆龄在3月23日写给米高梅电影公司奥康诺先生的信中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儿童福利委员会来做这项工作,委员会成员都是当地妇女领袖。我敢肯定地告诉你,在她们的支持下,成功是有保证的。”<sup>②</sup>宋庆龄以其特有的方式把这些妇女领袖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在开展儿童工作和筹措儿童福利基金会方面,确实发挥了她们的积极作用。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了救助贫困儿童募集基金,在1946年至1948年间,举办了三次儿童福利舞会。舞会通过发售舞票、餐饮服务、印发特刊、刊登广告接受捐献等方式募集基金。1946年10月7日,第一届儿童福利舞会在逸园举行,由宋庆龄和正在上海的英国联合援华会主席克利浦斯夫人以及英国驻华大使

① 中国福利会档案原件。

② 中国福利会档案原件。

施谛文和夫人共同主办。舞会备有晚餐,邓颖超和原重庆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等义卖香槟酒。这次舞会共收入法币 40481500 元和美金 727 元。第二届儿童福利舞会于 1947 年 11 月 10 日在逸园举行,由宋庆龄会同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和夫人出面联办。舞会净收法币 5.60 亿元。第三届儿童福利舞会则由妇女领袖们组成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委员会、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和夫人、法国驻华大使梅耶和夫人、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和夫人以及孙科和夫人出面共同主办,于 1948 年 11 月 20 日在大西路 6 号嘉道理公馆(即大理石大厦,今延安西路 64 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举行,盛况空前。宋庆龄在舞会特刊上发表书面讲话,儿童剧团的小演员演出了活报剧《弃儿》等节目。舞会收入计金圆券 150459 元。从组建儿童福利委员会到举办别开生面的儿童福利舞会的成功,充分展现了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感召力、善于团结国内外妇女领袖和高超的组织才能。

#### (四) 开创新中国妇女工作的新局面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妇女得到了翻身解放。宋庆龄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理想终于实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随着时代脚步前进的宋庆龄,虽然国务繁忙,仍然十分关注新中国的妇女运动,而且在指导妇女运动的工作中,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她把妇女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紧密结合起来。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重点也放在了妇女和儿童方面。宋庆龄在《新中国的信息》一文中说:“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sup>①</sup>为此,中国福利会在纺织女工集中的沪西地区,在福利站保健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妇幼保健站。不久,宋庆龄以她获得的国

<sup>①</sup>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 139 页。

在热情洋溢的贺词中,宋庆龄对妇女工作还提出几点具体建议:必须继续教育人民群众重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且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必须提供更多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等设备,以便逐步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必须加紧扫盲工作,并多设训练机构,使妇女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必须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和加强她们的组织联系,保证她们尽量地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最后,她归结到一句话:“中国妇女的完全解放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稳固坚强。”<sup>①</sup>在这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宋庆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当然是众望所归,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一贯把中国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祖国独立的斗争和全世界妇女的斗争相联系;把保卫世界和平和保卫妇女儿童的权利相联系。她在《当前中国妇女的地位》一文中高兴地提到中国妇女参加了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妇女要和全世界妇女团结的愿望。她说:“我们是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保卫儿童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坚决支持者。”<sup>②</sup>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9月,召开了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宋庆龄作了大会的闭幕词,她以无比喜悦的心情称“这次大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空前盛会”,并着重阐述了妇女在培养下一代和卫生工作中的责任问题。她向妇女姐妹们表示:“决心同大家一道,为把我们国家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我们大会制定的新时期中国妇女的新任务竭尽全力!”<sup>③</sup>

宋庆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竭尽全力的一生。她在社会各界和妇女界享有崇高威望;她的人格力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61、564页。

量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她对妇女运动的一系列论述对当前以至对跨世纪的妇女运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宋庆龄开创的中国福利会的事业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它在缔造未来的伟大事业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宋庆龄在各方面都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宋庆龄永远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 三、心系儿童 缔造未来

宋庆龄在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时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sup>①</sup>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因卧病不能参加国际儿童节活动的时候，仍然写信向孩子们祝贺：“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sup>②</sup> 宋庆龄留给我们最后的一篇文章仍然是牵挂着孩子们的《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她在文章中把教育孩子的工作同绿化祖国联系起来，说“我们正在大力进行绿化祖国的工作，也正在对三亿以上少年儿童进行培养教育工作。”使他们“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sup>③</sup> 一颗伟大祖母的爱心震撼着人们，永远激励着我们和一代又一代孩子们不断上进。

#### （一）让我们把生命的旗帜交给儿童

宋庆龄一生始终执着地关注着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人类的未来。她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全人类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那里再也没有剥削和压迫、霸权和战争。她把毕生的精力和满腔热爱倾注在下一代，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苦痛和欢乐、今天和明天，牵挂着他们体质的强弱、心灵的美丑，素质的高低和理想信念的确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619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627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629～630 页。

立。同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一样,宋庆龄也是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高度来对待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为中国也为人类缔造美好未来的。宋庆龄的儿童观是从历史和未来的高度来看待儿童的,她说:“儿童是人类的花朵”<sup>①</sup>、“儿童是人类的至宝”<sup>②</sup>、“儿童是这个世界今天的宝贝,明天的主人”<sup>③</sup>、“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sup>④</sup> 宋庆龄认为对儿童要恪尽天职是一条规律,“一切工作和努力的结果,归根到底,应该使儿童的健康和福利得到改善,这是适用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条规律。从无法记忆的时代起,这就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原动力之一”<sup>⑤</sup>。同时,对儿童的关怀和爱护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原则,“我们是通过越来越多地关怀儿童身心的进步,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爱护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已经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的一个原则。”<sup>⑥</sup> 对于这个原则,宋庆龄是有深切体验的,她说:“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透过几十年的历史风雨,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儿童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命运。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无数劳苦家庭的孩子们,或是流浪街头,挨户乞讨,或是同他们的父兄一样,给地主资本家做牛做马,多少幼小的花朵在凄风苦雨下过早地凋谢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中国儿童才开始了幸福的生活。”<sup>⑦</sup> 宋庆龄衷心希望全世界所有儿童“都能长大成人,身体上能得到充分的发育,精神上能接受全人类最宝贵的成果,希望他们充满信心,对任何国家、个人和未来

---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6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0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71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09页。  
⑦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49页。

的一切都无所恐惧。”<sup>①</sup> 宋庆龄要“我们把生命的旗帜交给儿童们,由他们高高举起,在人类进步的长途上,继续迈进。”<sup>②</sup> 这就是宋庆龄向我们提出的心系儿童、缔造未来的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宋庆龄高度重视儿童工作。儿童工作,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历史赋予人类以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一代一代地把希望的火炬传下去,以不息的奋斗去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我们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美好。”<sup>③</sup> 从祖国的未来和革命的前途看,“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因为未来是属于新一代的。因此,老一辈人的使命不仅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为争取社会进步而进行胜利的斗争,而且还要使下一代人能在新的条件下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sup>④</sup> 所以,“儿童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这是一个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关系着人类命运的问题。”<sup>⑤</sup> “培养儿童,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和革命未来的大业,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要由青年来接力。培养儿童的工作,涉及到整个社会,关心儿童,人人有责。”<sup>⑥</sup>

## (二) 培养他们“在各方面都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

宋庆龄从她自身的健康成长和近70年的革命实践中,深切感到缔造未来的工作必须从娃娃抓起,并且一直抓下去。她非常赞同陶行知提出的“教育与生俱来,与死同去”的终身教育观,也非常赞同陶行知指出的“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的论断。

宋庆龄在建国以后,非常认真地抓紧、抓好儿童从出生到入学前的这一“人之初”阶段。同时,她又为入学儿童创办了少年宫等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9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9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0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96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71页。

告诫过的那样：“要立志做大事，不是要做大官！”大事就是建设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人做了官也不像“官”，只是公仆，为人民服务的“人中人”，不是做官当老爷的“人上人”，也不是善于阿谀奉迎，只配做奴才的“人下人”！宋庆龄的培养目标抓住了这个核心。

培养主人翁的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因此，宋庆龄一贯主张应该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最宝贵的东西当然包括物质财富，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但是，宋庆龄也一贯认为“对孩子来说，思想教育比之物质更为重要得多”<sup>①</sup> 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而且，宋庆龄还一再明确指出：“最宝贵的东西乃是我们传统的革命精神。”<sup>②</sup>

她经常让孩子们看到，在他们面前展现着无限广阔的道路，需要运用劳动和智慧才能走得通。同时又让孩子们看到，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要经历各种困难的考验和复杂的斗争，必须学会战胜困难和夺取斗争胜利的本领。在学好本领中，她强调学习历史，不要忘记过去：长辈在旧社会的受压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无数革命先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还有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中国儿童一直跟着共产党参加了斗争。让革命传统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让孩子们以生长在祖国这块染满先烈血迹、父兄们在忘我劳动着的土地上而感受到幸福和自豪。宋庆龄衷心希望孩子们“学习革命长辈的英雄榜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切为了革命，从小学习做个革命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生的精力。”<sup>③</sup> 人们都记得：宋庆龄生活在中国苦难屈辱的年代，她父亲和孙中山的革命情谊熏陶了她，使她能够在12岁的时候就向孙中山说出了“我要同你一道去革命”这并非儿戏的话。以后，宋庆龄用一生的经历实践了自己的崇高理想，从爱国主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10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72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66页。



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一个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烙印的还是家庭。

三是一切成年人的行为都应该是儿童的榜样。“他们从长辈的行为上找到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道德的标准。长辈人的革命奋斗,忘我劳动的行为培养儿童们为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好准备。”<sup>①</sup>

宋庆龄在谈到把最宝贵的东西给儿童时,突出的是“要从各方面给儿童做个榜样。”<sup>②</sup>“要使后代人想到我们的工作时感到骄傲;要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提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名字;要他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找到为共产主义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找到智慧和经验,找到道德标准,找到吸取力量的源泉,这才是留给我们的光荣后代的真正的财富。”<sup>③</sup>宋庆龄已经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为后代留下了真正的财富。

### (三) 为全世界儿童恪尽我们的天职

为了争取社会进步,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幸福的新世界,宋庆龄对全体儿童保育工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者这支专业队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担负这一光荣任务的所有儿童工作者“应该有高度的才干,他们应该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来教育影响孩子们,如果单纯把儿童工作当做一种职业,那并不会把工作做好。”<sup>④</sup>她指的儿童工作者,包括了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教师到初中教师的这个“全体”,包括了从工友、厨师到领导、负责人这个“全体”。因为这些人都在实际上担负着培养儿童和侍候儿童的工作,需要日夜辛劳、无怨无悔地发扬共产主义的母爱。这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光荣而又崇高的原则。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7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9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97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0页。

更可贵的是,宋庆龄要求我们用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来教育影响孩子们。她是一向注重并强调“身教”的。因为“孩子的认识和学习,首先是模仿的过程”,“成年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的榜样,大人骗孩子,孩子也就学会了欺骗;大人打孩子,孩子也就学会了打人。大人大公无私、团结友爱、艰苦朴素、诚实勇敢,才能为孩子树立榜样,使他们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sup>①</sup> 她赞同陶行知关于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即“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这个原则被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们接受,都懂得应该注重身教,而难也难在身教。

为世界儿童恪尽我们的天职,“要尽量的努力保卫和平。战争将破坏儿童的幸福生活,将夺取千万个幼小的生命,将使无数的儿童无家可归成为孤儿。”<sup>②</sup> 因此,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宋庆龄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保卫儿童,不使儿童们受到任何伤害!给儿童们以幸福的生活!”<sup>③</sup> 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确信世界上所有人民都在追求同一目标——使我们的儿童能享受和平与丰满的生活。”<sup>④</sup> 她在1953年5月里写的《我们为儿童与和平而建设》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将和同一条路上前进的人同心协力,和一切愿做朋友的人友好合作,继续向前迈进,建设她的新的生活。中国一定要继续使她的儿童健康、快乐。……我们正是这样为全世界儿童恪尽我们的天职——儿童是这个世界今天的宝贝,明天的主人。”<sup>⑤</sup> 1979年3月29日,她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支持和赞成联合国把当年作为国际儿童年的决议,她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和各国儿童工作者增进友谊,互相学习,共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3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9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8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05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9页。

同努力,反对侵略和压迫,争取一个国际和平和环境。”<sup>①</sup>

“心系儿童,缔造未来”的思想在新世纪中将为人类的和平、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发挥重要的作用。宋庆龄和她的思想不朽。

---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 571 页。

## 第八章 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前驱 和伟大战士

宋庆龄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而且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受到广泛的尊敬,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被誉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 一、反法西斯的雄狮

#### (一) 抗议纳粹暴行

宋庆龄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早在二、三十年代,宋庆龄就积极参与了国际的反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

从1927年到1931年,她在苏联和欧洲期间,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反帝活动,曾两次被选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3日上午,宋庆龄还率领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领事馆抗议书》。抗议书列举了德国法西斯摧残人权,践踏文化,对本国人民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的种种罪行,然后严正声明:“本同盟以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不仅蹂躏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作家,不啻于摧残德国文化。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之进步起见,特提最严重之抗议。”<sup>①</sup>

宋庆龄等的抗议活动,《申报》、《中国论坛》等报刊都作了报道。6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德国法西斯的肮脏的手段》的评论。7月31日,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发表《为援助德国法西斯恐怖下的革命战士宣言》,号召工人、农民、学生结成统一战线,来援助德国革命战士,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德国和中国的法西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还成立了“反法西斯后援会”,一些工厂的工人纷纷用通电、募捐等方式给受法西斯迫害的德国工人以物质援助和精神的援助。不仅如此,上海犹太人协会也致函民权保障同盟表示感谢,甚至在德国莱比锡的地下报纸也刊登了宋庆龄的抗议声明。这表明,宋庆龄抗议纳粹暴行,声援德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正义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 委派专人出席世界反法西斯会议

1931年9月,日本率先在远东挑起战火,继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之后,又步步进逼,于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使中国面临着更严重的民族危机。1936年,在欧洲土地上也发生了第一场战争。这年7月,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教权主义势力和右翼军人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试图推翻年初刚刚建立的依靠人民阵线的西班牙共和政府。由于得到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军的支持。西班牙内战

<sup>①</sup> 《申报》,1933年5月14日。

很快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民主进步力量同法西斯势力大搏斗的国际冲突。

1936年7月,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鉴于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共和国,决定于9月10日在巴黎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援助西班牙和声援各国反法西斯群众运动的问题,并通知该同盟副主席宋庆龄参加。宋庆龄接到通知后,立即响应。但是,她当时住在上海莫利哀路旧居,周围国民党特务密布,监视极严,不能自由行动,出国极为困难。于是,她与中共地下党商量后,决定委派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的钱俊瑞代表她前往巴黎参加会议。

在钱俊瑞启程之前,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约她到寓所,作了两次长谈。第二次谈话时,宋庆龄还介绍专程来华请她去巴黎赴会的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与钱俊瑞认识,并用精流利落的英语对钱说: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目标你是知道的,“它反对德国纳粹法西斯,反对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反对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我们中国呢,还有个卖国独裁的法西斯。你说,这个法西斯我们应不应该反对?”钱回答:“当然要反对,而且要反对到底。”她笑着说:“对,你说得对,所以你这次去巴黎开会,就要代表我把这层意思讲透。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凶恶的侵略者、压迫者。还有一个卑鄙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它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领土和主权。对于东方这两个法西斯主义,欧美各国人民还不很清楚。”她特别嘱咐钱俊瑞要好好准备一下,多搜集材料,把蒋介石的法西斯、日本法西斯与德意法西斯作个对比研究,“指明它们的性质和我们对它们作斗争的任务。要说明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同欧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休戚相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压迫和剥削,挣脱自

己的奴隶地位。”<sup>①</sup>

钱俊瑞按宋庆龄指示的计划离沪赴欧洲。9月2日他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代表名义,参加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9月10日则代表宋庆龄并遵照她的教诲与指示在巴黎出席了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扩大会议,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次会议由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著名科学家朗之万主持。他们两位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罗曼·罗兰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形象地赞扬宋庆龄说:“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参加那次会议的法国共产党元老加香也热情地对钱俊瑞说:“假如宋庆龄这次能够亲自来到巴黎该多好呀!你们的国母不也就成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法国的保姆了吗?”钱瑞瑞回顾这次欧洲之行,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在国外,无论到哪里,都深深体会到宋庆龄同志作为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她的威望是非常非常高的。全世界进步人民都熟知她,崇敬她,热爱她。”<sup>②</sup>

宋庆龄不仅积极投身于国际反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前驱,是站在反法西斯斗争前列的雄狮,而且还精辟地阐明了战争观与和平观,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

## 二、正确的战争观与和平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一个历史范畴,战争是私有财产的产物,从私有财产和阶级产生以来就开始了。战争是用以解决一定发展阶段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帝国主义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122~12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sup>②</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124~125页。

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其本性是要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帝国主义国家为此必然要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为争夺世界霸权而斗争。革命导师列宁在分析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时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人类社会自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不到半个世纪,就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的空前浩劫。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的客观需要,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迫切愿望。随着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性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宋庆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新形势,即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涌现了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和亚洲与东欧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的新局面;回顾了二次大战中不同制度国家,共同结成反法西斯阵线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深切体会到世界人民普遍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在五十年代初,她曾多次指出,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是当前形势发展的主流,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的;强调只要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心协力争取和平,世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她还认为,已经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得到真正独立;而要发展经济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宋庆龄利用出席国际会议和出访机会,一再阐明了自己的这一主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总结了我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当代的世界形势,多次强调中国同属第三世界。如何发展本国经济,是第三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宋庆龄则把当代世界的问题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当代两位伟人对世界形势发展的论述,有着历史的、逻辑的联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



定,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贡献。

### 1. 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人类有能力选择和平。

宋庆龄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始终坚持这一著名论断。这个论断虽然并非她首创,但可贵的是恰恰在 50 年代初期,当帝国主义气焰嚣张、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和平力量刚刚开始组织起来,许多人对战争能否避免心存疑虑之时,她却对这一观点坚信不移,并且一直坚持到底。1951 年 6 月,她在《论和平共处》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挽回联合国在初成立时所透露的光明和希望。我们必须显示战争并非不能避免”<sup>①</sup>。同年 9 月 18 日在接受斯大林和平奖金时表示:“在这样的时候,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全世界的普通男女、那些身受战争痛苦的人们,团结一致,要求用诚意的谈判来代替用武力解决国际间的纷争,那末我们就不会有战争”<sup>②</sup>。

宋庆龄坚持这一观点,是由于她坚信人民的力量一定能战胜帝国主义,也是她对二次大战后世界格局科学分析的结果。她敏锐地预见到,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有组织的和平力量的壮大,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足以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刻。她始终坚信:人民能够扭转局势,人类有权选择和平。她说:人类常常处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一条走向战争与毁灭,另一条走向和平与进步,以及一个较长时期的或者永远避免战争的可能。过去每次人类都被迫走上战争道路,每次都是一小撮战争贩子代替整个人类,违反人类的意志作出了决定。现在则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因为人类中多数与少数力量的关系,要求和平的人与要求战争的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基本的转变。“这是第一次,人类中的大多数已经能够突破一切困难、明确地根据本身的利益而作出选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646 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661 页。

择。现在,人类已有力量选择和平”<sup>①</sup>。宋庆龄的这一观点,对于50年代前期世界和平运动的开展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 2. 人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

宋庆龄的这一思想来自于她对5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的客观清醒的分析和认识,来自于她对当时国际关系格局和人民力量的正确估价。

本世纪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人类被迫面临着一次次的战争浩劫,付出了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的代价。进入50年代后,虽然二次大战的创伤尚未完全消除,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却又在策划新的战争阴谋,企图挑起新的战争行动,威胁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形势十分严峻。许多人在思索、探寻避免战争、求得和平的途径。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和平战士,宋庆龄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她认为:时代已经不同了,“自远古以来,战争一直是解决各国之间存在的问题的最后手段。如果说,从人民的观点来看这从来就不是解决分歧的头脑清醒的办的话,那么,没有能够禁止这种办法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历史还没有发展到各国人民能够在决定这种问题上使用自己的智慧的程度。但是,今天历史已经到了转变的时候。各个地方愈来愈多的普通男女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有权决定人类的命运。”<sup>②</sup>帝国主义及少数好战分子尽管企图制造新的混乱,在越南、朝鲜和马来亚发动战争,拼凑军事集团,但是这种企图并没有占世界和平力量的上风,也决不会得逞。基于这样的判断,宋庆龄清楚地看到人民在维护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地位,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建国初期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事业中去,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久经考验的和平运动的先驱。

宋庆龄深刻地了解人民的愿望和呼声,也深刻地理解人民力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28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61~162页。

(3)动员人民极具迫切性。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词中,她以动员人民为主题,指明了当前工作的中心。她说:“动员人民,要求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切战争,并且用真诚协商的方法谋得和平解决,这当然包括在朝鲜、越南和马来亚进行的战争。动员人民,要求所有曾经参加战争的国家根据国际协定,合法地结束以前的战争,并以此向全世界保证,过去的敌对国家,今后将为和平而工作,为和平而生活。动员人民,要求禁止使用一切集体屠杀武器并宣布这些武器为非法,对于在目前战争中曾经使用这种武器的人们,必须按照国际公法加以审判。动员人民,要求扫除对于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一切障碍,并且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促成各国人民间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充分交流。动员人民,争取有助于和平共居的道德条件,争取健康空气,以消除仇恨与战争,健全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友爱与谅解”<sup>①</sup>。“五个动员”反映了宋庆龄和平外交的主要目的丰富的内涵。

宋庆龄认为,世界和平事业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动员全体人民起来斗争才能赢得胜利,为此,她与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广泛的交往,希望通过人民之间的交往合作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她特别对美国人民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她说:“我们相信,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希望世界能够通过协商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它的问题”<sup>②</sup>。希望美国人民起来斗争,制止战争,承担起对和平的责任。她不仅与亚非兄弟国家的人民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而且与西方各国的人民也保持着广泛的接触,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 3. 和平要用斗争去争取,不能幻想等待。

关于如何去争取和平,宋庆龄有一个基本思想,即和平必须用斗争去争取,不能幻想等待,更不能乞怜哀求。她指出:我们是要

<sup>①</sup> 《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上的开幕词》,《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5期。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77页。

求和平的，“但是谁也不要曲解这一愿望，以为我们会容忍不平等和奴役”。“和平不能等待，和平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sup>①</sup>。她说：三个西方大国正在阻挠获致真正和平的一切企图，它们要我们放弃和平共处这个观念，使和平战士的任务更为艰难和迫切，因此，“敌人为制造战争出一份力量，我们就要为和平出两份力量”<sup>②</sup>。她强调：我们具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和朝鲜战友们在一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表现出，为了我们这一崇高的目标，我们是不惜流血的。为了和平，我们愿意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

宋庆龄在许多场合宣传以斗争求和平的思想，她在出访缅甸时说：“我们固然必须尽力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对那些侵犯我国领土完整、干涉我国内政、企图把我们重新投入殖民牢狱的人们进行斗争”<sup>③</sup>。在一篇关于儿童的文章中她说：“为了使儿童纯洁的心灵中没有痛苦的记忆，我们必需尽一切力量制止战争，即使要付出极高代价，我们也要把保卫和平的任务担当起来”<sup>④</sup>。在谈到坚持斗争可能会带来的艰难时，她大义凛然地表示：“我们宁愿忍受一万里这样的艰苦，而不愿忍受我们所熟悉的在外国压迫下的一寸艰苦”<sup>⑤</sup>。以斗争求和平，贯穿在宋庆龄为和平奋斗的全过程中，她不愧于和平斗士的称号。

4. 通往和平目标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完全赞赏某些亚非国家的“独立”、“中立”立场。

50年代前期，一些亚非国家在取得独立以后，从维护本国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了独立于任何集团之外的立场，它们注重维护本国的独立，既不加入西方营垒，也不加入东方阵营。对于这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01页。

② 《为新中国奋斗》，第29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14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98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76页。

些国家的做法,到底应当怎样看待?宋庆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透彻、全面的分析,写下了《万隆精神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这一光辉篇章。首先她指出:许多亚非国家独立后奉行独立立场,拒绝参加帝国主义扶植的军事联盟,强调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已成为亚非亿万人民的政策,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影响。其次她表示:我们相信,达到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完全理解某些亚非国家的看法,即它们不参加任何一方的立场可以发挥它们最大的作用,这是由各个国家特有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再次,她有力地批判了那些攻击亚非国家独立立场的言行,并表示:“我们中国对于某些亚非国家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混乱的看法,也不感到生气、不高兴或者不安。我们不抨击这种立场,我们极为赞赏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助于实现一切亚非人民的意愿,并且扩大了世界和平的可能性”<sup>①</sup>。宋庆龄的这一思想,帮助人们分清了敌友,有助于和平力量的壮大。

5. 和平外交不只是政治上的有限交往,而是包括贸易和文化等的广泛交流;不仅仅局限于几个国家,而应当面向全世界。

宋庆龄毕生奋斗,把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与维护世界和平紧密相连,因此,她并不单纯地为和平而和平,而是站在更高层次,预见到和平的获得将使人民拥有更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奠定基础。她表示:“我们希望在互利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我们希望进行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样,我们认为将有助于人类大多数所热望的和地球上生命的继续发展所必需的持久和平……我们主张在全世界都建立这样的关系,只要对方表示出诚意,在我们这方面是决不会没有反应的”<sup>②</sup>。她还指出:“我们促进贸易和文化上的接触,因为世界是不能脱离货物的交换而存在的,因为人民通过文化的交流彼此之间就能得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1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8-69页。

到深刻的了解,因为贸易上与文化上的两种接触乃是促进一切国家走向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方法”<sup>①</sup>。

1956年8月,她在出访印尼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指出:“为了和平,我们需要并且要求同全世界保持良好关系”<sup>②</sup>。同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她致词表示:“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团结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民,发挥文化交流的作用,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把协商和合作的精神扩充到整个世界”<sup>③</sup>。宋庆龄的这一策略思想,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瞻远瞩和国际主义战士的博大襟怀,令人肃然起敬。

6. 在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把策略性与原则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区别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人民和政府,争取西方大国对五项原则的认可。

50年代前期,宋庆龄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树立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典范。她对美国政府的揭露批判是毫不留情和富有成效的,既敢于把美国的战争政策和细菌战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她又不失时机地多次呼吁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进行有诚意的谈判,解决问题,她希望中国关于中美举行高级会议的建议“得到美国方面的适当响应”<sup>④</sup>,希望在根本改变两国“关系方面有所进展,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的正常化对于整个广大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有莫大的意义”<sup>⑤</sup>,希望中国同美国“有正常的关系,正象两个世界大国所应当的那样”<sup>⑥</sup>。

她严格地将美国人民与政府区别对待,她说: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是要求和平的,他们已进一步认识到争取世界和平的

① 《一个伟大的和平进步的堡垒》,《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1日。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2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63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22页。

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末,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她还认为:世界和平与福利事业有着直接的关联,两者是相辅而行的。建立了和平,就增进了福利,破坏了和平,就毁灭了福利。因此,一国政府对于战争与和平所抱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它为人民拟订和实施的福利纲领<sup>②</sup>。

妇女儿童和福利工作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小事,但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宋庆龄却以自己的言行把它们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为人们树立了将平凡与伟大结合起来的榜样。保卫和平,说到底就是保卫妇女儿童及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宋庆龄毕生为之奋斗,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她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 三、倡议和平共处

在长期的斗争中,宋庆龄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和平共处是实现亚洲及世界和平的最佳选择,是在帝国主义存在的世界上避免战争、取得和平的有效途径。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长期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在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却屡遭挫折,找不到革命成功的方向、道路和可以依靠、联合的力量。直到晚年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和民族的愿望,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决策,即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联合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共同奋斗的政策,才赢得了大好的政治局面。为此,孙中山在总结40年的革命经验时明确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提出了人类非和平不能永享幸福,世界非和平不能进入大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07页。

<sup>②</sup> 《为新中国奋斗》,第320页。

同的原则<sup>①</sup>。作为孙中山的最忠实的同志和最得力的助手,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上述思想主张领会最深、贯彻最力,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加以发展和阐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1951年6月1日,她根据新中国的外交总方针,率先撰文阐述了“和平共处”原则,同年9月18日,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上的答词中,她在谈到未来时呼吁:“使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那时候整个人类将只为创造和享受劳动的成果而生存”<sup>②</sup>。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围攻、封锁和孤立,首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思想,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指导下,争取实现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与平等互利。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对于苏联摆脱被孤立和包围的状态,对于世界和平的维护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由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贯彻,十月革命胜利后仅仅7年,苏联就迅速打开了外交上的被孤立局面,国际上称1924年为“承认苏联年”,至1925年1月,已有22个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思想。1953年底中国政府倡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把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规定为对外政策总路线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对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作了独特的贡献。她是建国初期,中国宣布奉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苏联的外交政策,并在朝鲜半岛直接与美帝国主义兵戎相见的情况

<sup>①</sup> 邵力子:《孙中山先生的和平理想及其为和平奋斗的努力》,《文汇报》,1956年11月11日。

<sup>②</sup> 《为新中国奋斗》,第308页。



家的人民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来决定如何处理自己的内政。如果人们按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国际行为的标准的话,人们将获得和平,人们将获得合作和友谊<sup>①</sup>。因此,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既然努力建设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有义务要求尽可能广泛地实施五项原则。”<sup>②</sup>

#### 4. 和平共处是人民大众强有力的表示。

她指出,和平共处的观念,“并不是在软弱的地位来拥护和平的。”恰恰相反,它是“从对人民大众的实力与能力怀有无比信念,从坚定的信仰中产生的。”这就是说,我们对于人民政权的优越具有这样的信心:“随时能和任何人作和平的竞赛。”<sup>③</sup>这种信心有事实的根据。战后苏联的五年计划表现了举世无伦的成就是例证。

不仅如此,支持和平共处这一观念的力量,还表现在“绝大部分人类要求和平的事实上。”人民大众从他们的经验中深知“战争和备战仅仅对少数人有利,对于一般人民,战争只能带给他们贫困和忧虑。”<sup>④</sup>因此,“人民把争取合理生活的斗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联合在一起。”他们清楚地知道本国政府“应该以和平竞赛来造福人群,这比发动战争来掠夺他们好得多了。”<sup>⑤</sup>总之,和平共处这一观念是以事实为根据,而且是大多数人类的意志,“是有全世界支持的。”<sup>⑥</sup>

#### 5. 和平共处是可以实行的。

宋庆龄认为既然和平共处代表着大多数人类的意志,无疑它是“可以成功地实行的。”她回顾了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联合阵线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8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84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2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3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2页。

的事实,说:“那次联合阵线,纵然有各种制度与不同的政府,仍然表现了苏、中、美、英以及其他盟国的人民有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击败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把各国的人民大众从匮乏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由此可见,和平共处这种主张“是确实的”。今天还是同样的人民,利益也仍然相同。因此,缔结联合阵线如果可以赢得战争,那么“根据和平共处的原理,也一定可以结成联合阵线来反对战争,解决今天一切的争端以达到普遍的和谐与合作。”总之,绝大多数人类的意志和愿望是:“不但全世界各国能够接壤相处,和平竞赛,而且能缔造一个伟大的合作的时代。”<sup>①</sup>

6. 和平共处是人民民主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要求。

宋庆龄指出:以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为代表的和平阵营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他们都力求在自己的国土上从事建设,他们从不贪图别国的领土和资源,追求的只是各国人民之间的真诚的友谊,这使得这些国家把它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和平共存的基础之上<sup>②</sup>。“和平共处的观念是从对人民大众的实力与能力怀有无比信心,从坚定的信仰中产生的”<sup>③</sup>。“五项原则是伟大的人道精神和高度的推理力的产物。它们已经适用于拥有大多数人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sup>④</sup>。五项原则已经证明了是非常有价值的准则,已经被许多国家承认为国际事务行为的法规,已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平共处的观念和强大力量。和平共处的观念有全世界的友持,是大多数人类的意志,再没有其他有力的论点能和它抗衡。

7. 和平共处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实现。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3页。

② 《新型的和更高类型的关系》,《人民日报》1955年2月13日。

③ 《为新中国奋斗》,第29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86页。

和平共处既是可能的,而且人民民主国家已把它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那么谁在阻挠它的实施呢?宋庆龄认为和平共处的敌人,乃是英美统治集团中的“某些分子”。他们“简直拒绝承认这个真理,他们偏不能和平地生活下去。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杀气,渴望一战。”这些人就是“华尔街和伦敦的少数垄断资本家和卡特尔老板,以及他们的代言人。”这些是英美人民的“老板”,“居心要做全人类的剥削者。只有这班人才会从战争中获利。这些就是和平共处的敌人。”<sup>①</sup>

由于这些敌人,即战争贩子正在尽其所能破坏和平共处,这就使一切和平战士的任务更为艰难和加倍迫切。“敌人为制造战争出一分力量,我们就需为和平出两分力量。”<sup>②</sup>宋庆龄要求人们在为和平斗争时,必须结合各国的和各地的一切其他的斗争,“在人民作主的国家内,增加生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来临;在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在每一个国家内,争取提高生活水平。”所有这些问题都重要,“都和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直接联系着。”总之,全世界的和平战士们“团结起来”,为“战胜战争贩子”,“争取和平共处”进行不懈的斗争<sup>③</sup>。

二次大战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宋庆龄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她曾经为之大声呐喊的和平共处原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

#### 四、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宋庆龄不仅在理论上对和平外交做了大量的探索,而且在行动上更是以充沛的精力和杰出的能力从事世界和平运动,她广泛团结和组织中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以筑起打击帝国主义战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6页。

遍。”“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正鼓舞着全亚洲走向世界和平。”<sup>①</sup>

鉴于宋庆龄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1950年11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在她未能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举她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争夺的重点地区,二次大战以来的一些影响到世界局势发展的地区战争几乎都在这里爆发,因此,新中国一成立,宋庆龄就把发起和指导这一地区的和平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

1952年3月,宋庆龄与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7月31日,宋庆龄为《人民中国》写了《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一文,论述了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宗旨与要求。10月2日,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37个国家的344名代表和45名列席及特邀代表冲破重重阻力,怀着与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16亿),过去一直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的地区,一起团结合作、共同斗争,推动世界和平的坚强信念,参加了这次会议。宋庆龄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会议,并以会议执行主席的身份,指导了这次会议。会上,宋庆龄作了题为《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的开幕词。她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史诗意义的事件。它给予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完成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要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够创造和平的。”<sup>②</sup>宋庆龄还以中国革命胜利和加强和平阵营为例,雄辩地论证了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的关系:“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54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17页。

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sup>①</sup> 这就是说, 只要把人民进一步广泛地团结起来, 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争, 那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都是可以争取的。开幕词环绕几个迫切的中心问题, 提出了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并坚定地表示: “只要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 坚决地保卫和平, 我有充分的信心, 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标。”<sup>②</sup> 在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 会议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一致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以及关于朝鲜问题、民族独立问题、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等十一个决议案, 从而在亚太地区形成了空前的争取和平的统一战线。各国代表都表示回去后要动员和组织更广大的人民投入到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去。根据决议, 在大会之后成立了常设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会议的成功举行, 既壮大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 又提高了新中国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年 12 月, 宋庆龄被推选为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率团到维也纳参加大会, 在 13 日举行的大会上, 她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著名演讲, 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大会的祝贺和希望, 还分析了世界形势演变的可能趋势, 论证了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在扭转局势恶化方面的伟大力量, 并就巩固世界和平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 特别是朝鲜、越南与马来亚的战争; 要求停止一切战争准备, 立即切实地裁减军备, 把金钱和物质用于人民福利; 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 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 不侵犯他国的领土等。宋庆龄的发言, 得到了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美国代表路易士·惠吞说: 宋庆龄的讲话和建议“这样具体、这样合情合理, 一定能为美国各阶层人民所接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 第 720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 第 726 页。

受。”<sup>①</sup> 这次大会对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会以后,美国人民进一步加强了反对美国政府侵略战争的斗争,配合了中朝两国军队的军事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亚非会议召开后,宋庆龄在印尼发表了《万隆精神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团结》的广播讲话,指出会议表明亚非人民的团结对于在继续进行中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已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号召亚非各国人民高举和平共处的旗帜、万隆旗帜、反帝反殖的旗帜,在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前进,她的讲话,在亚非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响应,为中国和平外交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5年,宋庆龄在访问印度期间,发表了多次讲演,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强调“和平共处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客观的需要”,并说:“历史性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现在不仅成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指针,而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sup>②</sup> 在谈到远东问题时,表示“中国支持召开远东和平会议,以便由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同时主张“缔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公约。”她还一再重申“中国人民的立场是简单明了的:我们要求和平。我们对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没有恶意。我们不威胁任何人,现在也好,过去也好,我们也决不容忍其他人的威胁。”<sup>③</sup>

在50年代的世界和平运动中,宋庆龄的地位十分显著,她在国内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执行主席(1949年),亚太区域和平会议执行主席(1952年)等,在国外被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0年于华沙举行)推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在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时,与约里奥·居里同

①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7日。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5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64页。

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1952年)。

由于宋庆龄为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普遍获得了世界人民的高度赞颂。1951年,她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这项奖金的委员会派来了两位著名作家——苏联的爱伦堡和智利的聂鲁达于1951年9月到北京来授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许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这个崇高的荣誉是表彰宋庆龄在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卓越的贡献。

总之,在50年代新中国外交面临最困难的时刻,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分和地位,领导和从事世界和平运动,尤其是对亚太地区和平运动的发起和指导,充分显示了她出众的外交魅力,协助打开了新中国外交战线的崭新局面。宋庆龄准确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不断地向国外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sup>①</sup>

## (二) 加强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50至60年代,宋庆龄在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期间,多次代表国家出访,加强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她富有魅力、落落大方,为新中国树立了美好的形象,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

1952年12月,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回国途中顺访匈牙利和苏联,这次行程共计45天;1955年底至1956年初,访问印度17天;1956年1、2月,先后访问缅甸21天和巴基斯坦9天;1956年8月,访问印尼10天;1957年11月,访问苏联20天;1962年2月,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6天。这些访问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39页。

个国家必须享有机会获得发展和作出进步,以有利于全人类。”<sup>①</sup>宋庆龄对印度的访问是十分成功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在印度深深地体会到“人民和政府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的热情,他们与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热烈希望,令人感觉到这种情感存在着巨大的力量。”<sup>②</sup>

宋庆龄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前往在缅甸、巴基斯坦访问。在缅甸,宋庆龄会见了吴努总理,参加了缅甸独立8周年的庆祝活动,参观了仰光大学并发表了演说。此外,还参观了举世闻名的仰光大金塔以及和平塔和大石窟。在大石窟里看到了供奉着从中国奉迎到缅甸的佛牙。离开缅甸前还发表了告别广播演说。她称赞缅甸人民是聪明勤劳、热爱和平的人民,宣传了和平共处的原则,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进一步发展中缅友谊的愿望。她说:“我确信中缅友谊将日益发展,不会因敌人的恶意诽谤而受到损害。我们必须反对殖民主义。我们必须建设我们各自的国家,铲除帝国主义的残余。我们必须提高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这种独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sup>③</sup>在巴基斯坦,宋庆龄受到了阿里总理和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被授予达卡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和“卡拉奇公民”称号。她应邀在巴基斯坦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称颂中巴友谊。她特别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彼此合作。”<sup>④</sup>并说:“我们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而且,除了努力维持和平以外,我们的确没有可能做别的事。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友谊和情感将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sup>⑤</sup>

1956年8月,宋庆龄出访印尼,受到苏加诺总统和印尼人民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

② 《人民日报》,1956年3月11日。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80~181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84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86页。



友好使者,是和平外交的先驱。

为了积极发展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了推进和平外交事业,宋庆龄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代表团,保持与国际友好人士的联系。仅据《宋庆龄年谱》所载,她大约在国内接待过近 300 次外宾,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文革”以前的年代。

在宋庆龄接待过的外国来宾中,有国家元首和军政要员,如尼赫鲁、甘地夫人、胡志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金日成、苏加诺、吴努、班达拉奈克夫人、西哈努克、谢胡等等,有不少人她曾多次会面。还有世界和平组织、中外友协、妇女团体、各类进步机构或民间访华团的负责人;也有国际友好人士、老朋友及普通劳动者,范围极其广泛,人数难以计量。这些外宾都以能会见宋庆龄为荣,并受到和平与友谊的熏陶。宋庆龄接触的外宾国籍几乎遍及全球,但比较集中于苏联、东欧、朝、越、蒙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印尼、缅、巴、锡兰等亚洲国家,这与其和平信念和中国外交重点是密切相关的。此外,她同美、英、法、日、意、奥、瑞士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民主人士也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

除了出席官方的外事活动外,宋庆龄还经常以私人名义在京沪两地寓所宴请贵宾,享此殊荣者既有各国元首和一般友人,也有政府、民间团体及各种国际性组织,有时规模甚大,如 1956 年宋庆龄在上海私邸举行茶话会,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应邀出席。

我国许多外事工作或例会也需要宋庆龄出场,每年一度的国庆盛典期间,她都十分忙碌,以国家领导人身分接见并宴请来京参加我国国庆典礼的各国观礼团或访问团。在 50、60 年代这种活动往往十分隆重,最多时有 80 余国数千贵宾前来。作为回报,宋庆龄经常应邀出席各国驻华使节举办的招待会。

宋庆龄历年所接见过的外国参观、访问、交流团体涉及政府、议会、经济、军事、外交、友协、和平、文化、艺术、工会、妇女等各类,

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不胜枚举。她特别与各国友协、文化、工会、妇女、和平团体及个人保持着广泛、持久而深厚的友谊。她还经常出席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的仪式，发表简短讲话，祝愿人民友谊不断发展。

宋庆龄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为了世界的和平事业，为反对侵略战争，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为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是新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引为自豪的和平外交的伟大的开拓者。

##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的战友和伟大战士

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她一贯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认识是它根据对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科学态度去追求真理,并且为真理而奋斗”<sup>①</sup>的结论,并进而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她逝世前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根据她的要求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的夙愿。



### 一、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 (一) 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坚决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sup>①</sup> 在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合作、商议中国革命问题时,宋庆龄始终陪同孙中山,并且为此做了大量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工作。她是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最坚定的拥护者。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加剧,左、中、右三派围绕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在1926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紧密合作,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她用庄严沉静而又斩钉截铁的声音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sup>②</sup>,要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指出“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sup>③</sup> 由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的紧密合作,使这次大会得以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予以纪律制裁。宋庆龄本人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8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3页。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之际，革命阵营分裂的趋势亦日益明朗化了。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宋庆龄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林伯渠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坚决反对、严厉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历数蒋介石“反抗中央，自立中央”、“以反共口号”博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的种种罪行，指出，现在“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sup>①</sup>。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汉口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决裂。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并明确表示：“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宋庆龄虽不在南昌，但起义军依旧推选宋庆龄为其领导成员之一。同日，发表由宋庆龄领衔，与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共同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谴责汪精卫、蒋介石集团的“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提出“继续为

<sup>①</sup>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转引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329～33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47页。

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sup>①</sup>等主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等人签名公布,引起了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三十年代,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鉴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随后,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宋庆龄在促成国共两党正式接触以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说:“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她在促进国共合作谈判中发挥作用:“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sup>②</sup>宋庆龄不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她的殷切期望,积极与她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物联系,为促进国共合作谈判,奔走呼号,不遗余力。1937年2月,宋庆龄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联合提案,宋庆龄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词,指出:“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

<sup>①</sup>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sup>②</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

完整。”<sup>①</sup>

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宣传抗日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并进行募捐,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1941年1月,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4人挺身而出,联名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随后,宋庆龄又和何香凝、陈友仁等人联名通电痛斥蒋介石,强烈地要求他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她还通过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向全世界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痛斥蒋介石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倒行逆施。她的这一正义行动给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团结政策以极大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却依靠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拒绝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并在1946年6月悍然挑起全面内战。7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美国的反动分子正在与中国的反动分子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挑起中国的内战。“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呼吁“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向美国朋友们呼吁,你们应当阻止所有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来推动这样一个运动。”<sup>②</sup>这一声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广泛的响应。这一时期,宋庆龄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47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18~419页。

B11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1~462页。

在上海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把救济福利工作作为中国人民求得彻底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坚持不懈地援助民主运动。在解放战争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募集了大量的物资,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和各种途径,将它们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各个解放区,积极有效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 (二) 为建设社会主义,永远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依然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不懈的努力。

1949年6月30日,上海党政军民隆重集会庆祝党的生日,宋庆龄应邀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出席了庆祝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热诚地“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丛林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她用发自内心的激情欢呼:“向人民的胜利致敬!”“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全世界及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sup>①</sup>

1949年9月,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她热情欢呼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由衷地赞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sup>②</sup>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1~462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8页。



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她讲出了参加这一盛典的深刻感受,“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同她交换看法。

1950年10月,宋庆龄视察东北三省、访问了工厂、农村、部队。她看到祖国的建设事业在开国后不久能很快得到恢复,边防得到巩固,十分高兴。她看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军阀割据、国民党的腐败政权都已经完全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东北的农民“他们已走上了集体努力的道路,走上了导入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城市的工人阶级“他们正迅速地重建着工业,为了它在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未来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新民主主义时代是走向完全组织起来的、高度效率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的准备时期。”“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sup>②</sup>

1951年,宋庆龄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发表《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一文,指出:两年来,我们“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其规模、范围和成就都是中国的悠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为未来的进展准备了基础。”这三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使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两年成为历史中最辉煌最辉煌的两年。”表明“中国人民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为自己的主人,而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7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38页。

1956年9月,宋庆龄应中共中央邀请列席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她认为“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在向大会的致词中,她谈了自己从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中体会到:“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要感谢不断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她表示:“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我想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sup>①</sup>

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宋庆龄满腔热情地支持这种历史性的探索。她认为,“如何通过保持党员和干部的革命纯洁性来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的各种矛盾”,“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政策和工作作风,是有历史意义的。”<sup>②</sup>她充分肯定“在探索中国当前有关政治的、生产的或其他任何事物的实质中,毛泽东主席著作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sup>③</sup>对这种探索中出现的曲折,以及由此引起的严重经济困难,则是充满信心的。她在《解放十六年》中写道:“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现在我国经济和我国人民在渡过了这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我们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的。……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5~23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6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75页。

阻挠我们继续朝着我们的目标迅速前进——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先进工业、先进农业、先进科学文化和巩固的国防的国家。”<sup>①</sup>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宋庆龄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欢欣鼓舞，她在《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中说：“一九七六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sup>②</sup>她总结了建国30年的历史，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又说：当看到“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sup>③</sup>

宋庆龄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她在1979年2月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显示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我们正在集中力量使我们的生活、学术和国防现代化。”<sup>④</sup>她在《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中说：“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摧毁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势力方面，在拨乱反正、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6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8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90页。

④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4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科学文教事业、逐步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以及在加强国防和外交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国内,初步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国外,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终于取得了有利于迅速开展和平建设的国内外环境。有了这样良好的条件,我们才能从今年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新的长征,才能信心百倍地奔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sup>①</sup>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满怀激情地关怀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并为此贡献出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

## 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正式一员

### (一) 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

宋庆龄在当孙中山助手时,虚心好学,为孙中山“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sup>②</sup> 等,由此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真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向列宁致电祝贺。之后,苏俄不断派使节拜访孙中山,会见时,宋庆龄都参与其事,并参与了孙中山致列宁函电的起草,在这过程中,宋庆龄不仅初步了解了苏俄的情况,而且开始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接触始于二十年代初。经历了多次革命失败后,1923年10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而国民党右派却竭力反对。1924年1月的一天,宋庆龄向孙中山提出了为什么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向宋庆龄分析了当时国民党的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87~588页。

<sup>②</sup>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情况,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sup>①</sup>,这使宋庆龄茅塞顿开,坚定了自己支持国共合作的态度。之后,国民党右派想通过宋庆龄说服孙中山放弃改组,被她断然拒绝。她回忆说:“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sup>②</sup>在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陈独秀)会晤讨论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及与列宁所派使节反复交谈中,宋庆龄都参加并担任活动安排、会议记录等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共产党人明确的思想与无畏的勇气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确信他们是孙中山可以依赖的同志,对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钦佩,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7年春,宋庆龄为了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还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大钊选寄了一本。

同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学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队伍经历了重大的改组和分化,党组织转入地下,不少人叛变、投降或隐退。而此时,宋庆龄站出来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暴行,大义凛然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公开同国民党右派决裂。同时明确表示:“我相信共产党。我还想看一看”<sup>③</sup>。这事实上是宋庆龄在反思了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之后,尤其是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94页。

③ 《宋庆龄纪念集》,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思考后得出的。她对此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进行了分析,看到了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忠诚的,斗争是英勇的;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是背叛革命的。因此,尽管对共产党在一些做法上是有看法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她对两党存在的错误采取的分析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这也是宋庆龄之所以能理解和同情共产党,并依然把共产党作为革命同志和朋友的原因。这里表现出了宋庆龄不同一般的分析能力,而这也恰恰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但是,共产党能否经得起这次失败的考验,能否克服自身的错误和弱点,从而真正挑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担,对当时的确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所以宋庆龄说“我还想看一看”,也表现了一个革命者正直、无私和坦率。在这里也体现出她对党派的拥护和反对,都以救国救民为标准,永远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所以,她很少受党派偏见所左右,不拥护党派的错误政策,尤其在她已经认识到政策是错误的时候。这是宋庆龄思想的精髓。

离开武汉回到上海后,面对来自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以及来自亲人的压力尤其是他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她都毫不含糊的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sup>①</sup>

1927年8月,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现了孙中山生前访问苏联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绝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的决心。临行前发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高度评价了“三大政策”对大革命的重要贡献,并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sup>②</sup>。这是宋庆龄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也是第一次公开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声明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雄辩

<sup>①</sup> 尚明轩等:《宋庆龄年谱》,第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版。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0页。

地论证了三大政策的正确性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思想深刻,高瞻远瞩,表明宋庆龄对道路的抉择是深思熟虑的。

在访问苏联和居住德、法等国期间,党组织派人与她联系,为她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方便,为她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阅读革命书籍以及社会考察创造条件。在苏联期间,宋庆龄以“国民党左派”这个“唯一有资格承受孙中山留下来的革命的称号的党派”<sup>①</sup>的名义发表了多项声明,宣传三大政策,驳斥蒋介石的造谣和诽谤,同时宋庆龄“亲眼看到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里消灭了剥削,人民生活提高了,使我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也使我对中国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sup>②</sup>她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使她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她在柏林等地的三年中,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与邓演达等人一起研讨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共同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通过访苏和较长时间对德国社会的考察,和对两种社会制度比较以及与德、法等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触,她在观察中国国情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更加成熟。

在法国时,宋庆龄曾见到了廖仲恺之女廖梦醒,并关心地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廖梦醒当时还未入党,回答说“不是”,宋庆龄笑着说:“当共产党是件好事,你何必否认。”<sup>③</sup>可见,当时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已很有认识,并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人正确的归宿。

1931年,宋庆龄欧洲归来,回到上海,蒋介石数次邀请宋庆龄到南京与家人团聚,并参加国民党政权的活动。而宋庆龄看透蒋介石的卑劣行径,断然拒绝他的要求,忍受着远离家人亲属的寂寞与痛苦,独自居住在上海。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1页。

② 《宋庆龄纪念集》,第206页。

③ 《宋庆龄纪念集》,第136页。

与此同时,在邓演达被害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群龙无首。12月19日,谢树英代表临时行动委员会请宋庆龄来领导他们的组织,宋庆龄婉言拒绝,同时鼓励他们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最终没有答应参与该组织的内部事务。而早些时候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也坚决表示了同“第三党”之间毫无关系的态度。

《宣言》的发表,体现了宋庆龄思想上的重大变化,表现在:在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左派有组织的力量太薄弱,不可能恢复原来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后,她已不再以此立场为出发点去挽救国民党,而是同国民党彻底决裂,这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宋庆龄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再好的理论和方案都不能离开工农群众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奋斗,而共产党的组织和战斗精神是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第三条道路可走,保持了与“第三党”无关的政治立场。这是宋庆龄思想上的一次飞跃,标志着她基本确立了共产主义思想,并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宋庆龄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思想也由此时开始确立。1933年,宋庆龄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中,指出:“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sup>①</sup>明确地说明了工人阶级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排除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同时,宋庆龄积极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及所确定的各项政治主张。“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联合起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4页。



中国是初次。你一定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很糟很糟。但是,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你们美国朋友中有不少相当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比如史沫特莱、斯诺、葛兰尼契,他们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我看他们有眼光,有见识。”<sup>①</sup>

宋庆龄在确立共产主义思想之后,坚决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并用共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1937年的一天,宋庆龄与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轻轻地问道:“我算不算党员?”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微笑着满意地点点头<sup>②</sup>。她的思想与行动也已完全符合了共产党员的标准。

从30年代初期宋庆龄发表的论文、演讲、声明等可以看出,她已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作出了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 and 论述。在《宋庆龄之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与工农群众及领导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相联系。她指出:“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sup>③</sup>,并明确表示“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sup>④</sup>

她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中,指出:“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

① 《宋庆龄纪念集》,第123页。

② 《宋庆龄纪念集》,第20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6页。

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因此,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sup>①</sup> 她的这些论述,符合实际、很深刻、很精辟,与马列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相符。她之所以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时代特征、世界形势作出精辟的分析,绝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她的世界观和政治信仰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30年代初,从宋庆龄的著述和实践活动表明:一方面,她努力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另一方面,她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加以大力赞扬和肯定。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苏联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一专政是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统治。苏维埃的制度是司法权行政权合一的,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专政机构。”这一论述,不仅十分明确地承认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正确地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宋庆龄还认为,苏维埃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指出:“苏维埃才是工农大众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机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权利,有史以来就没有像在苏联那样发达,别的国家也没有那样有力的群众组织。”<sup>②</sup> 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创立的“苏区”和“工农苏维埃政权”,也作了充分的肯定。她说:“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0~135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7页。

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sup>①</sup> 宋庆龄是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以及“苏区”的其他情况的。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上海,宋庆龄敢于那样旗帜鲜明地颂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就强有力地证明宋庆龄是承认和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

宋庆龄在承认、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同时,对那种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比无产阶级民主“优越”的论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它只给予少数人民主的权利。甚至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限制的。”“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者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能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统治的烟幕。但是连这一点形式的民主,在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被取消的。”<sup>②</sup> 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宋庆龄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非常深刻。之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她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观察了解。她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访问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然后又访问德、法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作了比较,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专政”作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并与有关同志进行过深入的研讨。

宋庆龄在30年代初承认和称颂无产阶级专政,是符合“只有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7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08~109页。

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评判标准的,说明她已经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这是她确立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的标志。

## (二) 第一次提出入党要求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国际上,1956年春,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报告。由此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风波,除了波匈事件外,各国共产党,尤其是西欧一些共产党面临大批党员退党的严峻考验。

面对复杂的形势,宋庆龄十分坚定,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将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1957年4月,刘少奇到上海视察工作,曾在王光美陪同下专门去探望宋庆龄。谈话时,刘少奇与宋庆龄谈起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党。”宋庆龄立即点头表示非常赞同。刘少奇又说:“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兴奋地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她稍停片刻,很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到上海一起去看望宋庆龄。刘少奇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

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时,宋庆龄仍然信任党的领导,号召人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从1959年至1961年,因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党在工作中的重大失误等原因,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前夕,她满腔热情地歌颂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导,说:“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站在我国历史的中心。”“在我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和法西斯反动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建立一个各族人民兄弟般团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艰苦斗争中,党一直是领导者和决定性的力量。”<sup>①</sup>接着她从思想理论原则、实践行为以及国际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称颂了中国共产党,精辟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仔细地研讨着过去和现在,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她也为我们指出了未来。她在领导我们时所依据的政策乃是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目标三者的结合。”宋庆龄兴奋地说:“中国共产党——她的脉搏随着中国人民的心一同跳动——动员我们鼓足干劲,号召我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全国人民的健康幸福,排除一切障碍,从而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sup>②</sup>她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意志和深切的愿望。“党领导着四分之一的人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世界的胜利,从而不可估量地加强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sup>③</sup>最后号召我国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奋勇前进!”<sup>④</sup>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69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70~37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70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71页。

一些暂时困难使一些人产生了信念上的动摇。而宋庆龄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将摆脱一切困难,朝预定的目标前进。“我们完全支持党的态度。我们愿望赴汤蹈火跟着党走,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我国人民的利益”<sup>①</sup>。

当有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时,宋庆龄严正表示:“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sup>②</sup> 她以亲身的经历告诉人们:“从我三十余年革命工作的经验中,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认识是它根据对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科学态度去追求真理,并且为真理而奋斗。”<sup>③</sup> 共产党“把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在坚持实践中运用到中国革命中。”她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告诉广大群众:“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情况,只有共产党在行动上最勇敢、最坚决。”<sup>④</sup> 她列举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后,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已经使得共产党具备了领导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她针对一些人以不懂科学技术为由,企图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告诫说:“我从过去历史中已经充分看到,共产党人怎样学会了他们所不懂的东西,他们不但应用了所学的,并且还把所学的更向前推进。我认为,党一定会学会科学和技术,同时,党还会对科学和技术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贡献。”<sup>⑤</sup> 宋庆龄以自己独特的地位,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

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站在一起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受

①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01—40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75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75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8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83页。

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少干扰,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宿愿。她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怨气,更没有不满,一切听从党的安排。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完全证明宋庆龄早已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从组织上吸收宋庆龄入党,但一直把她作为党的领导同志看待。在50年代,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她也完全按照党的保密守则要求,亲自拆封和保管。看完后亲自加封退回。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11月,宋庆龄参加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宋庆龄代表中国代表团作了题为《全人类将选择社会主义》的讲话。代表团在访苏期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上签了字。宋庆龄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都破例地出席了宣言的签字仪式。毛泽东曾对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说,宋庆龄与郭沫若、沈雁冰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这都表现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的极大信任。此外,中国共产党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同志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有些问题则由齐燕铭或徐冰和童小鹏去向她报告请示。不论什么问题她都是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去处理;只要是党的决定,她总是无条件的执行。如1980年2月25日,童小鹏向宋庆龄汇报了全国政协决定举行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活动,大家推举她为筹备委员会主任时,她很谦虚地说让人家做好。当童小鹏说党组织同意大家的意见时,她就欣然接受。3月5日的纪念会,她亲临主持,会开得很好,对国内外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 (三) 终生宿愿的实现

1981年3月,宋庆龄病重后,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央探望她,并同她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商谈了重要问题。当邓

颖超叫她“宋副委员长”时，她明确阻止：“不要再称我‘副委员长’”。等邓颖超问“称您‘庆龄同志’好吗？”宋庆龄含笑频频点头同意。

5月14日深夜，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高达40.2℃。15日早晨，彭真、邓颖超、王光美等前来看望宋庆龄，当时她的体温已下降，神志清醒，再次向党提出入党要求。当时在场的王光美记述说：“我与在场的医务、工作人员一起耳闻目睹了她是怎样最后一次提出入党要求。她接连重复了三遍，明确表示坚决要求入党。我望着她那双我熟悉的、晶莹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感动得泪如泉涌，亲吻着她说：‘亲爱的庆龄同志……’”<sup>①</sup>彭真和邓颖超向宋庆龄陈述了党几十年来都把她作为同志看待，并了解她的入党的长期宿愿，说明要向党中央报告她的入党要求。宋庆龄睁开眼睛望着他们，轻声答复说：“好！”<sup>②</sup>。

5月15日上午10点半，宋庆龄的入党要求直接报告了胡耀邦。下午，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说：

宋庆龄同志年轻时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从1923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革命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她一贯是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192页。

<sup>②</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61~62页。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宋庆龄伟大一生的正确评价。

5月15日下午6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结束,列席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受党中央委托,立即从中南海的会议室驱车前往宋庆龄住宅,把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喜讯告诉她。廖承志到宋庆龄床前握着她的手激动地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决定接收您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宋庆龄听到这一喜讯后显得十分激动。她连连点头,微笑着,眼里闪着泪花。但她说不出话来,她仍在发高烧。第二天下午,邓小平前去看望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她从内心里感谢党和同志们。她终生的最大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名册中又增加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名字。有宋庆龄这样一位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而对宋庆龄本人来说,她成为共产党员,更使她的名字增加了光辉。

### 三、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原因

宋庆龄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并且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因是什么?

(一)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宋庆龄与中共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根本原因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说:“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sup>①</sup> 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叛变以后,宋庆龄先后多次发表声明、谈话,强调指出,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革命者,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她强调指出:“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sup>①</sup> 尽管那些国民党冒牌领袖们危害了三大政策,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孙中山“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sup>③</sup> 宋庆龄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sup>④</sup> 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宋庆龄先后多次强调,“唤起民族,组织民众,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才能救中国于危亡。”<sup>⑤</sup> 她依据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在《展望战后》一文中,指出:“这个合作在当前和将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sup>⑥</sup> 她曾严厉痛斥汪精卫“这个卖国的汉奸,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sup>⑦</sup> 同时对那些一知半解的信徒们提出忠告“进一步,我们要晓得,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sup>⑧</sup> 并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sup>⑨</sup> 宋庆龄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辟阐述,可以看出她真正懂得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谛,同时也表明她捍卫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不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44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5页。

⑥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8页。

⑦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7页。

⑧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7页。

⑨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5页。

广大农民,是不会拥护蒋介石的。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宋庆龄充满胜利的喜悦,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可靠保证。”“中共在农村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已经证明了这点。”<sup>①</sup> 由于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捍卫者、继承者和实践者,因此,就能够长期合作,共同奋斗,并能广泛地团结一切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力量(个人、组织、团体),为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

## (二) 为人民服务是宋庆龄与中共实现长期合作的共同宗旨

宋庆龄与中共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出发点,都是依靠人民、相信人民、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

早在1927年4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出席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她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农民的革命精神,“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并认为“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sup>②</sup> 宋庆龄在同蒋介石斗争中,曾严正声明:“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sup>③</sup> 她痛斥戴季陶时,再次表示:“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是你知道的。”<sup>④</sup> 宋庆龄多次表示,我对人民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点,从不失去信心。她对自己及其所领导团体的工作人员要求,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宋庆龄在给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指出:“中国福利基金会本来是为上海和全国人民服务的。今后将继续努力完成这项任务。”<sup>⑤</sup> 只要是人民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她在所不辞。她爱人民之所爱,恶人民之所恶。对中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8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4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9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5页。

⑤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2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华民族,她总是充满着信心。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宋庆龄坚定地相信:“中华民族像一个人一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团结一致。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sup>①</sup>而“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sup>②</sup>她不顾环境怎么险恶,坚持留在上海,与上海人民一起迎接解放。上海解放后,她非常高兴地对朋友说:“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sup>③</sup>1949年6月30日,宋庆龄应邀参加了上海市各界人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向中国共产党致敬》,高呼: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是正义之声,它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宋庆龄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返沪后,发表了《华北之行的印象》一文,指出:“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了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sup>④</sup>正如斯诺所说:“宋庆龄所关心的是四万万人民的利益。”<sup>⑤</sup>几十年来,宋庆龄一贯热爱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相信和尊重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中国共产党视宋庆龄为自己的亲密战友、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周恩来称颂其为:国之瑰宝。

### (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宋庆龄与中共长期合作共同奋斗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98页。

③ 《宋庆龄纪念集》第123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7页。

⑤ 蒋洪斌:《宋庆龄》第3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的思想基础

经过 1924~1927 年大革命的实践、赴苏欧考察以及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共刊物以及与西欧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触与交往,在 30 年代初,宋庆龄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如果说,在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在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上,还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上,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为基础,认为民生主义“是解答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sup>①</sup>那么,她赴苏欧考察的革命实践则是其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起点。访问苏欧,这虽非直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她深入实地考察的活动,也是一种革命的社会实践。自身的实践往往比时代的影响更有力,赴苏欧考察,参加世界反战活动,同时研讨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实践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密切结合。这是宋庆龄比许多同时代的人,以较快速度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宋庆龄到苏联后,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一是有了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促使她寻找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勤奋学习。二是经过对苏欧的访问活动,看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社会制度,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看到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对劳动群众剥削压迫的残酷,文化与生产停滞等,这些现实促使她发展了新的思想意识,新的观点,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她在 30 年代发表的几篇论著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其中特别是 1933 年 9 月的《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显得更为集中。她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强调必须以革命战争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3 页。

反对反革命战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自此,宋庆龄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看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到来的关键所在。她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关键时刻,都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当她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大地上基本确立时,充满着喜悦的心情,写道:“伟大的人民力量,已推动了历史车轮,通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变而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把孙中山奋斗一生的理想变成现实,而且远远超过了他的理想”。<sup>①</sup>

正因为宋庆龄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中国问题,从而选择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即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进而发展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宋庆龄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宋庆龄与中共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根本内在的原因。

#### **(四) 共产党人的关心影响也是宋庆龄与中共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重要原因**

早在20年代初,宋庆龄就随同孙中山与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往,孙中山已认为李大钊、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sup>②</sup>宋庆龄对此深信不疑。宋庆龄接到李大钊应她的要求选寄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一书,十分高兴。美国尤恩森说:1922年秋天,宋庆龄和孙中山一起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sup>③</sup>。人们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孙中山、宋庆龄和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亲自主盟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2~263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3页。

<sup>③</sup> 《参考消息》,1981年5月22日。

让李大钊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找革命的道路和实现孙中山访苏的遗愿,决定赴莫斯科访问,有中共地下组织派人护送登上了赴苏船只。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宋庆龄筹组、参与的抗日救亡团体(民保盟、国民御侮自救会、武卫会)以及远东反战会议等,都是在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关心、支持、组织下建立起来和顺利举行的。许多营救活动,如营救牛兰夫妇、廖承志、陈赓等也是在共产党配合下进行的。同样,宋庆龄也积极配合中共组织开展活动。只要是革命的需要,总是全力配合,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如为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事,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负责人与宋庆龄商量。上海局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宋庆龄寓所,与宋庆龄会谈5小时<sup>①</sup>。经协商修改后,由宋庆龄领衔在上海发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936年4月,冯雪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来到上海,先后与鲁迅、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见面,向他们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与宋庆龄见面时,双方商定中央派李云做中共地下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建立后,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委托胡愈之直接指导救国会工作。救国会在宋庆龄、沈钧儒等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救亡活动,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革命发生重大转折或重大事件发生时,中国共产党总是及时地同宋庆龄取得联系,相互介绍情况,交换政治主张,取得共识,使重大问题获得圆满解决,有力地推动局势的顺利发展。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及时来上海,向宋庆龄介绍会议精神。在国共谈判合作抗日中,周恩来等于1937年7月间,专程到宋庆龄寓所,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以及谈判进展的情况。在同国民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周恩来多次到

<sup>①</sup>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68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宋庆龄寓所,向她介绍谈判情况以及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上海解放后,陈毅、潘汉年进入上海的当天下午,就专程拜访宋庆龄,听取她对接管上海建设新上海的意见。宋庆龄总是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运用她的特殊地位和她最熟悉的岗位,积极地开展工作。她根据毛泽东1936年9月来函的建议,于1937年2月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联络了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在5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除了请她参加重要会议外,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同志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sup>①</sup>周恩来去世后,由廖承志负责与宋庆龄联络处理重大问题。

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尊敬和钦佩宋庆龄。廖承志说:“她一生革命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她是一个革命家,是斗士,以共产党员自许。”<sup>②</sup>在革命战争艰苦年代,宋庆龄常常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工作和战斗,中国共产党总是委派最忠实、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负责她的安全保卫工作。在那不幸的动乱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宋庆龄等一批与中共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采取保护措施。宋庆龄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使她在为新中国奋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上几点是最基本的。宋庆龄同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合作,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149页。

<sup>②</sup> 《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50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第十章 国之瑰宝 风范长存

宋庆龄一生不屑积聚个人物质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它是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

### 一、学习、继承和弘扬宋庆龄的革命精神



宋庆龄的革命精神主要表现在无私奉献、奋斗实干、执著追求、不断创新等诸方面。

#### (一) 无私奉献精神

无私奉献精神是宋庆龄圣洁的政治品质和崇高人格的集中体现和极为光彩夺目的一面。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宋庆龄把自己无私地献给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精神贯穿宋庆龄的一生。

**“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 1913年反袁斗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在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际,宋庆龄从美国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孙中山身边代替宋霭龄出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帮助他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等,使孙中山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同时,宋庆龄也受到孙中山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的熏陶。1914年11月,宋庆龄给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写信说:“我从来没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继续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帮

助孙博士。他需要我。”<sup>①</sup> 宋庆龄自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工作以来,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默默地相爱了。宋庆龄决定和孙中山结合。1915年10月,宋庆龄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被西方作者称之为“冬天与春天谈恋爱。”“他年近五十,而她二十刚刚出头。”<sup>②</sup> 孙宋婚姻引起很大的震动,反对的多,支持理解的少。结婚前,宋庆龄征求父母的意见,遭到坚决的反对。但宋庆龄不为所动。宋庆龄为什么要和孙中山结合呢? 1914年11月,她曾向孙中山坚定地表示:“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sup>③</sup>。后来,她和埃德加·斯诺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她”<sup>④</sup>。为了拯救中国这一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宋庆龄毅然决定和孙中山互相携手,共同奋斗,这是她理想和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对世俗偏见和封建婚姻的一次反叛。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宋庆龄宁愿抛弃了舒适的家庭、优裕的生活,违反父母的意愿自己嫁给了一个正在流亡,生活道路上充满了艰险和动荡,但却是立志拯救中国的孙中山。从而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实现其人生的全部价值。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1922年6月16日凌晨2时,孙中山从电话中得知陈炯明叛变。陈炯明乘孙中山忙于北伐,

<sup>①</sup> 尚明轩,陈民,刘家泉,赵楚云:《宋庆龄年谱》第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sup>②</sup>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全译本)第133页,星光书店,1985年版。

<sup>③</sup> 《宋庆龄年谱》第33页。

<sup>④</sup> 《斯诺文集》第1卷第10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从内部突然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想置孙中山和宋庆龄于死地，以取而代之。

形势非常危急，孙中山决定留下来，坚守岗位，扫平叛乱，不惜以身殉国。他即命令副官带领 50 名卫士，保护夫人，立即冲出去。宋庆龄沉静而又坚定地说：“先生，你身为总统，有以身殉国的勇气，值得钦佩，但率领三军讨平叛乱，更是当务之急！”在宋庆龄的一再坚持下，孙中山终于同意转移到永丰舰<sup>①</sup> 5 上去，但坚持要夫人与他同行。宋庆龄又坚定地说：“不，为了你能安全出去，我留下。”孙中山仍然坚持要和宋庆龄一同撤离。宋庆龄恳求地说：“先生，危难之际，要以国事为重，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sup>②</sup>坚持先让孙中山撤离险境后，才在卫士掩护下正面突破火线，但身体受到无法补偿的摧残。把生的希望给予别人，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一英勇行动，再一次表现了宋庆龄的无私奉献精神。

“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 1951 年 4 月 6 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在维护与巩固国际和平斗争中有卓越贡献的世界各国民主力量的代表宋庆龄等 7 人。9 月 18 日，宋庆龄出席斯大林和平奖金授奖典礼。她在接受爱伦堡授予的刻有斯大林像的金牌奖章和奖状后，致答词，表示：“这个光荣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然后在奖金（10 万卢布）汇款单上批示：“此款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幼福利事业之用”。用宋庆龄所获得的和平奖金筹建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个保健院现在拥有 350 张床位。包括产科、妇科和计划生育科。它在计划生育方面的经验和科研成果，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sup>③</sup> 宋庆龄总是把自己与中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把自己

① 后改为中山舰。

② 《宋庆龄纪念集》第 25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宋庆龄纪念集》第 211~212 页。

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

## (二) 奋斗实干精神

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奋斗实干精神是宋庆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光辉体现。奋斗实干精神是宋庆龄基本的政治风范,是她崇高品质的又一体现。

**“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宋庆龄万分悲痛。距孙中山去世仅10周,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英国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示威学生和其他群众开枪,死12人,伤数十人,还有多人被捕。宋庆龄从哀伤中振奋起来,于6月初,在上海就“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惜未加组织,尚不能使人正轨耳。”“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还指出:“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并“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民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号召:“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并欣慰地指出:“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民争保障。”<sup>①</sup> 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依靠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判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5~26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断后所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这表明她正在积极努力地捍卫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

在实践上,宋庆龄还帮助上海在罢工中流离失所的工人组织了一个特别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开展因五卅失业工人的救济活动。宋庆龄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牺牲的烈士的反帝群众大会。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大会主席台上,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包括来自印度、日本、朝鲜、土耳其和德国的解放战士和进步人士)站在一起,频频挥手向大家致意。由于她身体实在太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好委托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

“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这是蒋介石指使特务经过精心策划的一次政治性谋杀。宋庆龄是从电话中获悉杨杏佛(字杨铨)被暗杀的。

6月19日,宋庆龄为杨杏佛被害发表的声明中说:“6月16日,上星期五杨铨来看我,给我看了他最近几个星期接到许多恐吓信,并且把他听到关于阴谋害他的一些口头警告告诉了我。”“他星期五是特地来警告我的,说在他接到的信中,有几封把我的名字也列在就要受到恐怖狙击的名单中。我也告诉他,我也接到许多类似的恐吓信——常常是用最下流的话写的。”<sup>①</sup> 是的,就在不久前,李燕娥还拿到一封内装两颗手枪子弹给宋庆龄的信。在暗杀和恐吓面前,宋庆龄毫不动摇,毫不退缩,她在19日声明中,严厉谴责蒋介石指使的一伙特务卑鄙阴谋。说:“这批人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5页。

作。她和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选购了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好让成千上万的群众能最后一次瞻仰鲁迅的遗容。10月22日,为鲁迅举行葬礼。宋庆龄在送葬的行列里,紧随灵车,与广大群众一道前进。国民党特务慑于其崇高威望,不敢对葬礼横加干涉,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葬礼的企图。下午5时在万国公墓礼堂前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宋庆龄发表了激昂的讲话,指出:“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继承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地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sup>①</sup>宋庆龄主持的鲁迅葬礼,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大示威。

**“既然要救国,一定要有救国的勇气”**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它的主要活动是,通过举办时事讲座、游行示威、出版刊物等方式,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

救国会的抗日救国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和十分仇视。蒋介石悍然下令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派军警逮捕了在上海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等7人。随即又把他们押到苏州,关在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当天凌晨,宋庆龄得知“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后,极为愤慨,立即写了一封给冯玉祥的信,并托孙科带着信飞往南京面交冯玉祥。冯玉祥、于右任等人很快在南京发起了10万人签名的营救“七君子”运动。宋庆龄又托张学良营救“七君子”。张学良从西安飞抵洛阳,请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却无动于衷。宋庆龄还亲自起草“声明”、“宣言”,为营救“七君子”奔走呼号。她在《声明》中

<sup>①</sup> 《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说：“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又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sup>①</sup>

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顽固立场，宋庆龄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位爱国志士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指出：“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是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sup>②</sup>对上海新闻界发表的书面谈话中，指出：“我们认为这一个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倒并不是仅仅为了营救七位先生。我们认为这一种和平的合法的救国运动方式，是最适合目前的需要。我们不是大家都要挽救中华民国危亡吗？既然要救国，一定要有救国的勇气。假如我们都有为救国而入狱的勇气，我们就再不必害怕日本帝国主义。”<sup>③</sup>7月5日，宋庆龄不顾胃病复发的痛苦，和胡愈之、沈兹九、陈波儿、张天翼、张宗麟、张定夫、彭文应、汪馥炎、胡子婴等12人，实践《宣言》中的诺言，和反动当局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到苏州高等法院后，宋庆龄和胡愈之等3人被推为代表，同该院院长朱树声谈判。他们义正词严地提出：“如认为‘七君子’有罪，亦请同样将我们羁押起来。”“救国入狱运动”，得到许多爱国志士的响应和支持，纷纷要求坐牢同服“爱国罪”。当日，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递呈状要求入狱同服“爱国罪”者有姜源等三四十人之多。<sup>④</sup>“救国入狱运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后来，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等组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输送了大量的医药器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57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81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86页。

④ 《救国无罪》第143页，时代文献社1937年1月版。

材、物资和款项,为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千百万难民、儿童、贫病作家、艺术家募集了大量救济物资和捐款,这些都是人所周知的事。这也充分体现了宋庆龄的奋斗实干精神。

### (三) 执著追求精神

宋庆龄一生的理想与追求,人们通常用“为新中国奋斗”来概括。她无论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总是抱定宗旨不动摇,即使牺牲个人利益,危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义无反顾,按照自己的意愿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直到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我将踏看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决不回头”** 1927年春夏之交,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先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然后是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宋庆龄紧握和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7月14日,宋庆龄在武汉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7月中旬,宋庆龄到达上海。7月30日,宋庆龄和合众社记者进行谈话时,指出:“近日谣传余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余此次所以必须来沪者,因余家宅在沪。”并再次宣布:“以后余之行止,将如余前在汉口所发之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加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sup>①</sup> 宋庆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的千千万万革命者中的一个。8月间,宋庆龄和陈友仁等秘密离开上海,前往苏联。行前发表了赴莫斯科的声明。宋庆龄的不屈服的斗争,给许多革命者带来鼓舞,并从中吸取斗争的力量。许德珩回忆说:“她坚定的立场,果敢的行动,给了我莫大的鼓舞的力量。”<sup>②</sup> 宋庆龄到莫斯科后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和谈话,阐

<sup>①</sup> 《晨报》1927年8月3日。

<sup>②</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69~70页。



明访问莫斯科的目的,中国革命前途和胜利的信心,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赞扬说:“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还预见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武装起义“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sup>①</sup>

12月17日、18日,宋庆龄先后接到蒋介石与苏联断交和诬蔑其在莫斯科失去行动自由的电报,她先后复电,予以严厉谴责。指出:“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揭露蒋介石集团“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而且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首领们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国的讨伐军的头目们保持着密切接触。”再次表明自己誓死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坚决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如果我回国的话,那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sup>②</sup> 宋庆龄紧握和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在它的指引下团结和争取了一批革命志士。

**“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孙中山的主义便完全实现了”**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她根据国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多次指出:“孙中山已经把他的理论综合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些主义适合于目前中国的情况。”<sup>③</sup> “孙中山为了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曾给了我们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2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8-69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6页。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主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sup>①</sup> 由于宋庆龄在《声明》中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它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中国有许多群众团体和国民党民主人士如蔡廷锴等都纷纷表示拥护。在美国，前总统夫人埃莉埃·罗斯福和一些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发表题为《孙夫人，中国的良心》一文，《华盛顿邮报》《先驱论坛报》等都发表了强有力的社论，响应宋庆龄的声明。

**“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主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宋庆龄于1949年9月1日《致华莱士》信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争取完全的独立，铲除殖民地制度，埋葬封建主义。”<sup>②</sup> 她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看作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为有共产党领导使孙中山三民主义胜利实现“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sup>③</sup> 对于这个胜利，宋庆龄非常高兴，动情地说：“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而且这个果实显得这样美丽。”<sup>④</sup> 宋庆龄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建立，她明确表示，将努力保证新中国的成功。

**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如何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富强起来，也是宋庆龄为之奋斗的目标。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结束时，就满怀信心地说：“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sup>⑤</sup>。要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必须实现现代化。宋庆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

---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15～41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6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7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0页。

庆龄回国后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毫不畏惧、挺身而出,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1932年夏秋间,宋庆龄联合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筹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又称“民保盟”)。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32年12月2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会上对新闻界发表的书面谈话中,指出:“新闻界同人和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们应该并肩站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因此,在这共同事业中,我们要形成统一战线,并且要忠诚地合作,这是理所当然的。”<sup>①</sup>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确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它包括各种政治倾向、政治观点和不同政治组织和没有组织的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如史沫特莱和伊罗生等。胡适曾是“同盟”北平分会的负责人;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参加了“同盟”北平分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领导,会同蔡元培、杨杏佛等组成,他们不仅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而且具有特殊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也只有宋庆龄、蔡元培等领导的“民保盟”这一特殊的社会团体——并且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团体,才能够挺身而出,为保障民权与蒋介石作公开、合法的斗争并取得成效。后来,宋庆龄又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等,这都说明了宋庆龄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进行开拓性的工作,并且都取得了成效。

“在‘示范性’‘实验性’的目标之外,又增加了科学研究这一目标” 宋庆龄一贯强调思想意识一定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早在1937年4月,她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就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正在急剧地变化,改造以及重建。新的社会秩序自然需要新的意识、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关系”<sup>②</sup>。1956年,我国社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1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5页。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她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时,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了。国营事业和各种合作社,在那里打下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为有效地迅速地配合我们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新的生产关系起见,我们必须加强我们自己的思想教育。”特别强调:“旧脑筋是不能办好新事业的。落后的思想不会创造新的关系。腐败的习惯只是破坏进步制度。”<sup>①</sup> 宋庆龄崇尚做“开路工作”,办“首创事业。”宋庆龄的创新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她注重实验,积累经验,着眼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说过,有些事情,国家来不及办,我们先做实验,积累经验,将来有用。她根据这一思路,与周恩来商量,确定中国福利会“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的工作方针。1960年初,宋庆龄在《给中国福利会同志们的信》中,指出,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才在‘示范性’、‘实验性’的目标之外,又增加了科学研究这一目标。”又说:我们“在科学研究中逐步地发展我们的干部,发展我们的事业,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会作出我们最大的、最主要的贡献。反过来,科学研究工作又必然会使我们的‘示范性’、‘实验性’工作更加巩固。”<sup>②</sup>

宋庆龄在其革命生涯中不断创新的精神表现许许多多方面,不仅如此,而且还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也这样做。1958年10月间,她视察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参观劳动模范黄宝妹车间同时,仔细观看了工人的创造,祝贺她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卓越贡献。还观看了工人自编自演的《黄宝妹》影片。看后赞扬黄宝妹演得好。热情赞扬工人的创造成果,说他们不但是生产的能手,又是文化的主人。还说事实证明:劳动人民最聪明、最能干。鼓励工人鼓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36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52~353页。

起更大干劲,创造更大奇迹。<sup>①</sup>

## 二、学习、继承和弘扬宋庆龄的崇高品格

宋庆龄的崇高品格表现为意志坚强、气度恢宏、胸怀博大、胆识卓越等方面。

### (一) 意志坚强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宋庆龄“她是我在世界上认识的人中最文雅、最敏锐、最刚强的女性。”<sup>②</sup> 周恩来谓:宋庆龄“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sup>③</sup> 邓小平称:宋庆龄在献身革命事业中具有“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sup>④</sup> 宋庆龄之所以能百折不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因为她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私才能无畏。

“我一回到中国……就是开展一个与我在苏联所看到的同样伟大的运动” 1927年,宋庆龄到莫斯科后,其处境相当困难,原因之一就是中外反动势力制造有关她私生活的谰言。在中国和国外都登出了她要同陈友仁结婚的消息。这是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目的是使她莫斯科之行失去政治意义,更恶毒的目的是损害她的声誉并企图把她与孙中山的名字分开。再加她的女友雷娜·普罗梅的突然去世和听到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消息。这使宋庆龄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由于她具有为革命献身的坚强意志,所以她经过痛苦、打击之后继续并加强了其革命活动。她在向苏联青年发表谈话时,指出:“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她表示:“我一回到中国,首先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开展一个与我在苏联所看到

① 《解放日报》1958年10月21日。

② 《斯特朗文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宋庆龄纪念集》,第25页。

的同样伟大运动。”她对中国共产党这个革命组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大力称赞：“现在革命组织所以能够仍然保持坚强与生气勃勃，就是因为有了革命的青年一代。主要就是青年领导者们，他们始终拒绝妥协，始终对抗反动派。虽然反革命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仍是会胜利的。”<sup>①</sup>

**“要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1929年8月初，宋庆龄在上海痛斥了蒋介石的说客戴季陶。蒋介石软硬兼施，企图迫宋庆龄就范，引诱其去南京做官，特派戴季陶夫妇来上海。在谈话中，宋庆龄责问戴季陶：“你们是把我把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痛斥蒋介石政权说：“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夺权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因而“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它的革命意义”。严词拒绝要她去南京做官的企图，严正指出：“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得到希望吗？”当戴季陶威胁她不要再发表宣言和声明时，严正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sup>②</sup>。

**“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随后被押往南京。宋庆龄为营救邓演达曾多次前往南京。当她得知邓演达已被蒋介石杀害时，非常愤慨，表示一定要公开揭露蒋介石的这类反革命罪行。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发了题为《宋庆龄之宣言》<sup>③</sup>，她非常严肃地宣告：“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民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宣言》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5~6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4~80页。

③ 收入《宋庆龄选集》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反动行径：“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同时还揭露蒋介石叫喊“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叫喊的“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她严正声明：“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sup>①</sup>

“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 1933年春，陈赓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准备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临离上海的前一天，他由于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和廖承志、罗登贤等一起被关押在租界巡捕房。在狱中，陈赓经受了敌人的电刑等严刑拷打，拒绝供出上海地下党的情况。这时，宋庆龄和杨杏佛，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不顾个人安危，带着许多新闻记者到狱中探视罗登贤、廖承志和陈赓等。由于宋庆龄的威望，敌人被迫停止了酷刑。

租界当局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相勾结，把陈赓等人引渡给南京政府。针对这一罪恶的行径，宋庆龄组织了大规模的声援和营救工作。1933年4月1日，宋庆龄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赞扬被捕的罗登贤、陈赓等“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他们“不是罪犯，而是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3～86页。

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我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的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sup>①</sup> 4月2日,宋庆龄和蔡元培为营救罗登贤、陈赓等致电南京当局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指出:罗登贤、陈赓等4人“由公安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sup>②</sup>

为营救陈赓,宋庆龄于4月间亲赴南京,当面斥责蒋介石:“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1925)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sup>③</sup> 在宋庆龄和中共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蒋介石未敢贸然杀害陈赓。

“我并无任何从事政治运动以图参加(蒋)政府的意图” 宋庆龄拒绝引诱(系指国民党中央全会选她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坚决反对内战。1949年初,宋庆龄拒绝了南京李宗仁代总统要其“出为领导,共策进行”的来函,国民党大肆散播谣言,说她已收到这一请求并可能接受,即所谓“宋庆龄要出山了”、“孙夫人将在国民政府任职”等等。宋庆龄得此消息,十分气恼,连声斥责:无耻!卑鄙!造谣!为了辟谣,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亲自签发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声明》,声明说:“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18~119页。

② 《申报》1933年4月4日。

③ 《宋庆龄纪念集》,第137页。



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sup>①</sup> 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宋庆龄表现了无比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

## (二) 气度恢宏

气度恢宏与意志坚强是相辅相成的,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宋庆龄站得高,看得远,始终从全中国、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着想。她的政治才能与伟大气魄是从其投身于中国革命,尤其是在孙中山逝世后,独立进行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她在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认为:“这是她处于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境况之后所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它定下了她此后言行的基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地、革命性地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去处理。”<sup>②</sup> 他还认为:宋庆龄这时所表现的思想 and 行动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内容相近。”<sup>③</sup> 在以后中国革命转变的关键时刻,宋庆龄的政治才能和伟大气魄表现得更为出色。

“总理说‘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 1926年12月10日,宋庆龄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到武汉。1927年2月,她作为国民党妇女部长,在武汉开办了中国国民党妇女政治训练班,并任班主任。在该班开学典礼上,宋庆龄发表了《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演说,指出:“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强调:妇女“在社会上的责任,不仅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个贤母良妻,同时要为国家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总理说‘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我们

<sup>①</sup>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sup>②</sup>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60页。

<sup>③</sup>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61页。

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存在的希望。”为了妇女的解放应“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sup>①</sup>

1927年3月,宋庆龄被任命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并兼任北伐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5月间,河南战役时有大量伤兵从前线运到武汉,宋庆龄为此创建了伤兵医院并亲自参加工作。为了伤兵医院的经费,宋庆龄曾主持过义卖会,在义卖会上出售的有吴佩孚逃时留下的书画和其它贵重物品,全部收入用于对伤兵的救护。宋庆龄还组织过一次文艺晚会来筹集资金,到会的有武汉党政领导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等,文艺演出的收入也全部用于对伤兵的救护。宋庆龄还组织过一次红十字游园会,邀请所有外国领事官员参加,经费收入不小。她还把一些并不支持北伐的个人和组织也动员起来为伤兵救护这类人道主义的工作,教会办的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除为伤兵救护外,还参加了为伤兵的募捐工作。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先生说:“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气度恢宏——预示着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将从事类似的工作。”<sup>②</sup>

“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胡子婴回忆说:“西安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奔走相告,莫不称快。孙夫人与蒋介石虽有亲戚之谊,但对他的倒行逆施,一向是痛恨入骨。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谈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于我的意料。”<sup>③</sup> 这个“意料”就是宋庆龄主张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上海宋庆龄故居珍藏的宋庆龄遗稿中发现了一份宋庆龄签署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声明》(原稿为英文,后经翻译成中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18页。

②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03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13页。

文)曾刊登在《纪念宋庆龄文集》上。从这份《声明》可看出宋庆龄更为具体和明确的态度。她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战争之中,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入侵我国的绥远。”“内战必须停止!这是我一贯的立场。面临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近的危险。我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

对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宋庆龄的态度是具体而明确的。人们称赞:“孙夫人的胸怀全局,深谋远虑,提出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的真知灼见。”<sup>①</sup>

宋庆龄不仅积极促成全民族团结抗日,而且把中国抗日战争看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立和扩大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而努力。

### (三) 胸怀博大

胸怀博大与气度恢宏(或叫气度非凡)是紧紧相连的。宋庆龄胸怀祖国、人民、妇女和儿童,她胸怀世界。大海之量能容纳百川,她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共同奋斗。她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宋庆龄心中只有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周恩来称她是“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 1927年8月,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中,指出:“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工人推进和维持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农民生产人口赖以生存的粮食,他们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sup>②</sup> 10年后,她仍然坚持这一根本看法,她称赞孙中山的思想,“他所计划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改善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上卷,第113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40页。

人民大众的生活。他认为工人农民是建设自由新中国最可靠的力量。他了解到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统一全中国这个伟大斗争中,这两大劳动阶级必然是我们力量的基础。”<sup>①</sup> 五卅运动后不久,爆发了省港工人大罢工。如何解决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吃饭问题?宋庆龄在上海就积极开展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呼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处的侨胞那里。仅是海外华侨的捐款经她手汇往广州有10万美元以上。1926年春,宋庆龄去广州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率领一个代表团专门前去向她致谢!<sup>②</sup>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宋庆龄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除募捐钱物支前、亲临前线慰问、创办伤兵医院、团结各界人士之外,就是支持反日罢工。她除了关心罢工工人抗日爱国斗争进展外,更多的关心罢工工人因坚持斗争,吃饭、住房存在的困难问题。她千方百计为罢工工人筹集了2万元经费,冲破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派秘书与“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公开群众团体)取得联系,请该会负责人到自己的寓所,亲手将2万元的支票交给了他。宋庆龄还详细询问了罢工工人斗争和生活情况,热情赞扬罢工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认为这次罢工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日本帝国主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并表达了她对反日工人的敬意。之后,她还多次筹款,订购了沪西一家米号的粮食,作为专门发放罢工工人的救济粮。

“为在战争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张执一回忆说:“宋庆龄同志呕心沥血,运用她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千方百计地力争为我党提供活动资金,支援解放战争。”“宋庆龄同志也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儿童福利站及其他儿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页。

<sup>②</sup>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69页。

童福利机构的名义,向救济总署要求救济物资。……为了多为解放区争得药物,她曾亲自做救济总署负责医药分配的美国人的工作,请他主持公道,为抗战出力最多、损失最大的解放区多分配药品。”“当时,上海地下党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宋庆龄同志很多帮助。一次,她让廖梦醒同志亲手交我三万美元,我随即交到刘晓、刘长胜同志处,以备党的需要。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很大,次数较多。”<sup>①</sup>

**“设置了一个专门基金,来帮助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的贫病作家、艺术家”** 宋庆龄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中,回忆说:“设置了一个专门基金,来帮助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的贫病作家、艺术家,使他们能从事创作而免除挨饿,从而也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文化专制。”<sup>②</sup> 宋庆龄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在那艰难的年月里,给贫病作家和艺术家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他们对此至为感激。历史学家、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负责人侯外庐,在他撰写的《伟大的战士,伟大的母亲》一文中,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蒋管区各大城市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规模群众斗争。人民在饥馑的边缘,处境窘迫。……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从事著述,担负一些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的日常工作。这年秋天,宋庆龄同志亲自指示中国福利基金会将面粉、奶粉、罐头、衣服、毛线等一批救济物资直接送到我家,同时附有一封给我的信,信中要求协会负责将这些救济品分发给确实有困难的学者们。我家一时充当了仓库。我赶紧和杜国庠同志商定分发对象,征求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最后定下好几十人的名单。学术工作者协会的同志们中间有邓初民、张志让、周谷城、蔡尚思、李平心、卢于道、翦伯赞、杜国庠和我等等,凡确有困难的,几无遗漏。我记得,当时学者们人人都激动不已,奔走相告:‘孙夫人给我们送救济

<sup>①</sup> 《宋庆龄纪念集》,第126~127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6页。

物资来啦！’许多同志都是高高兴兴地亲自到我家里来领这一份份救济品的。我们大家一起亲身感受到了宋庆龄同志给予革命战友的温暖，无不感谢宋庆龄对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深切关怀。”<sup>①</sup>

#### （四）胆识卓越

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宋庆龄曾多受到恐吓，甚至威胁谋害、暗杀，她均能泰然处之，并坚定刚毅地表示：“古人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sup>②</sup>正因为具有这种胆识她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能镇静地对待出现的险情并化险为夷。实事求是，敢于讲真理，不附和，不盲从，因为她坚信真理一定胜利；敢于捍卫真理和原则，所以才会有卓越的胆识。

“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先后与何香凝以及宋子文夫人张乐怡等到真如去慰问十九路军将士。2月12日，宋庆龄又冒着枪林弹雨，到吴淞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区寿年部翁照垣旅。她在翁旅长的陪同下到前沿阵地巡视，向将士致意。当宋庆龄进入前线指挥所，与区师长、翁旅长亲切交谈时，敌机在指挥所上低空飞行，还不时向地面扫射。宋庆龄镇定自若，轻蔑地望看空中敌机，向在场的战地记者高度称赞十九路军抗战的重大意义，并鼓励翁照垣旅长说：“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激动地代表全体将士表示：“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sup>③</sup>宋庆龄的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吴淞前线的官兵，他们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坚守吴淞要塞，直到十九路军被迫全线撤退。

“日本人以为终于把我干掉了……这个如意算盘未免打得太早了一点”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后对广东沿海加强封锁和轰炸，香港、澳门的一些地方也遭到敌机轰炸。1939年1月间，

① 《中国福利会史稿》第179页，中国福利会馆藏。

② 孙永猛：《宋庆龄——女中之杰》第4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申报》1932年2月13日。

宋庆龄曾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前往澳门。她在澳门时,听到石岐这个地方遭到了猛烈轰炸。日本情报部门以为轰炸可把宋庆龄干掉了。1月17日,宋庆龄在《致埃德加·斯诺》的信里,说:“我在澳门的时候,听到石岐这个地方遭到猛烈轰炸,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发现电厂和许多楼房都被摧毁,公路上还有七辆客车也被炸。日本人终以为终于把我干掉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未免打得太早了一点。余下的路程,我是摸着黑的。……回到家里,我完全安然无恙。”<sup>①</sup> 宋庆龄在险恶的环境里,总是镇定自若。

**“要使人民胜利,那就必须参加……斗争”**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全面崩溃的前夕,上海局势十分混乱,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屠杀和镇压。对此宋庆龄早有思想准备。她在1948年3日,《致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中,就指出:“要使人民胜利,那就必须参加我们的斗争。”<sup>②</sup>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上海社会上流传宋庆龄有被国民党劫持去台湾和广州的可能。这时,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于1月9日,联合致电宋庆龄,“沪上之环境如何,至为系念。”请她离沪北上。

同一天,就设法帮助在上海的宋庆龄经香港安全北上事,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潘汉年、刘晓电。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指示强调“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sup>③</sup> 电文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宋庆龄的尊重,关怀和诚挚的感情。

2月20日,宋庆龄函复中共中央,信中说:“……我非常抱歉,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13~214页。

<sup>②</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47页。

<sup>③</sup>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09页,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版。

由于炎症及血压高,正在治疗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sup>①</sup>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审时度势,决定还是留居在上海。当时流传一种说法,说她已离开了原来的寓所,躲藏起来(有人说是躲在外国人家里)。事实是宋庆龄留居上海,住在自己家里,继续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工作,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应尽的努力。

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传来胜利消息,上海人民怀着激动心情准备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疯狂破坏与残酷镇压,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了保存力量(包括人员和物资的安全),不受损失,争取参加公开的、合法的活动。这对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起了独特的积极作用。坚信人民斗争的胜利,坚定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是宋庆龄的毕生信念。

宋庆龄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主要是经过斗争实践,经过她自己努力奋斗,形成和逐步完美成熟的。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因为每个人除了参加革命实践之外,还要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对宋庆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形成有重大影响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父亲宋耀如在美国生活学习10年,抱着为自己祖国多学些知识,“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的愿望,回到上海后,同美国卫理公会布道团林乐知的民族歧视进行过次反抗斗争,以及冒着生命和家庭的风险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父亲在逆境中的反抗精神和热爱祖国的革命精神;母亲倪桂珍的具有同情心和富有正义感等对宋庆龄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的形成提供一个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是,在同样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下,而宋庆龄姐妹兄弟6个,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因此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只是一个客观

<sup>①</sup> 《中国福利会史稿》第179页,中国福利会馆藏。



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时期与宋庆龄一起并肩战斗的有邓演达、杨杏佛和鲁迅等。宋庆龄在《纪念邓演达》一文中说：“当时所有革命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sup>①</sup> 关于鲁迅，宋庆龄在著文中，指出：鲁迅在中华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以他卓绝的天才，圣洁的人格和坚韧的意志，……集中体现了使我们这民族走向光明的时代的意志和力量。”<sup>②</sup> 宋庆龄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成为挚友。周恩来是她是最知心、最信任的朋友，她（他）们两人关系的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辉典范。宋庆龄在《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中，称赞周恩来的“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韧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sup>③</sup> 宋庆龄在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世界和平事业的奋斗中，团结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其中一位就是美国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们的革命友谊保持了几十年。宋庆龄在著文中，说：“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sup>④</sup> 上述这些宋庆龄的战友、同志，他们在共同斗争中总是相互促进，相互激励的。这些诸多的因素，还需要靠自觉的吸取，并且持之以恒，宋庆龄是一个非常谦虚好学的人。多少年后，每当她回忆与其一起生活和战斗过的亲人、朋友和同志的精神和品格的特点时，记得那样的准确和清晰，这就是明证。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70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36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5—616页。

宋庆龄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是由爱国主义贯穿在其中。她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她是一个永远值得仿效的榜样。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她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来源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贯穿其中。她的革命精神诸方面是爱国主义多层次、光辉灿烂的表现。在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两大历史阶段中,她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奉献了一切,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人民将面临着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学习宋庆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像她那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为实现我们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宋庆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宋庆龄所创办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我国要在下世纪中叶,即新中国建国100周年时,在现代化建设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我国国情看,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像宋庆龄那样奋斗实干、创造性地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为世界和平和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宋庆龄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她深信真理一定会胜利,敢于捍卫真理和坚持原则,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胆识。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将会遇到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要学习宋庆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坚持真理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努力。

## 后 记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学习宋庆龄、研究宋庆龄的活动,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决定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站在历史的高度,回顾宋庆龄在本世纪对中国、对世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追寻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伟大女性的原因和轨迹,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 and 教益。展望21世纪的宏伟前景,深入研究和探索宋庆龄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我们在新的世纪为完成新的神圣历史使命,夺取新的更伟大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这对总结过去,鼓舞今人,昭示未来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意义。我们编印出版这本《宋庆龄与20世纪》专著,目的就是想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

本书把宋庆龄在20世纪中对中国、对世界所作出的主要贡献,概括归纳为10个方面,希望借此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出宋庆龄在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她毕其一生追求真理,捍卫革命,热爱和平,无愧国之瑰宝;她倾其所有争取民主,心系妇幼,维护统一,必将风范长存。她的崇高思想品德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为了编好本书,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统一规划、统一制定提纲、统一组织编写。编写过程中,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难点,进行了多次研究讨论,反复商榷论证,使得本书编写得以顺利完成。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从事宋庆龄研究多年的专家学者,有一大批有志于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以及部分从事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的中青年干部。本书撰稿人:华平(前言、后记)、季鸿

生(第一、第十章)、王德斐、孙娟娟、辛永康(第二章)、王志鲜、王锡荣、陈挥(第三章)、傅绍昌(第四章)、陆柳莺、蒋明、季一慰(第五章)、麦灵芝、黄亚平、庄有为、刘世襄(第六章)、吴让能、戴辉(第七章)、王蔚(第八章)、董艳、李旭旦、夏建强(第九章)。张洁明提供了部分章节的初稿。本书由华平、季鸿生、傅绍昌、庄有为负责统稿。戴辉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统稿。最后,由主编张世福定稿。本书是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的集体研究成果。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仅以此书作为引玉之砖,敬希国内外研究宋庆龄的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并和我们一起来做好宋庆龄研究这个重要课题。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曾向我们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参与过讨论并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作出过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恕不一一列举单位姓名。

在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谨以此书献给一切关心、爱护宋庆龄创建的事业,认真学习、研究宋庆龄思想,以及正在为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人们!

编 者

1999 年 8 月